

甘肃史志

GANSU SHIZHI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GANSU DIFANGZHI

2016·4

甘肃史志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任：张军利

副主任：车安宁 李振宇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述林 毛存显 石为怀 米琳 孙占鳌

李宽余 杨生宝 张伦 张正龙 张占社

张全生 何成才 罗卫东 郑天水 贺红梅

高中 彭晓峰 谭得胜

主编：李振宇

副主编：张占社

编辑：汪举红 孔令奇 李佳璐

校对：汪举红 孔令奇

甘肃史志

2010年3月创刊 季刊 总第28期

2016·4

·政策法规·

甘肃省地方史志信息化发展规划 ·4·

·工作动态·

理清思路 强化措施 全力推进全省二轮市县志编修工作 贺红梅 ·6·

明确任务 落实责任 切实做好地方综合年鉴工作 石为怀 ·9·

认真制定好实施好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大力推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 张占社 ·11·

·志鉴编研·

科技志编修释疑 尤九成 ·15·

大事记编写的一些粗浅认识 梁兴明 ·22·

·理论研讨·

甘肃籍学人对《四库全书》的重要贡献 朱克雄 ·24·

甘肃地方志研究综述 陈郑云 ·33·

张维方志思想研究 陈尚敏 ·41·

·史地考证·

甘肃定西 新莽权衡的出土地 张慧 ·47·

GANSU SHIZHI

· 史海钩沉 ·

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的两件清代乾隆档案看廓尔喀对西藏的侵略与清朝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

魏泽民 · 50 ·

· 陇源人物 ·

赵时春研究概述

张怀宁 · 58 ·

平凉古今医药人物概览

赵志飞 · 62 ·

· 史志快讯 ·

《兰州市志》《甘肃省志·建制志》《甘肃省志·卫生志(1986-2010)》和《甘肃省志·军事志(1991-2010)》通过终审

· 14 ·

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

· 21 ·

甘肃地方史志办公室全文数据库和网站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 23 ·

车安宁当选为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研究会常务理事

· 32 ·

《甘肃省志·财政志(1986-2010)》通过复审

· 40 ·

全省地方志系统部分市县“三项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会

· 61 ·

征稿启事

· 79 ·

学术征文

· 80 ·

甘肃省地方史志信息化发展规划

(2016—2020年)

为进一步推进全省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根据《全国地方志信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指组发〔2016〕7号）要求，结合全省地方史志信息化发展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全国地方志信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0年）》、《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全面推进甘肃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发挥地方史志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地方史志信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二）基本原则

1. 坚持正确方向

增强政治意识，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工作。充分发挥网站、数据库、新媒体传播平台等网络宣传阵地作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2. 坚持统一规划

明确信息化建设目标和用户需求，采取分层规划，加快各级信息化建设步伐，推动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3. 坚持统一标准

运用统一标准规范体系，防止出现各级地方史志部门信息化建设自成体系、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应用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实现地方史志系统信息资源共享。

4. 坚持分级建设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负责信息化建设的科学规划、顶层设计、组织实施和检查指导。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负责信息化建设任务的具体落实。

5. 坚持资源共享

全省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的数字化、地情资料、地方志文献要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格式进行开发和整理入库，纳入统一规划。建设甘肃省地方史志全文数据库，共享共用，实现地方史志数字化资源社会效益最大化。

6. 坚持安全高效

加强网络安全管理，确保系统、网站安全运行，发布地情信息准确可靠，符合国家安全保密等法律法规要求。切实防范、控制和化解信息化进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重视安全备份。

二、总体目标与主要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2020年，建成集史志成果展示、史志资源利用、地情资料宣传、史志理论研究于一体的甘肃地方史志网，实现省、市、县三级联网；建立甘肃省地方史志全文数据库系统与甘肃省地方史志综合办公平台，有计划地将新编地方志、年鉴、地情资料、旧志等成果转化成为数字化，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促进信息采集和共享，实现网络化办公和公共服务；加大扶持力度，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水平；使“互联网+”成为开发利用地方史志资源的重要手段，基本实现主要新媒体技术在地方史志系统的覆盖，形成比较健全的地方史志新媒体传播平台，传承和宣传地方史志文化。

（二）主要目标

2016年，启动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全文数据库和网站建设项目，初步建成甘肃地方史志网；已建成地方史志网站的市（州）、县（市、区）地方史志部门完成与甘肃地方史志网的链接，形成全省地方史志系统信息共享平台；加快对已出版史志成果数字化转换步伐。

2017年，稳步推进甘肃地方史志网和全文数据库系统建设；初步完成地方史志资料数字化工作；各市（州）建成地情信息网站，与甘肃地方史志网链接；市（州）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各专志承编单位和年鉴供稿单位定期提供信息；积极开展地方史志新媒体平台建设；适时启动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综合办公平台建设，实现与中指办的互联互通。

2018年，对甘肃地方史志网栏目设置及相关功能进行升级；各县（市、区）建成地情信息网站，与甘肃地方史志网链接；加快已出版史志成果数字化资源入库工作；继续推进甘肃地方史志系统综合办公平台建设；利用新技术、新载体，推动地方史志新媒体创新发展。

2019年，进一步提升完善甘肃地方史志网的功能和栏目，稳步推进与中国方志网、中国地情网、中国国情网、中国甘肃网的链接；各市（州）、县（市、区）在建成地情网站的同时，加快推进史志成果数字化入库工作；继续推进全省地方史志综合办公平台建设，将地方史志综合办公平台延伸到县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

2020年，省、市、县三级地方史志网站全面建成；完成对三级已出版史志成果数字化入库工作；通过设置相关栏目，逐步实现网上编纂史志、编辑年鉴、采集地情资料等；完成全省地方史志综合办公平台建设，实现网上办公（工作会议、文件收发、工作交流、信息采集等）；推动地方史志新媒体传播平台与综合办公平台融合发展。

三、主要任务

（一）加快地方史志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省、市、县三级地方史志网站建设进度。未完成地方史志网站建设的市（州）、县（市、区）要创造条件，尽快建成。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单独建设，也可以充分依托现有政务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已开通地情信息网的市（州）、县（市、区），要按照全国地方史志事业信息化发展规划的要求，不断升级完善地情网站和地情资料库软硬件设施，广泛应用“互联网+”、微信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逐步实现修志编鉴的数字化、网络化，构建多界面、多渠道、多元化、全方位的信息化综合服务体系。

（二）推动地方史志信息化标准建设

按照全国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资源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建设规范和操作指南等，结合甘肃实际，推广落实地方史志信息化标准体系。

（三）逐步建成地方史志数据库

全省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加快史志成果入库上网，尽快完成史志、年鉴、地情资料等数据加工和入库。全省未出版的史志、年鉴、地情资料等要在出版后2个月内完成数据入库，并报送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电子数据2份。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面向社会，拓宽搜集地情资料渠道，做大做强地情资料数据库。

（四）加强对地方文献收（征）集、保护和开发利用

开发全省地方史志资源管理系统，实现对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史志成果的收集、整合、加工、统计和分析，深化与省外相关机构在数字史志资源方面的交流合作。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充分发挥资料收（征）集制度和互联网的作用，运用社会调查、口述史等方法，大范围、多渠道地收（征）集地情资料，健全完善能够全方位适应地方史志编纂、地方史志事业发展和地方史志文化建设需要的地方史志资料保障机制。

（五）实现地方史志资源共享

全省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加强网络互联、信息互通，做到资源共享。工作起步较晚的市、县，要向起

理清思路 强化措施

全力推进全省二轮市县志编修工作

贺红梅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自2014年以来就地方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批示精神，积极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地方志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

我省二轮市（州）县（区）志修志工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史志办坚持“志为主体”的指导思想，强化质量意识，统筹

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市、县学习借鉴，发挥后发优势。已经取得成果、走在前面的市、县，要提供技术和经验，帮助支持其他市、县加快建设、少走弯路。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学习其他部门信息化建设经验，取其所长，为我所用。以甘肃地方史志网为基础，注重内外共享，积极推进省、市、县三级地方史志信息网络系统一体化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全省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把信息化建设列为“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将信息化建设纳入工作目标，投入精力，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及时解决信息化建设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保障经费投入

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按照《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一纳入、八到位”的要求，将信息化建设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做到足额及时拨付。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加强资金使用管

规划，缜密安排，明确任务，不断加大指导力度。市（州）县（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推进志书编修工作。市（州）县（区）地方志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责任，细化目标任务，努力加快编修进度。尤其是2013年省政府与各市州签订《甘肃省地方史志工作2013—2015年目标管理责任书》后，市州二轮修志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截止今年9月底，全省二轮修志规划的14部市州志已出版5部，终审4部。规划的85部县（市、区）

理和监督，实行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强化队伍建设

全省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根据需要选用能够运用和维护计算机网络的技术人员充实地方史志工作队伍。加大培训力度，及时掌握、更新信息化知识，确保有相对稳定的既熟悉地方史志知识又掌握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专门工作人员。

（四）加强宣传推广

全省各级地方史志部门要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和媒介，通过推广网站二维码等途径，大力宣传数字化地方史志资源平台，总结宣传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应用等方面的典型做法，把史志成果转化为社会公众所需的文化产品，不断拓展地方史志信息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

（五）注重指导监督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按照统一部署、分级指导的原则，加大对全省各级地方史志部门信息化建设的指导监督力度。定期开展信息化建设情况的督促指导、考核通报、评先树优，确保信息化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志出版了40部，通过终审的14部，通过评议和提交评议的2部。

但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省政府办公厅《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要在2020年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的要求，我省的市（州）县（区）志编纂工作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编纂进度不够平衡，有些市已全面完成了二轮修志任务，有的是市州的个别县区编纂工作进展缓慢，编纂多年拿不出初稿。更有甚者，二轮志书编纂工作启动12年了，有个别市州至今没有一部二轮志书出版发行。二是个别地方的修志机构没有真正把“一纳入，八到位”这个总把手抓到手里，在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上不积极、不主动，使得“一纳入，八到位”在地方政府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三是有些志办在工作筹划上缺乏全局意识，对修志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没有从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编纂工作启动12年了，依然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使得工作进展极其缓慢。四是个别志办的修志人员对修志业务研究不够，没有认真研读中指组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也没有很好地借鉴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在设计篇目时就没有做很好的论证和研讨，没有多方征求意见建议，

闭门造车，使得编就的志稿质量不高，问题成堆，修改难度增大。有的志稿多次返工，严重影响了志书质量，拖延了编纂时间。五是个别市（州）志办在对二轮志书的规划上不够严谨，考虑不够周全，在志书编纂过程中随意延长下限，造成编就的志稿与延伸的资料衔接困难，个别县（区）志稿为此搁置不前，严重影响了志稿的编纂进度。

根据“两个规划”的要求，从现在算起，留给我们的编纂时间只有4年。目前，我们的在编二轮市县志书有36部，平均每年完成9部以上志书，才有可能按期完成编纂任务。为此，没有完成编纂任务的市县必须对我们面临的形势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端正工作态度，认真分析自身原因，采取非常措施，切实改变在全省落后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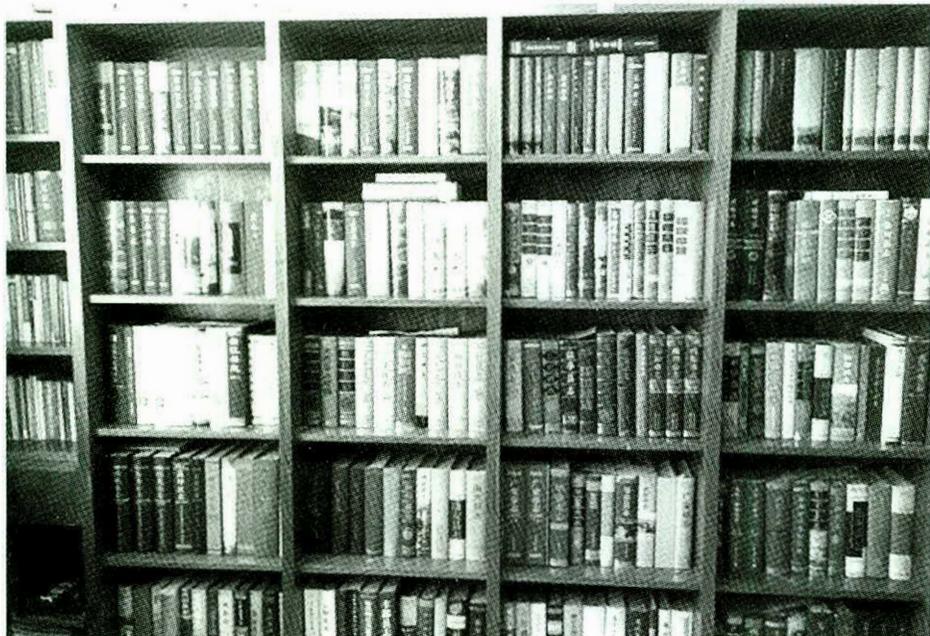
首先，要理清工作思路，切实抓紧抓好志书编纂各个环节的工作

工作严重落后的市（州）、县（市、区）要切实增强完成志书编纂任务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认真谋划，科学部署，一般化的措施和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的工作现状，必须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用攻坚的办法，才有可能改进后进局面。修志力量薄弱的志办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充实人员，加强力量。各志办要认真对照《甘肃省地方志事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市县志编纂的进度目标要求，进一步细化任务，靠实责任，要将分工编纂和总纂统稿紧密结合，提高工作效率，紧扣每个环节，确保编纂工作的落实。

其次，要加大督导力度，为按期完成编纂任务提供保障

各市（州）志办要根据每部在编志稿进展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有针对性的加大督促指导的力度。过去几年，省志办在对市县志的业务指导过程



中，通过关口前移、动态指导等工作方法，在推进一批志书编修出版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今后的工作中，这一好的做法我们还会继续坚持，并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加大指导力度。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也要在指导过程中提前介入，盯紧每个环节，及时帮助各县（区）志办解决编纂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和问题，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以避免志书编纂走弯路。

第三，强化目标导向，努力加快二轮市县志编纂进度

编修志书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基本职能和首要任务，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是衡量地方志工作开展好与坏的核心指标，必须始终牢牢抓好。2020年全面完成修志任务，是地方志工作者向省委省政府立下的军令状，是法定的目标任务，绝不能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拖时间，打折扣，也绝不能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只停留在口头上。要按规划目标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果。自2004年启动二轮修志工作以来，虽然已有一大批市县志率先完成了出版任务，但由于部分市县的编纂进度不理想，即使在过去三年省政府与各市州签订了《目标责任书》的情况下，依然有36个市县没有如期完成，拖了全省的后腿。国务院办公厅的《规划纲要》颁布后，将二轮志书的完成时间调整到了2020年，我省的《十三五规划》也做了相应调整。但对于工作滞后的市县，特别是26个正在编写初稿或收集资料的市县，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任务相当艰巨，大家要切实感受到我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和干劲，全力以赴把各自承编的志书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第四，筑牢质量防线，正确处理进度与质量的关系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质量第一，进度服从质量是我们一贯的指导思想。各志办在加紧调度志书编纂进度的同时，还要严把志书质量关。一要把握好志书编纂的每个关键环节。篇目设置要科学、体例应用要合理、资料收录要翔实、行文表述要规范，这是一部优秀的志书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必须在每个环节把握好、落实好。二要树立三种意识。即政治意识、全局意识和创新意识。政治意识就是要在中央和省委

的大政方针指导下编修志书，不得偏离。特别是在民族宗教、边界纠纷、政治运动等敏感问题的记述上，要按照中央、省上和有关部门的规定和口径谨慎处理，涉及到军事、政治、科技、统计等方面的记述，要请相关部门严格把关。涉及到人物、图照的录入，要有明确的入志标准，规范执行。全局意识就是不能脱离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更不能脱离全国、全省这一大环境。不可孤立地、局部地去记述某一地的发展变迁，要将一部志书始终放在大环境中来考虑。需要强调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兴起，各地出现了争抢名人籍贯、古遗址等现象，或者是将一些学术界正在争论，尚未定论的问题拿来热炒热议，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些问题，学术团体可以炒，当地政府也可以支持，但作为志书，一定要慎之又慎。对国家已经明确，社会上已经公认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去把握。创新意识就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体例、篇目设计和内容记述上，要研究新问题，反映新情况，注重记述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生事物，反映改革开放带给人民生活的新变化，充分体现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在志书形式的创新上，要大幅度提高图照在志书中的比例，增强志书的形象感、直观感和可读性。在志书出版的创新上，要做好志书网络化、数字化工作，开创志书“平民化、大众化、电子化”的发展方向。三要坚持志稿“一评三审”制度。这是我们在首轮修志过程中积累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也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关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近年来个别地方出现了志稿未经评议就直接报送终审，或以初审、复审代替评议，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无论是《地方志工作条例》《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还是省上近年来下发的有关文件，都始终坚持将志稿“一评三审”制度作为提高志书质量的重点来强调。各市、县志办在志书审定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坚持以法治志，切实把好志书质量关。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指导处处长）

明确任务 落实责任

切实做好地方综合年鉴工作

石为怀

我省的地方综合年鉴工作，自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2009年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颁布以来，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各级政府的主持下，全省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克服人员编制少、工作经费不足等困难，奋发有为、辛勤工作，不断扩大年鉴工作覆盖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从2013年省政府和各市州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之后年鉴工作发展更为迅速。截止目前，全省有13个市州和71个县（市、区）开展了地方综合年鉴工作，为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我省的地方综合年鉴工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进展不平衡，有些市已经实现了年鉴工作全覆盖，有些市州还有相当一部分县没有开展年鉴工作，甚至个别市大部分县区至今还没有开展年鉴工作的打算和计划；二是时效性不强，全省相当一部分县区年鉴未能做到当年编辑当年出版，个别的还有几年编一部年鉴的情况，严重影响年鉴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三是质量不高，有部分年鉴存在内容不全、信息不多，尤其是在资料的深度挖掘上下功夫不够，年鉴缺乏新颖性和吸引力；四是为领导决策和为社会提供服务作用发挥的不好，已经编辑出版的年鉴大部分是内部书号未公开出版，个别的仅作为资料内部使用保存，印刷数量少，受众面窄，严重影响年鉴作用的发挥和对地方志工作成果的宣传。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省政府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印发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规划》是我们搞好地方综合年鉴

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今后地方综合年鉴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到2018年必须实现地方综合年鉴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全覆盖。要实现这一目标，任务十分艰巨，时间非常紧迫，需要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和全体方志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开展工作，不得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

一要认真认识地方综合年鉴的重要性。首先，开展地方综合年鉴工作是地方志工作部门的法定责任。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开展地方综合年鉴工作是地方志工作部门的两大主体业务之一，是与编修志书并驾齐驱的重要工作，是法定职责和法定任务。因此，地方综合年鉴工作不是可有可无、可干可不干的事情，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如果不开展地方综合年鉴工作就意味着我们违法、失职；其次年鉴是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是供人查阅、借鉴的重要工具，是用于当代、传于后世的传世之作。邓小平同志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年鉴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及社会各方面提供了最新最权威的信息，同时还可以保存历史资料，是“资政之鉴、信息之源、史书志书之本”。可以说，年鉴为我们全面了解省、市、县方方面面的工作，了解发展变化的历程和历史脉络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未来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但是，我们一些地方志工作部门、地方志工作人员，尤其是还有少数领导同志对年鉴工作的认识还不够，没有把年鉴工作摆到与编修志书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安排、来部署，甚至还有一些领导同志认为年鉴是地方

志工作的附属业务，先完成志书编修，然后再考虑年鉴工作的错误思想。体现在工作中，就是对年鉴工作安排不到位，人员不落实，条件不具备，日常工作中不检查、不督促、不汇报、不争取，致使年鉴工作处于一种可干可不干、可做可不做的尴尬境地。这种错误认识必须得到纠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事业负责的态度，摆正年鉴工作的位置，切实把年鉴工作纳入到地方志的日常工作中，作为一件大事要事抓紧抓好。第三，年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年鉴全面系统的记载了上一年度省、市、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建设发展的情况和取得的成就，有利于鼓舞斗志、凝聚人心，坚定全省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和信心。有利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更好的规划未来提供借鉴。有利于更好的宣传、推介、展示一地形象，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研究一地，从而使更多的人来甘肃投资、兴业。

二要做到一年一鉴、连续公开出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年鉴是逐年编辑和出版的资料性文献，一年一鉴，连续出版是年鉴最基本的特点。无论年鉴的内容与形式，无论年鉴向那个方向发展，年鉴年度性特点都不会改变。否则就不是年鉴。过去，我们在第一轮志书完成后，有些地方编辑出版了一些多年鉴，有2年的，5年的，甚至10年的。回过头我们再看这些年鉴，他和志书有区别吗？我认为区别不是很大，不过就是一部时间跨度比较小的志书罢了。当然我不是否定这个做法有什么不好，相反在当时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任务不饱满的情况下，起到了稳定队伍、稳定机构的重要作用。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如果还要这样做显然不妥，因为现在有《条例》《规定》，有国家的《规划纲要》，有省政府的《“十三五”规划》，机构确定了、任务明确了、队伍稳定了。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按照年鉴的本来属性开展工作，做到逐年编辑、一年一鉴、公开出

版。公开出版就是要有出版社的正式书号，也就是要经过出版社审核公开发行。我省的县区年鉴大部分是内部出版，申请的是文化部门核发的内部书号，这与《十三五规划》的要求不相符，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要重视这件事，早部署、早谋划，把各环节的工作衔接好，不要因此延误年鉴的出版时间，影响年鉴的时效性。

三要高度重视年鉴的质量。质量是年鉴的生命。年鉴即使一种文化产品，更是一种权威性的资料工具书。首先要把好年鉴框架关。一部年鉴的编辑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年鉴的框架设计就是这一系统工程的基础。年鉴框架既要具有系统性，即门类齐全、内容全面系统，能构成完整的信息体系，又要突出鲜明的个性，突出地方特色、年度特色和时代特色。时代在发展，年鉴的框架结构也要与时俱进，要不断优化各篇纲目。年鉴内容是逐年更新的，因此对年鉴的总体结构和各篇结构每年都应作适当的调整、优化和更新，以求科学、合理，提高质量、品位。其次要把好初始资料关。年鉴资料是各部门、各单位提供的，年鉴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部门供稿质量的高低。所以要加强对供稿人员的业务指导，使他们一开始就把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有特色的资料提供上来，在经过编辑人员的修改编辑，这样年鉴质量就有了基本保证。第三要把好编辑修改关。年鉴的编辑工作是年鉴整个编纂过程中最基本的环节，编辑质量最终影响和决定着年鉴的质量。因此编辑在编审稿件时，必须真正负起责任。编辑人员在修改各部门报送的年鉴资料时，除把好史实关、数据关、政治观、保密关等外，要善于发现亮点、特点和闪光点，再挖掘、再提炼，突出年鉴的可读性、资料性，增强年鉴的地方特色和年度特点。第四要重视图照的编排。图照在年鉴中非常醒目，很多人首先看的是图照，因此编排好图照为年鉴增加亮点，增强吸引力具有重要作用。图照一是要清晰精美，反映事物的主题要突出；二是要要素要齐全，说明注释要精准，不能是事而非，更不能引起歧义；三是要编排要有规矩，要有标准，那些图片能上，那些不能上，都要有具体的标

十三五规划

认真制定好实施好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大力推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

张占社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15〕64号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下称《规划纲要》),9月3日,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开发布。这是国务院继2006年5月18日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时隔近10年后,再度专门就地方志工作出台政策性文件,也是第一次出台关于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规划性文件,凸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志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对确保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贯彻实施好《规划纲要》,是事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志的一项重要工作。

《规划纲要》是我国第一部全国地方志事业规划性文件,其颁布施行,标志着地方志从“一本书主义”向一项事业的转型,标志着全国地方志事业从此走上规划先行、以科学规划引领发展的道路。这是地方志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必将载入地方志发展史册。2016年5月,省政府制定印发了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这是指导我省今后五年地方志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我们要充分认识《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颁行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把握其科学内涵,并切实做好贯彻落实工作,确保规划任务圆满完成、规划目标顺利实现。

一、增强全面落实《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准,不能随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要编出高质量的年鉴,关键还在于编辑人员,因此要努力提高编辑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强化他们工作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使他们凝心聚力,把心思和

2016年是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落实《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关键之年。我们增强全面落实《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信心,开拓创新。

第一,《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一纳入、八到位”为突出主线,立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对今后一个时期地方志事业平稳、有序、健康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是今后几年我们推进工作的“总抓手”和行动指南。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就要既内化于心,又外化在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实践中。要对照《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一条一条实施,一项一项完成。

第二,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标志性传统文化形式之一,有其独特的魅力,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教化人心、巩固信仰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不仅有助于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动地方志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使地方志事业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融相通、互助共进,还有助于我们用正

精力用在年鉴工作上,努力做到常编常新,编出水平,办出质量,使年鉴真正成为各地对外宣传的窗口,各级领导资政的助手,服务社会各界的纽带。

(作者: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处长)

确的历史观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破除其危害，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新发展。

第三，推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全面落实《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时不我待。我省新编地方志事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一定成绩，形成了以修志编鉴为主业，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地情资料库建设、旧志整理等工作协调开展的事业格局。但不能忽视的是，还存在一些制约事业发展的难题。主要有：部分市州和部分市县区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国务院《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以及地方志法规规章落实到位，机构不健全，编制、人员和经费不足，等等。妥善解决这些制约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难题，推动地方志事业顺利发展，还需要爬坡过坎。而规划先行，谋定后动，无疑是做好工作的有效方法。通过科学规划，加强统筹安排，明确“十三五”时期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明晰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是不断推进地方志由“一本书主义”向一项事业的转型升级，不断推进由“依法修志”向“依法治志”的转型升级。

二、增强落实《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能动性

增强落实《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能动性，要厚植发展优势，破解发展难题，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

第一，《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顺应时势要求，将创新放在地方志事业发展全局的核心，明确提出要坚持改革创新，正确把握发展规律，深化改革，与时俱进，不断拓展地方志工作领域，丰富地方志成果表现形式。同时，《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制定，始终坚持创新，明确地方志事业走“体系化”建设的思路。在《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职责基础上，拓展了地方志工作的范围；创造性地提出了“为国存史”“修志问道、直笔著史”方志人精神等概念；首次提出硬性指标，限

定完成任务的时间，明确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以下简称“两全”目标）。

第二，《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强调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各项工作协调可持续发展，到2020年，基本形成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建设“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这就要求我们促进修志编鉴等各项工作协调发展，齐头并进。

第三，《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强调修志为用，呼应时代要求，全面提升开发利用水平；要求拓宽用志领域，提升服务大局能力，为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服务；要求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读志用志水平。地方志工作者要树立“共享方志”理念，积极主动地将地方志工作放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到经世致用；同时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趋势，大力推进“互联网+”，推动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传统手段与互联网新媒体结合，做到与时俱进。

三、制定本市州、本县区地方志事业“十三五”规划应坚持的几项原则

第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地方志事业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为国存史、为党立言、为民修志的使命意识。地方志工作者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进一步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这是对地方志工作最大的政治要求。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修志立场，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历史观，始终围绕“为谁修志、修什么志、怎样修志”这一根本问题来开展工作。“为谁修志”，是个方向问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了这样的修志立场，才能够坐住、坐稳、坐热“冷板凳”，把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地方志工作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筑牢思想根基，站稳政治立场，传导正能量。

第二，要坚持落实“一纳入、八到位”。“一纳入、八到位”是刘延东副总理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提出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工作报告中作为重要经验加以强调的，是新时期做好地方志工作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对30多年来地方志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凝炼，是对修志历史智慧的精确归纳，是为推动解决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而提出的。“一纳入”，就是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八到位”，就是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以贯彻落实“一纳入、八到位”为突出主线，对2015—2020年间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和地方志工作推进作出了顶层设计。要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就必须按照“一纳入、八到位”要求，逐条逐项找差距，扎扎实实抓落实。各地要依法开展行政督察，逐级检查“一纳入、八到位”的落实情况，为地方志事业的平稳、有序、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第三，要坚持依法治志。依法治志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地方志事业上的重要实践。我们要以“一纳入、八到位”为总要求，推动地方志从依法修志到依法识志、依法修志、依法用志、依法管志、依法存志和依法传志等的转型发展。一方面，要强化依法治志思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规划纲要》明确了各级政府、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地方志工作中的法定职责。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要求，地方志工作不是想不想干、要不要做的事，而是必须完成的一项法定职责。各级政府依法对地方志工作负有主体责任，就有责任落实“一纳入、八到位”，在人财物上给予支持，为地方志工作机构开展工作提供保障，

明确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承担开展工作的具体责任，就要切实承担主导作用，认真履职尽责。另一方面，要转变工作模式。要将地方志工作放在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规划纲要》规定的轨道上、框架下运行，用法治思维破解发展难题，用法治手段保障《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

第四，要坚持全面统筹。随着地方志事业的升级发展，地方志工作格局实现由“一本书主义”向“兴一方事业”转变，地方志成果实现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工作职能实现由志鉴编纂向全面治志的转变。面对新形势，我们要准确把握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既登高望远，又脚踏实地，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全力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一方面，要全面统筹《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规定任务。“两全”目标是具有约束性的硬任务，加快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准备、加强对社会修志的指导和管理等也是必须做好的工作。我们要认真梳理工作任务，充分发挥指标导向作用，统筹兼顾，协调推进，远近兼顾，确保各项任务目标都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另一方面，要全面统筹地方志编纂力量。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地方志工作形成的基本工作体制，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我们要运用新思路、推出新举措、创建新机制，统筹地方志系统内与系统外两种力量，既不断增加内生动力，又不断强化协作力度，推动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地方志事业的大好局面。

第五，要坚持弘扬方志人精神。人无精神不立，一个人要有点精神，一个群体也要有点精神，否则就容易迷失方向。地方志工作不但辛辛苦苦、默默无闻，而且清清贫贫，更是需要有点精神。《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了“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蕴含着方志人“爱岗敬业、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价值追求，“经世致

用、秉笔直书、锲而不舍”的史官风范，“恪尽职守、真抓实干、开拓进取”的职业操守，体现了方志人的精神追求。我们要进一步弘扬方志人精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冷”部门做出一番“热”事业，在“小”单位干出一番“大”成就。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明确地方志的功能定位，明确地方志事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牢记宗旨、提高本领、锤炼作风，讲奉献、敢担当、勇创新，把规划蓝图变为现实。二是要充满对地方志事业的激情。只有充满激情、淡泊明志、甘于奉献，才能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才能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三是要始终坚持存真求实。地方志工作者承担着为民族写

史、为时代立传的职责使命，必须秉持“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以“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胆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不断编修出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地域特色的地方志成果。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地方志事业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也踏上了新的征程。2016年的中心工作，说到底，就是“落实”二字。“一事情接着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的韧劲儿，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干到底，全力完成《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力推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处长）

《兰州市志》《甘肃省志·建置志》

《甘肃省志·卫生志（1986—2010）》

《甘肃省志·军事志（1991—2010）》通过终审

2016年10月28日，甘肃省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夏红民在省政府中楼四楼会议室主持召开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终审《兰州市志》、《甘肃省志·建置志》、《甘肃省志·卫生志（1986—2010）》、《甘肃省志·军事志（1991—2010）》。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常正国、中共甘肃省委副秘书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刘玉生，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张军利，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李振宇和部分审稿人员参加。《兰州市志》、《甘肃省志·建置志》、《甘肃省志·卫生志（1986—2010）》、《甘肃省志·军事志（1991—2010）》编纂人员及相关领导列席会议。

《兰州市志》由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张军利主审，《甘肃省志·建置志》由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主审，《甘肃省志·卫生志（1986—2010）》、《甘肃省志·军事志（1991—2010）》由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李振宇主审。在听取各主审的汇报意见后，参与评审的编委会领导均从不同方面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最后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四部志书终审通过。

最后，夏红民副省长指出，编修地方志是甘肃文化大省建设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要进一步抓好史志的编纂工作，切实提高志书质量；坚持修用并举原则，开展好修志、读志、用志工作，总结前人经验，指导今后工作；要求把日常工作与修志工作相结合，保持修志工作常态化；要强化措施，精心组织，加快修志进度，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二轮修志任务。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余德艳供稿）

科技志编修释疑

尤九成

一、地方志的基本知识

(一) 地方志的定义、特征、功能和类型

国务院温家宝总理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对地方志作了明确的定义：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方志是反映区域自然、人文、社会、经济全貌的全面、系统、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它具有记事全面、包罗广泛、资料丰富等特点，被喻为地方“百科全书”和“博物之书”。从性质上说，地方志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地方志的特征主要有地方性、综合性、资料性和连续性。地方志的功能主要为存史、资治、教化。“存史”也即保存资料，这是修志的最基本任务，也是志书首要的最基础功能。“资治”是为社会方方面面的治理提供可靠依据和历史借鉴，为地方官员施政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和历史借鉴。这一功用是地方志自古至今的传统，也是地方志书的最重要功能，史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各级领导决策，必须从地区或行业部门的实际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地情。而领导系统了解地情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利用地方志，历史上曾长期流传着“新官上任先看志”的说法。教化，古代另说“裨风教”，现代另说“教育”。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非常重视地方志的“教化”作用，也即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这是地方志书具有最广泛意义的功用。编修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一项造福于千秋万代的系统文化工程。新方志记载了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曲折历程，体现了生生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

教育的生动素材，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稳定社会秩序、激发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岗敬业教育、行业传统训练、专业技能培训等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志书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

地方志类型，从区域上说，有省志、市志、县区志、乡镇志、村志等。从时间断限上，可分为通志、断代志。从性质上讲，有综合志、行业志、部门志、院校志等。科技志从性质上讲，属于行业志，而不是部门志。部门志只记述一个部门的事物，而行业志一个区域内同业的内容都要记述。

(二) 地方志的发展史

中国方志具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五个发展时期。

(一) 春秋战国以前是方志的萌芽时期。《禹贡》、《周官》和《山海经》都是方志起源阶段的萌芽。

(二) 汉晋隋唐是方志的形成时期。《益州志》是第一部以地方冠名的方志，被学者们认为是地方志的先例。《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志书中时间最早的志书。

(三) 宋元是方志的成熟时期。著名的方志有《太平寰宇记》、《大元一统志》。

(四) 明清是方志的兴盛时期。清代方志达到了全盛时期，现存清代志书4889种，占现存历代方志总数8264种的59.16%。

(五) 新中国是方志的辉煌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2003年，已经出版各种志书5000余部，平均每年修成志书100部以上。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当代出版的志书，均属社会主义新方志。

(三) 地方志的体例

地方志体例主要包括结构、体裁、章法三项内容。志书最基本的体例是“横排竖写”。“横排”是分门别类，需要研究事物的横向关系。“竖写”是纵述史实，需要研究事物的时代进程。

“横排”的目的是展开门类，以包容资料。

横排的关键在分类，在掌握记述对象的本质属性和逻辑关系，“事为一类”（即同一性质归为一类）。即分类掌握事物的母项、子项和标准。门类上下级是领属关系，同级是平等关系。另外，平等类目排列的先后也有科学性。一是按因果（如先“公路建设”再“公路营运”），二是按主次（先排“城镇建设”，再排“乡村建设”），三是按连带关系，如“企业集团”多元经营，放在其主要经营的行业内容中立目介绍。

横排门类要以事物的专业属性及其基本构成要素作为划分的标准。横排门类是地方志篇目设置的基本原则，不同门类的事物要放在不同的单元里记述，同一门类的事物一般要放在同一个单元里记述。但一个事物的属性可能具有多重性，因此在横排门类设置篇目时，依据事物的什么属性来“横排”就显得颇为复杂。例如记述工业的专业志，按工业所有制的属性，可分为个体工业、私营工业、集体工业、全民工业、外资工业、合资工业等；按工业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属性，可分为乡镇工业、教育系统工业、粮食系统工业等；按工业产业的属性，可分为轻工业、重工业等；按工业行业的属性，可分为纺织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等。这种行业的属性，我们认为才是工业的专业属性。

按照事物的专业属性及其基本构成要素层层切分设置篇目时，划分的层次应当适中，不宜设得太多。层次过多，容易将较为完整的事物割裂得支离破碎。通常设置篇或编、章、节、目4个层次较为适中，最好不要超过4个层次。判断层次设置是否适中的标准，是最低的层次可以完整地反映一个基本事实的面貌。

结构即志书的编排形式，要求事以类聚、横排门类。比如《北道区志》，除志首编纂委员会及工作人

员名录、序言、凡例、图片、概述、大事记外，设建置区划、自然地理、人口、中国共产党、政权、政协党派群团、经济综述、城乡建设、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工业、农业、商业、林业、交通邮电、财政税务、金融保险、人民生活、经济管理、公安司法、军事、民政、劳动人事、教育、科技、文化、文物、医疗卫生、体育、宗教民俗方言、人物等30篇。

《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指出：“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包括志书“七要素”，以志为主体。”地方志体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

述：总述、概述、导言。“概述”在旧志中是没有的，是黄炎培编《沙川县志》时首创。从提高志书可读性着想，志书设“概述”比不设好，写得精妙的“概述”对许多读者具有吸引力。

记：大事记。凡“大事记”上记的内容，志书各篇章中都有翔实的记载。“大事记”只是把志书中重大史事从各门类中集中起来，依时序扼要叙述而已。内容浩繁的志书中设置“大事记”是必要的，它便于读者了解一个地方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或相互影响。“大事记”从纵向梳理了志书重大内容，使之条理、鲜明，无疑是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的。志书绝大多数都设有“大事记”或“大事年表”，写好“大事记”，掌握标准要适当，要防止宽滥。要适当运用记事本末体，避免情况过于零散。

志：是志书的主体，分成若干篇章等，如建置区划、人口等；“志”，这是志书中最基本的体裁，是资料的主要载体（也就是正文）。它主要特点是：只记不述，或述而不论，综述史实，直陈其事。志书应该在保证系统记录各项基本地情的同时，要更翔实地更深入地记录一些重大情况和典型事实。就象电影电视那样，既要有全景扫描，又要有局部的特写，观众对事物感受才深切。志书内容即正文一般要追根溯源，从事物的源头记起，记述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结果或效应，直记述至志书下限时期的现状。

传：人物传。就是写人，也可说是以人写史，史从人出。充分写人，就能极大地增加史志的真切感，

提高志书的可读性。写上成功人士积极进取、奋斗拼搏的生动事迹，很能体现时代精神，富有教育意义。

图：地图、照片等；“图”，包括地图、照片、白描图等。图照收录要以是否具有资料价值为原则，无存史价值的图照一律不收。图片照片要以反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重大技术发明、重大建设项目、重大活动，主要名胜风景、文物古迹、名特土产、民俗风情、工艺美术等为重点内容，合理确定图照的总量及各部分内容的相应比例，做到典型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图照的选用应当注重典型性、科学性和存史价值的统一，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严格把握选用尺度。图照与文字内容相配合，图照的说明文字要准确。

表：是综合的以简驭繁的记录情况的一种体裁。一表抵千言，志书中适当设置序列表、人物表、情况表、统计表，可以节省许多文字的叙述。表能使情况具有条理性、直观性（序列表），自然也有增加可读性。志书中较多的是数据统计表，它能集中保存事物量变的资料，基本的统计表在志书中是不能缺少的。对于研究工作、决策参考是理要的依据。从可读性来说，表格避免文字叙述的重复、罗嗦感。但表格是按栏目填写，重点难以详载，而且它只记录数值变化，不涉及原因，因此不能在经济部类中以表代文。数据表述“可读述”更强的是统计图，但统计图展示的资料较为有限，不能因图而废表。因此，志书的各种体裁应当综合运用，宜图则图，宜表则表，宜文则文，取长补短，相互配合，共载地情，争取达到完满境界。

录：附录（杂记、文献节录等）。在志书七种体裁中被排在末位，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它辑录一些重要的原始资料入志，往往倍受一些用志者青睐。

我们编纂志书通常使用七种体裁，这是共性；如何运用体裁，主要使用什么体裁，又要因书制宜，由于内容的差异而各有人性，不能强求一模一样。

章法指凡例即对志书撰写的一般要求。如对志书指导思想、时间断限、文体、内容、编纂原则、立传标准、行文规定、资料来源等各种问题的规定。

（四）编修地方志的基本原则

1. 坚持依法修志的原则，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记述民族、宗教、政法、军事、外事等方面内容，要格外审慎；志稿形成后，应主动征求有关主管部门的意见，严格履行审查验收程序。

2.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客观反映本地的优势、成绩和经验，也要客观反映本地的劣势、不足和教训，不溢美，不谀过，不隐恶。

3. 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把质量意识、精品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着力提高地方志书质量。正确处理质量与进度的关系，进度服从质量。

4. 坚持“述而不论”的原则，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在“述”体中的必要议论，要把握好适度性。

5. 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重大影响、有突出贡献、有代表性的在世人物，主要采用以事系人的方式记述；在人物简介、人物表（录）中需要反映的，要严格掌握收录标准。

二、如何编修科技志

（一）编修科技志的机构队伍

志书官修，由来已久。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历代都把修志作为官职官责，延至今日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2006年5月18日，温家宝总理以国务院467号令公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以法规形式明确了修志工作的重要地位，使修志成为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结束了修志工作无法可依的局面，使修志工作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编修志书历来有“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志办牵头，各方参与，社会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修好科技志，必须切实加强领导，成立修志机构，调配得力修志人员，确定任务分工，谁是主编、副主编，谁是主笔，谁具体收集资料，都要一一落实到位。从编纂地方综合志来说，要落实“一纳入、五到位”政策，即要坚持把修志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

划和政府的任务之中，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这是做好地方志工作基本的和必需的基础。同时，要发挥专职修志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对主编、主笔及其他修志人员的业务培训；吸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有业务专长的其他人员参与修志。

（二）科技志的篇目设置

地方志制订篇目的要求是：1. 按事物的科学属性分类。事以类从，横排门类，设篇立章，设节立目；要处理好统属关系，做到纲举目张。2. 避免遗漏或重复。地方志具有区域性、连续性和资料广泛性的特点，县（区）的部门各司其事，各管其业，生产、经营、管理以及人、事、物各个方面都要有记述，不能有遗漏。当然，内容上的交叉是难免的，但是记述上的重复是不应该的。3. 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安排总体篇目时，要考虑到突出本部门的特点，设章列目要详细，有的可以适当升格或前移。对于共性，即一般的东西，则不必罗列过细，避免冗赘、繁杂。4. 要简繁适当。坚持该写则长，否则从略的原则，要把反映时代特点同整个志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

地方志篇目设置要符合科学性，避免随意性。处理好容量、排列、层次、标题和升降格等问题，避免归属不当和缺项漏项，以及不必要的交叉重复。

从地方志整体篇目设置来说，任何地方志无非包括机构、人、事、物四个方面。科学技术志篇目设置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自然科学一般应包括科研机构、科研队伍、科普活动、科技成果、科技情报及科技管理等内容。科研机构，应含各级专业科研机构组织，如研究所、站、农科网以及专业科局和厂矿的科股、室等。通过对这些科研机构的记述，以反映各地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和多功能的科技网络。科研队伍，要记述各个时期科研人员的增减、年龄、文化、职称结构的变化，以及人才交流、专业分布等情况。除了记述专业科技人员外，对于乡镇企业的科技人员、乡村的农民技术员、

科技示范户以及民间的能工巧匠等，也应予以记述。科技普及，主要包括科普宣传、技术培训和科技咨询三个方面。科技成果，主要包括获奖成果、成果推广、科技情报等方面的内容。记述获奖的成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推广应用的科技成果，应选取在本地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记述。科技情报，反映对科技信息的搜集、整理、分布、相互交换以及形成网络的情况。科技管理，包括计划管理、经费管理和成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在记述各项管理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反映科技体制改革后的成果。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应该按照地方志的体例要求，根据当地的情况实际，予以取舍和编排，或者与自然科学结合设计记述，或者二者分别设置记述。篇目设计合理了，才能为写好科学技术志提供前提条件。

（三）科技志的资料收集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方志其功能的大小和用途的多少，都依赖于资料性的强弱和收录资料的多少，都是存史功能的延伸和派生。方志资料按来源的基本类别，可以分为文字资料、口头资料、实物资料三种。

（一）文字资料。包括文献档案、统计资料和图书报刊等类。

1. 档案资料。档案馆以及各部门档案室储藏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政法、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档案，为编修志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些档案多是历史活动的原始记录，不仅史料丰富，而且相当全面，同时相对来说比较可靠，具有一定权威性，是编修志书的重要资料来源。如区档案局保存的区委、政府卷档案及部门档案、科技局的内部档案等。
2.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史书、地情丛书等。
3. 统计资料。统计资料包括统计数字和统计图表。它是由统计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汇编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统计数字、图表是观察、研究社会或一个部门发展变迁的主要资料。
4. 图书报刊资料。图书报刊是编修志书所需资料的重要来源。私人撰著、科技专著、各种报刊杂志，都有对地方、自然和社会不同程度的记述，“群书采录”，从中

可以汇集起丰富的资料。5. 其他文字资料。诸如书信、日记、讲演稿、同乡同学录、帐簿、票据、合同、契约、厂(店)规、章程、广告、启示、声明等,都是编修志书不可忽视的文字资料。6. 网络资料。网络资料需对资料进行甄别,选取价值高、可信度高的资料。(二) 口述资料。从当事人或知情人那里搜集的回忆录、社会风俗、遗闻轶事、传说、民间故事、谚语民谣,以及实地调查的记录材料等。这部分多是新资料,因而值得修志工作者高度重视。(三) 实物资料。包括古文化遗址、遗迹、古建筑、化石、碑刻、地图、书画、照片等。在这里,尤其要重视照片资料,它真实地反映实物的形象和当时当地的历史真实面貌,一张照片胜过若干文字,应注意收集。

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我们修志首先要干什么,就是系统保存资料,而不是任意发挥个人见解;同时也让我们明确了收集资料是修志的最基础工作,首先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好资料收集工作。

加强对资料收集的力度,积极拓展资料收集的范围。应重视社会调查,注意收集口述、音像等资料。做好资料的鉴别、筛选工作,避免失实、欠缺和选材不当等问题,保证资料的可靠性与完整性。对重要资料来源注明出处,对具有时代特征和地方特点的词汇作准确、简明、规范的注释。编写志稿前,应对入志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编辑好资料长编。

(四) 科技志的记述

志书存史,是传世之作。编修部门行业志,要全面系统地将本部门本行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客观真实地载入史册,这要求所有编写人员必须立足于历史高度、行业高度、全志高度,也就是必须高屋建瓴,放眼全行业,瞻顾全志,全面看问题,系统梳理材料,将最能反映事物本质面貌的资料纳入有限的篇章之中。

科技志,要实录行业历史,反映行业现状,汇集行业文化,展示行业风采。强调突出专业行业特色,是为了系统反映行业发展规律,确保将行业的基本业务内容收录入志。尤其是部门行业志,更要注意突出本部门本行业的主体业务,不能把具有专业行业特色

的主体内容淹没在大量次要内容之中,喧宾夺主,显示不出本专业本行业的基本特点、属性和发展规律。

为此,编修科技志必须立足三个高度:

(1) 立足历史高度。强调立足历史高度,主要追求存史价值。在修志实践中,我们常遇一个通病,就是记述过于琐细,存史价值不高,微观记述有余,宏观中观不足,缺乏对具体资料的提炼、升华和综合概括,编写人员对历史发展的主线没有清晰的认识,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和认识事物盛衰起伏和兴废交替的发展规律,不善于围绕历史主线组织和取舍材料,不善于用史家之笔去记述好宏大久远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事,因而也不能让读者观百科而不觉繁琐,明万物而不觉冗长,主要原因就是历史高度不够。

(2) 立足行业高度。强调立足行业高度,主要追求反映全貌。部门行业志,原则上也是一个部门或一个行业的综合性志书,不仅述、记、志、传、图、表、录诸种体裁要兼备,而且要体制、机构、队伍、管理、企事业、各项业务等都要记载,并且还得覆盖下属各个层级。都由许多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必须立足全行业,写出本部门、本领域、本专业全貌,不能只写自己管过的、知道的事情或某一段时间里的事情。稍不留意,可能会出现重要缺漏失真现象,不能真实反映新的时代特点,不利于读者了解该行业的全部,影响志书的整体质量。

(3) 立足全志高度。强调立足全志高度,主要追求著述严谨。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而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其整体性、科学性和严谨性是其著述质量的重要标志。一部志书,由多人编写、多篇章节构成,编纂难度很大。它作为一个整体,从内容到形式,从体例到文风,都必须力求科学严谨,整齐划一,如出一人之手,这要求各个编写人员在编写实践中,都必须立足于全志高度,遵循统一的要求。不然势必造成篇目体例不一,时间断限不一,文风语体不一,内容详略不一,版式装帧不一,文显众家风采,体成五花八门,各随其便,过分考虑所承担部分的特殊性,擅自突破全志总体设计的统一规定,使全志成为一个松散

“拼盘”，会严重破坏全志的有机整体性和科学严谨性。

掌握地方志竖写记述的方法

地方志质量在于记述深度，要避免流水账式、平面式、观点加例证式的记述方式。

一般一个记述点要具备时间地点（时间具体到月或日；地点详细具体）、背景交代、事物缘起（追溯至事物的起始发端）、发展演变过程、人物活动（重大人物在麦积区内的活动采取以事系人的方式；重大人物在区外的活动采取以人系事的方式来撰写）、结果和效应以及现状等内容要素。撰写采用记叙文或说明文体，述而不作。总的要求是直陈其事，以事实和数据说话，不以个人好恶决定材料的取舍，也不以个人的观点对所述人、事、物加以褒贬。不夸大，不缩小，不修饰，不溢美，力求概念准确、语言规范、文字精练，力戒空话、大话和套话。各具体记述点之间一般是并列、因果、递进、转折等关系。地方志不同于文艺创作等文体，注意撰写时不能写成工作总结、报告、教科书等文体。

“竖写”也称“纵写”，即“顺时记事”，这是方志的基本体例。续志除概括断限以前的历史外（概括历史等于建房先打地基），从上限（比如《麦积区志》1985年）开始详记。由远及近纵向记述，切忌倒叙、追叙、插叙，否则就会出现时序颠倒、内容混乱的错误，主要写事物的“发生、沿革、现状”三个阶段，以现状为记述重点，理清事物的发端、演变、重要转折点。

有选择地写好事物整个运动轨迹中的起点、转折点和终点，勾勒事物发展的主要脉络，揭示事物内在的基本规律。起点即事物的起始发端，它是事物的源头，不加追溯，则转折点、终点就成了无源之水。转折点即事物发生后兴盛、衰落、恢复、再发展等的重要变化阶段。它是折射客观规律的闪光点，不加反映就会造成“断线”的错误，而且志书的记述深度也会受到影响。终点一般是指志书下限时情况对于志书下限前即已终止了的事物，要记清事物终止时的情况。终点是志书的落脚点，为“详今”、“详近”修志

原则的重点所在，不加收录就无从认识事物的现状，而且会造成志书下限不到位的弊端。

专业志记述的起点、转折点、终点确定之后，要将历史分别定格于这些“点”，并在此处对事物一一进行横断面的解剖。无论是对起点，还是对转折点、终点的解剖，都要牢牢树立“面”的观念，努力对事物在当时全境域范围内发展的宏观情况进行全面地反映。这就要求修志者充分地占有资料，并对各种资料进行科学的梳理和高度地综合与概括，努力站在全境域、全专业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写出整个事物的大势大略，切忌以“点”（典型资料）代“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记述事物的三个“点”时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写起点应该注意追溯起始发端要适可而止。如果对所采用的史料不加辨别，盲目轻信，甚至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不但不能为家乡的历史增光添彩，反而会弄巧成拙甚至会给志书造成硬伤。第二，记转折点时，对于历史悠久、演变过程特别复杂的事物，可以选择该事物发展史上的顶峰或谷底作为着力点，以节省篇幅，进一步突出主线。第三，在记述“转折点”时，还应当对造成这个“转折”的原因进行适当的交待。事物的变化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总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影响事物变化的外部原因，一般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物质因素，其中自然因素的影响最为持久，物质因素的影响最为“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最为巨大。不加记述或记述不清，就会影响志书的深度，削弱志书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当然，无论是哪种“转折”的因素，都毕竟是“主角”出场前的铺垫，因而只能简要地记述。

精选典型，深化记述。宏观内容的主要作用在于展示志书记述的广度，这是志书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选择、收录典型的人、事、物，以加强志书记述的深度。使用典型资料应当特别注意突出深、慎二字。深，指内涵深刻丰富，具有代表性。慎，指使用典型资料要慎之又慎，不可事事都用，处处滥用；宏观情况尚未记述清楚的不用，找不

到内涵深刻丰富、具有代表性的人、事物的不用，非重点记述的事物一般也不要写。

志书的记述对象可抽象为“实体”、“活动”、“效应”三项。比如：1. 自然实体。山脉、河流、森林（实体），自然变化和人类环保或破坏（活动），变化的结果是效应（环境质量、绿化覆盖率、水质、空气净化程度等）。2. 社会实体，如工厂（实体）、生产（活动）、利润和上缴税收、职工工资收、产品占有市场、产品品牌（效应）。再如学校（实体）、教学（活动）、成材（效应）。

（五）编写科学技术志需注意的问题：

编写科学技术志，要特别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要把科学技术志写成科技专著。编写时注意不要过多的使用专业名词术语，要把科学技术志写得通俗易懂，有可读性，力求达到内行能够运用，外行能够看懂的要求。第二，要注意科学技术志与其

它分志之间的交叉处理。科学技术志反映的是一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的方方面面，必然涉及到经济、地理、文化、社会等部类与之相关的内容，因此，在编辑科技志时，要注意资料剪裁和记述角度，要作到各有侧重，详略有致。第三，要注意适当反映人的活动。科学技术成果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在记述重要科技成果时要采用以事记人的方法，把在科技战线上工作卓有成效的人物，如科研项目的主持人、重大发明的创造者、民间著名的能工巧匠等，在科学技术志中或简介，或事系，或列表，尽量予以记述。这样，可以增强科学技术志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提高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第四，要注意涉密问题。地方志属公开出版物，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内容不宜入志。

（作者：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地方志办公室干部）

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

2016年10月31日，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会议，传达了省地方志办公室在“三项重点工作”会议中的相关精神及要求，对部分重点工作进行了研究讨论，对前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了系统梳理。会议明确了今后工作的重点：一是抓好《陇南市地方志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印发工作的落实情况，督促各县区史志办迅速出台“十三五”规划。市地方志办公室将成立工作组，确定专人时时督办，确保如期完成工作任务。二是加快《陇南市志》初稿编写进度，列出时间表，明确责任人。市地方志办公室将组织人员进行统稿，对于没有上报二轮志书编纂方案和志稿的个别单位要继续督促，尽快落实，争取在年底按时完成初稿。对县区志书的编写，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层层传导压力，实时关注县区志书编写动态，及时与县分管领导进行沟通，确保在2020年前县区二轮志书编撰任务全部完成。三是做好《陇南年鉴》（2016年）出版发行工作。各县区要千方百计克服客观困难，全面启动年鉴编写，保质保量完成书稿。努力做到一年一鉴，有条件的争取公开出版。四是推出《陇南史志》杂志创刊号，反映陇南党史和地方志特色。选取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稿件，创办群众满意的史志类刊物。五是实现陇南史志资源信息化、网络化。一方面要加快“陇南史志网”建设进度，在建成后要实现党史、地方志资料的数字化。另一方面要继续运营好政务微博和“陇南文史”微信公众平台，借助新媒体力量全方位宣传陇南文化。

（甘肃省陇南市地方史志办公室董云飞供稿）

大事记编写的一些粗浅认识

梁兴明

大事记是机关单位及其业务主管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等用来记录日常重要工作或活动和各方面大事、要事的一种记事性的应用文,又是回顾并记载机关历史梗概的参阅性文书。志书中的大事记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事记又有所不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对大事记作了明确要求:“大事记选录大事得当,重要事项不漏,时间、地点、人物(单位)、结果等要素齐备。专记设置因事制宜,选题严格,数量适度。”一部高质量的大事记,就是一条贯穿志书始终的大动脉,既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该地方历史的概况,又能给历史研究者提供可靠的线索与脉络。大事记提纲挈领,贯通古今,在志书中一般置于卷首,所占地位举足轻重。

因此,编写大事记,首先要确定收录的标准和范围;其次,要注意大事记的编写体例和记述要求;最后,要把握好编写步骤和注意事项。

一、收录的标准和范围

1.收录标准。确定大事的收录标准和范围,是编好大事记的关键。所谓大事,是指某一区域内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大事、要事。必须是事件的规模大、影响大、意义大,不管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只要在某一区域内有较大影响的,都应算大事。但是,大事的概念是相对的,不可能有绝对的、统一的标准,应以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为转移,研究的对象、范围不同,大事标准也就不同。我们在选择大事时,应“因志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

2.收录范围。大事记记载的内容超越时间下限的不记,超越地域范围的不必记载,不要“越界”、“涉

外”。对于内容记载,一些修志行家比较推崇李少先在《方志编纂知识》中提出六个“要记”。这六个“要记”是:第一,特别重大的事件要记;第二,重要变革的事件要记;第三,不平常的事件要记;第四,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不一定很大)要记;第五,为后人所效法、有教育意义的要记;第六,为后人引以为戒的事件要记。如果从实际出发,做到了六个要记,一个地区凡有重要意义、重要影响、重要历史价值的事件,基本可包罗无遗了。

二、编写体例和记述要求

1.编写体例

大事记编写选用何种体例,关系到大事记的结构和质量。通过编写大事记的实践,一般认为,大事记编写体例宜采用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的编写方法。其优点:以编年体为主,也就是按历史年代和时间顺序逐年编写,不违背志书大事记的基本要求,清晰体现历史发展的脉络。结合记事本末体,可以在不违背历史年代和时间顺序的前提下,对一些一次性事件(如某项工程等)采用集中编写的方法,使事件不零乱,保持事件的完整性。

2.记述要求

(1)详略得当。上届修志时已记的大事、要事本届不予重复。但为了避免旧方志大事记简到类似于目录索引,无任何情节变化的缺点,本届修志在大事记编写时志详则略记,志缺则详记。对于未设专门章节的那些内容,可适当详记。宜粗者叙其大概,宜细者记明时间、地点、原因、情节演变、结果等。但过分强调情节生动,造成大事记的冗长、琐碎也是不可取的。

(2)简明扼要。语言要精练。写大事记要求语

言文字十分精练，同时又使人读得懂，真正做到文约事丰，言简意赅。一般不要解释原因，也不要阐述事情的经过。

(3) 互不矛盾这是要求大事记内容不能与志书正文内容矛盾抵触，应保持一致。同时，大事记本身内容前后也不能矛盾。

三、编写步骤和注意事项

1. 编写步骤

大事记是一方之简史，工作量较大。我们在编写时一般宜在志书成稿的基础上进行资料搜集，先编成资料汇编，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补缺订讹。然后在资料汇编意见稿之上进行筛选和正式编写大事记初稿。如果按这两步走，一般不会出现大的缺漏，质量也有一定保证。

2. 编写中注意事项

(1) 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选择大事要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做到政治观点正确，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是选择大事的指导思想。

(2) 严格选择，突出大事。大事记不是“流水账”似的记事本，所记载的必须是大事、要事，而不是琐事、凡事。既要取材广泛，前后贯通，又要防止事无大小，逢事即记，而将真正的大事湮没在常事之中。

(3) 取材要全面，避免遗漏。编写大事记前要充分占有资料，对确定入选的资料要充分确认、排比。大事记要反映各部门、各战线、各行业的大事、要事、新事，所以必须有目的、有重点地选择大事，不能“东拼西凑”，既要有条条、块块上的情况，又要有点上情况，如果缺少某一行行业、部门的情况，即会缺项断限，就会与实际面貌不符，导致大事的遗漏。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全文数据库及网站 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2016年12月15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召开专家验收会，对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全文数据库及网站建设项目进行评审验收。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参加验收会并作总结讲话。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处长张占社就项目建设的汇报，现场核查了设备型号、性能及机房施工情况，查阅了相关文件资料，并就网页优化完善、信息安全、系统完善维护、信息数据有效利用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经过评审讨论，专家组认为，该项目硬件配置符合合同约定，系统建设定位清晰，数据库系统及搜索引擎实用性强，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全文数据库及网站建设不仅是甘肃省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新突破，更是社会各界学习利用新编史志成果的新窗口、新途径。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李佳潞供稿)

甘肃籍学人对《四库全书》的重要贡献

朱克雄

《四库全书》是在清朝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纂，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我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同前苏联关系恶化，为了确保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安全，1966年10月在周总理亲自批示下，文化部决定将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拨交甘肃保存。上世纪九十年代，辽宁省有关方面向甘肃省表示希望文溯阁《四库全书》回迁辽宁，甘肃没有答应。50年来，这部《四库全书》已经成为甘肃人的荣耀，更是甘肃的一张文化名片。

《四库全书》从完成至今的两百多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洗自

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洗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洗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洗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目前《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如今《四库全书》只存三部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半部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据统计，《四库全书》的正本（著录书）中共收录了甘肃作者14人，著作18种182卷，存目中有16人，共计30人。尽管甘肃学人的著作在数量上不能同江浙等地的相比，但甘肃学人对《四库全书》的重要贡献载入史册，其著作在《四库全书》中的占有的较大分量有目共睹。

尹喜《关尹子》1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尹喜，字文公，号文始先生，或称“关尹”。甘肃天水人，周敬王（?-前477年）之大夫，他自幼究览古籍，精通历法，善观天文，习占星之术，能知前古而见未来，周敬王二十三年，眼见天下将乱，他便辞去大夫之职，

请任函谷关令，以藏身下僚，寄迹微职，静心修道。

《关尹子》又名《文始经》《关令子》，全名《文始真经》。道家著作。作者系周代函谷关令尹喜。书分上、下两卷，9篇171章。仿佛《老子》《庄子》《列子》一样，《关尹子》也是以作者而命名的。不过，“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相传老子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离开周西出函关。函关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留，希求指教。老子为他留《道德经》五千言，骑牛西去。关令尹喜研读老子之学，多有心得体会，发而为文，成《关尹子》一书。然而，兵燹灾难，其书佚失。称之为《文始真经》，乃是道教兴起之后的事情，仿佛《庄子》被称做《南华经》一样。因为庄子被封做南华真人，所以他的著作也改称做《南华经》。而关尹子被封做了文始真人，所以其书也改称做《文始真经》。所谓“文始”，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文明之始。因为他接受了老子的教诲，从而开发智慧，修证大道，得到成就，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他的思想片断，保留在《吕氏春秋》《庄子》中，其主要思想：提出了“常无”“常有”，将“太一”（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作为万物的根本；以懦弱谦下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内心空灵虚静，与万物和谐相处；顺应自然，因势利导，静处平静不杂；不为人先，与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相似。

王符《潜夫论》10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王符(85年-162年)，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东汉政论家、文学家、进步思想家，无神论者。

《潜夫论》共三十六篇，多数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少数也涉及哲学问题。王符对东汉后期政治社会提出广泛尖锐的批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各个方面，指出其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认为这些皆出于“衰世之务”，并引经据典，用历史教训警告当时的统治者。把社会的黑暗动乱的根源归之于统治者的昏暗不明，把治理乱世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他希望明君能任贤使能，

忠信纳谏，天下就能太平。他建议采取考功、明选等办法，来改革吏治，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强烈参政要求。他的政论文中有同情人民重视人民的思想，他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这是对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经济政策上，他要求重本抑末，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爱惜民力，重视对边远地区的防御和建设。他反对谶纬迷信，大量揭露官吏豪强奢侈浪费和迫害人民的罪行。

皇甫谧11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针灸甲乙经》八卷和《高士传》三卷被《四库全书》收录。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人。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享年68岁。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布衣学者，皇甫谧在文学、史学、历法学、医学方面均有贡献。他所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理论系统、临床内容丰富的针灸专科典籍，对我国针灸学，特别是针灸文献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深远影响。《针灸甲乙经》八卷，全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黄帝针灸经》《针灸经》《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主要由《素问》《九卷》《明堂》三部古医经类集而成。据现行本自序，该书系皇甫谧编辑，成书于魏·甘露(256-259年)年间。宋·林亿校本《甲乙经》自北宋刊行后，南宋、金、元均未见重刊，现存最早刊本为明·万历吴勉学校刊《医学六经》本。此本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收入吴勉学校刊《医统正脉》丛中，现存此书多系清代书坊重修本，断版缺字较多，并可见较多的补版。又有明代蓝格抄本，出自宋校本，但与“六经本”非出自同一底本，可校补前者脱误之处颇多。此本非精抄本，前后体例不一，错乱、残缺之处也不少。《四库全书》本与余云岫所引之所谓“嘉靖本”相吻合，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故校勘《甲乙经》一书，当以“六经本”为底本，以“明抄本”作主校本，以“四库本”作参校本。至于所谓“抄正统本”者，问题很多，作伪充古之迹显然，不宜再作为校勘《甲乙经》的依据。

传世本《甲乙经》至少有四重构成，即：皇甫谧所编之原集，宋以前医家补注之文，宋代林亿校注，宋

以后注文。其中标有“素问曰”“九卷曰”等文字及注有“解曰”之类注解性文字系原书旧文,非唐宋间人所增补。“六经本”中双行小字注文绝大多数系宋人注文。

现行本卷首所载“序例”一篇系原书旧有,非林亿新增。宋以前医书所引《甲乙经》之文体例多与此“序例”相吻合,宋本《甲乙经》仍与“序例”基本相符,而传世本颇与此“序例”不同者,系后人,特别是宋以后人所删改。

现存的《高士传》分上、中、下三卷,采尧、舜、夏、商、周、秦、汉、魏古今八代之士,立91传,其中《长沮桀溺》《鲁二徵士》一传记2人,《四皓》一传记4人,共记96人。立传的标准,用皇甫谧自己的话说是“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皇甫谧·高士传序》)。按照这个标准,被孔子、司马迁称颂过的伯夷、叔齐,被班固表彰过的“两龚”即龚胜、龚舍,也不在立传之列。伯夷、叔齐宁肯饿死,耻食周粟,执节很高,但毕竟有过“叩马而谏”的自屈行为;两龚断然拒绝出仕新莽,晚节很好,但早年总是出过仕的。因此,皇甫谧《高士传》记载的96名高士全是经过旁推虚、钩探九流、水中澄金而得到的没有出过仕的“高让之士”(《高士传序》)。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甚至于一个侧面的社会历史。

傅玄《傅子》1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傅玄(217年-278年),字休奕。北地郡泥阳县人。西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傅燮之孙、傅干之子。

《傅子》是傅玄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部政论、道德论和史论文集。尤其是其《贵教》《通志》《戒言》《正心》《礼乐》《大本》《法刑》《义信》《治体》《信直》和《举贤》等儒学教育思想十分丰富。

王嘉《拾遗记》10卷被《四库全书》收录。王嘉(?-390年),字子年,陇西安阳人。是当时的一个方士,滑稽好语笑。王嘉初隐居于东阳谷,凿崖居,有徒弟数百人。石季龙之末(348年),由于战乱,王嘉丢下徒弟到长安,潜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他的徒弟寻着他的遗迹也到达终南山,他又迁隐于倒兽

山。苻坚屡次征召他出山做官,他都没有答应。后被逼无奈,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冬入长安,居于宫中外殿。王嘉“能言未然之事,辞如讖记”,所以公侯以下,都到王嘉处参拜,询问世事。太元十一年(386年),姚萇入长安,仿效苻坚的做法,在礼节和待遇上都超过了苻坚对王嘉,并逼迫王嘉随从他,每件事情都要向王嘉询问。当归姚萇和苻登相持战争,姚萇问王嘉:“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王嘉回答说:“略得之。”姚萇愤怒地说:“得当云得,何略有?”于是一气之下便杀了王嘉。但后来姚萇死后,事实上确实是他的儿子姚兴杀掉苻登的。遗憾的是姚萇不曾听懂王嘉的话,怒气之下杀了不该杀的人。

前秦王嘉的志怪小说《拾遗记》(一名《王子年拾遗记》)原书19卷、220篇,由于苻秦之际的战乱,典章散失。南朝梁代的萧绮缀拾成文,合为一部,改编为10卷,今行于世。《拾遗记》中的一些篇段故事情节、人物描写等方面都较为完善,初具短篇小说规模。王嘉可谓中国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刘昫《人物志注》3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刘昫,字延明,敦煌人,十六国时期河西著名学者。

刘昫编著的《人物志注》一书经近代学者翻译在美国出版后,曾经引起极大轰动,被誉为“早于西方千年的人文主义著作”。

李世民《帝范》4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1月28日<一说599年1月23日>-公元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帝范》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共十二篇: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为文虽短,但文辞有力而优美,展现出一代英主对人生和世界的体悟;也是一个马上争天下、马下治天下的开国君主一生经验的总结。其充满哲理性的语言,或一言中的,或一语道破天机。不但闪露着看问题的高瞻远瞩,也隐含着论理的深邃透彻。《帝范》一书是李世民一生执政经验的高度浓缩。他曾经这样告诉太子:“饬躬阐政

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可见，他对《帝范》的高度自信。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帝范》中，他对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选任和统御下属的学问，乃至经济民生、教育军事等家国事务都做出了非常有见地的解答。毛泽东曾说“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即：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晚上同人高谈经典文事。”对这位古代领袖俊杰的为政能力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李隆基《孝经正义》3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亦称唐明皇，公元685年出生在东都洛阳，祖籍陇西成纪，712年至756年在位。前期注意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他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极盛之世，在位后期宠爱杨贵妃，怠慢朝政，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等，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佞臣，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为唐朝中衰埋下伏笔。756年李亨即位，尊其为太上皇，762年病逝。

唐开元七年（719年），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至天宝二年（743年），玄宗又重注《孝经》，为开元注作了增补及修订。《孝经注疏序》称，“唐明皇遂于先儒注中采摭菁英，芟去烦乱，撮其义理允当者，用为注解。至天宝二年（743年）注成，颁行天下”。玄宗注参用孔、郑及韦昭、王肃、虞翻、刘劭、刘炫、陆澄等家之注并举出六家注本之异同，分别列于经文后。而“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御注序》）。《孝经》今古文之争的论战，由玄宗注而肯定了今文。至天宝三年（744年），“诏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唐会要》卷七十五）。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更亲以八分书写《孝经》并刻石于太学，谓“石台《孝经》”，对后世影响很大。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诏令邢昺为《孝经正义》作疏。今存《十三经注疏》之中，为后代流行之注疏本。

李绹《李相国论事集》6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绹（公元764—830年）字深之，赵州赞皇人，祖籍陇西成纪，宰邑臣李刚之孙，襄州录事参军李元善之子，大唐王朝官员。擢进士、博学宏辞，授秘书省校书郎，补渭南尉。德宗皇帝贞元末年（805年），拜监察御史，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宪宗皇帝元和初年（806年），改尚书主客员外郎，未几，转司勋员外郎。元和五年（810年），迁本司郎中、知制诰。继历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帝数赐对三殿，甚敬惮之。每有询访，随事补益，累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爵高邑县男。言愈切直，与李吉甫等不协，以足疾求免，罢为礼部尚书。寻改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复入任兵部尚书、检校吏部尚书。旋出任河南观察使。穆宗皇帝长庆元年（821年），改御史大夫、吏部尚书，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检校司空。敬宗皇帝宝历初年（825年），拜尚书左仆射。李绹以直道进退，望冠一时，屡为谗邪所伤。被李逢吉累贬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大和初年（827年），征拜太常卿，加银青光禄大夫，兼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位至上柱国，封爵赵郡公。后为乱兵所害，赠司徒，谥号曰“贞”。

《李相国论事集》是一部记载中唐宰相李绹奏议之文和论谏之事的文集。由于涉及的领域广泛，该文集成为后人研究中唐政治、经济、藩镇、宦官、民生的重要文献之一，同时也是今人研究李绹生平、思想、精神、品格的重要著作。

李翱22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李翱（772—841年），字习之，唐陇西成纪人。是西凉王李暠的后代。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李翱是唐德宗贞元年间进士，曾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考功员外郎、礼部郎中、中书舍人、桂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他曾从韩愈学古文，协助韩愈推进古文运动，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李翱一生崇儒排佛，认为孔子是“圣人之大者也”（《李文公集·帝王所尚问》）。主张人们的言行都应以儒家的“中道”为标准。

《论语笔解》2卷作为韩愈、李翱二人合著的一部

解经之作,以“对话体”的形式进行解经,并以“己意解经”,突出了他们尖利大胆、直白达意、相互推崇补充的一面。这些足以说明了《论语笔解》是一本有特色的解经之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卓异记》1卷,记唐室功业殊异者,二十七类。

《李文公集》18卷,李翱是韩愈的追随者,是宣扬孔孟传统思想的唐代代表人物之一,《李文公集》中《复性书》一篇,就是作者崇尚孔孟思想的代表著作。李翱同韩愈一样,也反对佛教,但其思想,却有一定程度的不彻底性。在《复性书》中,他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中庸》。《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并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说法,把“诚”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其唯心主义思想较《大学》更为明显。李翱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并为性善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所谓“复性”的“性”是指人先天就具有的封建伦理纲常这种本性,这种本性天生就是善的,“情由性而生”,则有善有不善,“情既昏,性斯匿矣”;所以,他提出用“正思”的方法,消灭邪恶的“情”,这才是到达“圣人”的基础。才能够“复性”为“圣人”;有些人失去这种本性(善性),既然是由于“情”,也即受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干扰的结果,那么,也只有彻底消灭人情感欲,本性(善性)才能复归。由于作者受佛学影响较深,反佛思想不彻底,故《复性书》中亦夹杂了一些佛教思想。李翱在此书中推崇的《中庸》及其师韩愈所推崇的《大学》,到了南宋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成为封建学者必读的经典,所以,李翱与韩愈同开宋明理学的先河。除《李文公集》外,《习之先生全集录》亦记载,前者主要以《四部丛刊》,后者主要以《唐宋十大家集》本行世。

《五木经》1卷,有“樗蒲五木,玄白判。樗蒲古戏,其投有五,故白呼为五木。以木为之,因谓之木。今则以牙角尚节也。判,半也,合其五投,并上玄下白,故曰玄白判。”

李贺5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李贺(790-816年),字长吉,河南福昌人,郡望陇西,家居福昌

之昌谷,后人因称“李昌谷”。唐代诗人,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

李贺《昌谷集》4卷,《外集》1卷,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

李白《李太白文集》30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白(公元701年—公元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著名诗人,祖籍陇西成纪,生于碎叶城,成长于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二十五岁起“辞亲远游”,仗剑出蜀。天宝初供奉翰林,因遭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曾为永王璘幕僚,因璘败系浔阳狱,远谪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投奔其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后卒于当涂,葬龙山。唐元和十二年(817),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根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其墓迁至青山。今存990多首诗歌,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白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他的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权德舆《权文公文集》10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权德舆(759-818年),唐代文学家,大臣,字载之。汉中南郑人。后徙润州丹徒。德宗时,召为太常博士,改左补阙,迁起居舍人、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宪宗时,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徙刑部尚书,复以检校吏部尚书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卒谥文,后人称为权文公。

《权文公文集》共五十卷。有《四部丛刊》影印清嘉庆朱铤刻本,再版时据长沙叶定侯藏残本附录校补和拾遗。《四库全书》所收《权文公诗集》十卷,有诗无文。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4卷被《四库全书》收录。王仁裕(880-956年)字德肇。其先祖太原人,祖父王义甫任成州军事判官时,迁居秦州长道县碑楼川。五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历事岐王李茂贞、前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官至户部尚书、兵部

尚书、太子少保，病逝后诏赠太子少师。生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后周显德三年(956年)病逝开封宝积坊私第。

五代后周王仁裕撰写的《开元天宝遗事》，根据社会传闻，列146个标题，分别记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逸闻遗事，内容以记述奇异物品为多，人物事迹也以传说为主。其中如记唐代宫中七夕、寒食等节日习俗以及豪支、传书燕等事有一定的社会史料价值。后世习用的不少成语、典故如滔滔不绝、梦笔生花、解语花、有脚阳春等均出自该书。

余阙《青阳集》4卷被《四库全书》收录。余阙(1303-1358年)，字廷心，一字天心，生于庐州。元末官吏，先世为唐兀人。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至正十二年(1352年)，余阙代理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帅府佾事，分兵守安庆。此后五、六年间，余阙率兵与红巾军激战十余次。至正十八年(1358年)春，红巾军再次集结，战船蔽江而下，急攻安庆城西门。余阙身先士卒，亲自迎击。拼斗中，突见城中火起，余阙知城池已失守，遂拔刀自刎，自沉于安庆西门外清水塘中，时年五十六，谥忠宣。其与北宋包拯、明代周玺，并称“庐阳三贤”。

《青阳集》是余阙的诗文集，由门人巢县人郭奎辑，也称《青阳先生文集》《青阳山房集》。余阙出于文人的爱好和使命，把对家乡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倾泻于笔端，这些篇章多数被郭奎辑录在《青阳集》中。《青阳集》具有极高的地方史料价值，是极其难得的地方历史文献。余阙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西域人华化的代表，学界对他的生平和文学成就评价极高。

李梦阳《空同集》66卷和《二李先生奏议》2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梦阳(公元1473年-公元1530年)，字献吉，号空同，汉族，祖籍河南扶沟，1473年出生于庆阳府安化县，后又还归故里，故《登科录》直书李梦阳为河南扶沟人。他善工书法，得颜真卿笔法，精于古文词。明代中期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自书诗》师法颜真卿，结体方整严谨，不拘泥规矩法度，学卷气浓厚。李梦阳所倡导的文坛

“复古”运动盛行了一个世纪，后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所替代。

李梦阳《空同集》倡言“真诗在民间”，还重视“调”-主要指诗歌音调的和谐完美。《二李先生奏议》(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徐宗夔所编李梦阳、李三才二人奏议也。梦阳以风节振一世。三才结纳东林，亦负当代之望，而智数用事，不及梦阳之伉直，其为人不甚相类。宗夔以二人俱产关中，故合刻之。末各附诗数首，於体例亦为不伦。宗夔字效虞，苏州人。

牛僧孺《幽怪录》1卷被《四库全书》收录。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觚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在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唐穆宗、唐文宗时宰相。他既是政界的贵胄，又是文坛的名士。

牛僧孺作《玄怪录》，杨用修修改为《幽怪录》。因世庙时重玄字，用修不敢不避。它古代汉族传奇小说集。原为十卷，或作十一卷，今存三十一篇。《幽怪录》一卷、《续幽怪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所作多怪异之事，是较早的传奇小说专集，为唐代文言小说精品，对后世影响较大。

李复言5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李复言(775年-833年)，名谅，字复言，唐小说家。陇西人。顺宗时，王叔文曾荐其为谏官，推许甚至，元和时任彭城令，后历任苏州刺史、汝州刺史、泗州刺史等职。大和间尚在世。与白居易友善，有诗倡和。应举时，缴纳“省卷”中有小说《纂异》一部，被斥为“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因此罢举。

李复言《续幽怪录》1卷和《续玄怪录》4卷为唐代传奇小说集，因续牛僧孺《玄怪录》和杨用修《幽怪录》而得名，写的都是流传较广的故事。

李廌《续世说》10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廌，1179年，李焘次子，字仲信，唐代陇西人，乾道五年(1169年)，李廌得吏部尚书汪应辰荐，试贤良方正科，果中。擢为秘书省正字，旋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官，与父李焘共典国事，同为南宋史家重臣，明显于缙绅达官之间。李廌性刚直，忠言极谏，

多次上策奏议国家大事，后人评价很高。

李廔撰《续世说》10卷，谓“其书惟取李延寿南北二史所载碎事，依《世说》门目编之”，通过分门别类的编述，“发史氏之英华”，寄托作者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抱负，同时也有一定的史学、文学价值，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变化特点、文人的生活习俗、人格典范等具有参考价值。

洪臻《空同词》1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南宋词人洪臻字叔均，号空同词客，平凉人。空同有二义：一指道之境界，《关尹子·九药》有“昔之论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二为山名，又称空桐、空峒、崆峒，在今甘肃平凉西，险峻雄伟，山上道观极盛。《庄子·在宥》：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如此，洪臻或逍遥江湖，并未入仕。

《空同词》1卷此集仅词十六首。据毛晋跋语，乃全自黄升《绝妙词选》中摘出别行，非完帙也。卷末咏渔父《清平乐》一阙，据《花庵词选》本连久道词，且载其本事甚明。因二人之词相连，遂误入之臻词中，实止十五首耳。

赵时春46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在《四库全书》这一中国文化事业的巨献中，能收录赵时春的《平凉府志》《赵浚谷集》《别本赵浚谷集》共计46卷，确实是很不简单。

赵时春(1509年-1566年)，字景仁，甘肃平凉城南浚谷村人。一生著述颇多，是《明史》立传的甘肃籍人物之一，明朝中叶著名文学家。14岁中乡试，嘉靖五年(1526年)18岁时荣中会试榜首，是被人们称之为“宋有欧苏，明有王赵”的嘉靖八才子之一。他一生仕途坎坷，曾三起三落。两次因秉直上疏，被削职为民。二十九年(1550年)五月，京师被寇，鞑靼进犯。经兵部左侍郎王邦瑞推荐，同年九月再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协理京营军务。因反对大将军仇鸾向蒙古开设马市的倡议，为仇所忌恨。次年，调任山东按察司统民兵金事、金都御史，为正五品。三十一年(1552年)为四品按察使司副使。三十二年(1553

年)春，任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山西，统领雁门三关防务，为正四品，全面负责山西御戎事务。是年九月，鞑靼进犯神池(今山西境北)等内长城，遂率兵急趋御敌，行至广武(今山西雁门关一带)，遭敌伏击，兵败，解职归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时春被免官后，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平凉故里以《史记》为范本，遍访乡野，寻觅古迹，查阅史料，广采博录，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历时5年，才完成的10册13卷29万字的《平凉府志》，是平凉有史以来首部府志，因取舍精详，记事赅确，成书后，名重一时。在明代平凉府辖3州7县，该志前3卷为府志，此后各卷为州县志，依次为平凉县、泾州、灵台县、静宁州、庄浪县、固原州、镇原县、华亭县、崇信县、隆德县。《平凉府志》以平凉为西北要地，旧未有志，因创修之。分十七门：建革、山川、户口、田赋、物产、坛祠、藩封、官师、兵制、学校、人物、孝节、风俗、河渠、寇戎、寺观、祥异。其考证叙述，具有史法，在关中诸志之内最为有名。

《平凉府志》成书早，刻印较迟。民国23年(1934年)，甘肃方志学家张维在北平图书馆见之“漫灭虽多，大体尚可缮录”，归过平凉，告时任专员范朴斋，函平抄录一本。10年后，张维又亲抄录并“正其文字”，使此志大略可读。《平凉府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考证有据，记述准确；二是“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体例简而有序，自有创新；三是关注民生疾苦，对当时王府亦敢抨击；四是不设“艺文”，避免滥收诗文，颇见自知之明。

黄谏《从古正文》5卷被《四库全书》收录。黄谏(1403年-1465年)，字廷臣，号卓庵，又号兰坡，明代庄浪卫人。清高宗乾隆十四年(1749年)成书的《平番县志》的《人物志》中记载，黄谏于明英宗正统七年(壬戌，1442年)考中探花(殿试一甲第三名)。按定制赐进士及第，并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之职，人称“黄探花”“黄学士”。

《从古正文》“其书本《皇极经世》为准，自太皞以下诸帝王，各载其在位年数，而略述兴废大旨于每

代之前。察罕成此书在皇庆元年，尝奏进于朝，程钜夫为之序。至明景泰中，谏复为《续辑》，改原本每代下至延佑戊午若干年为下至洪武戊申若干年，并补入元代诸帝纪年。然简略太甚，不足以资考订也。”

胡纘宗《嘉靖安庆府志》30卷、《愿学编》2卷、《乌鼠山人集》29卷、《拟涯翁拟古乐府》2卷、《拟汉乐府》8卷、《雍音》4卷被《四库全书》收录。胡纘宗(1480-1560)，字世甫、孝思，号可泉，甘肃天水秦安人。明正德进士，官都察院右御史，历任安庆、苏州知府，山东、河南巡抚，为官廉洁，政绩卓然。任安庆知府时，兴利除弊，大兴教育之风，改建皖山书院，移修山谷书院，兴水利开吴塘、乌石工程，于三祖寺建三高亭，并撰记，于安庆建天柱阁，以便眺望天柱山。擅诗文，是继宋代名相王安石之后，赋诗题刻最多名人。

《嘉靖安庆府志·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是嘉靖元年胡纘宗为安庆知府时所作，为记二、表二、志十二、传十二，不分细目。其门人王汉序之曰：“今《郡县志》分门立类，撮要标目，为类书之体，而非史之例。是志一循古文，无复分门立类之规模也。然第四卷已作《职官表》，第七卷又作《职官志》，则於例亦颇不纯。”又顾炎武《日知录》曰：“胡纘宗作《安庆府志》，於正德中刘七事大书曰：‘七年闰五月，贼七来寇江境。’而分注於贼七之下曰：‘姓刘氏。’举以示人，无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学为秦、汉文者，皆贼七之类也。”是亦好古之过矣。

《愿学编》是胡纘宗七十五岁时完成的生平最后一部著作，也是其一生学术思想的结晶。《愿学编》在经学、理学、政治及文学等方面均展开详细论述。经学方面，主要讲解了儒家经书内容，紧扣当时教育现状，阐述经书重要语句；理学方面，在继承宋明理学家思想的基础上，阐发了大量的个人思辨哲学观点；政治方面，提出实行王道、任用贤臣良相、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希望以此建立理想的封建王朝；文学方面，注重学习杜诗，倾向现实主义的创作；另外，他在书中阐明了排斥佛老学说的观点，并且著录了关陇的名胜和文献及当地历史文化名人。《愿学编》的艺术特色主

要是阐述学术思想时，穿插有平铺直叙的叙事形式和生动形象的场景描写；阐明观点时，以引用典故辅助议论；在修辞手法上，多用比喻、排比来表达。《愿学编》语言通俗易懂，行文流畅。

《乌鼠山人集》有诗有文，其文有序、记、说、引、题词、解、赞、辨、喻、文、论、传、铭、碑阴、箴、戒、对、断、啟、题、跋、引状、墓志、墓志铭、祭文、墓铭、哀词、赋等。

《拟涯翁拟古乐府·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胡纘宗游李东阳之门，乃取《东阳古乐府》二卷，以次属和，立题指事，率由“东阳”之旧，亦间有所釐正。凡一百八首，太康张光孝为之评，而其弟统宗为之注。

《拟汉乐府》是书少见，《四库总目提要》有云：“一名《與上集》，以其多成之與上也。汉乐府多声词合写，不能复辨，沈约《宋书》言之甚明。胡纘宗乃揣摩题意为之，殊类于刻舟求剑，况唐人歌诗之法，宋人不传，惟《小秦王》一调，勉强歌之，尚须杂以虚声，乃能入律。宋人歌词之法，元人亦不传。《白石道人歌曲》自度诸腔，所注节拍，今皆不省为何等事矣”。

《雍音》4卷是元代以前陕西作者的一部诗歌总集。其所选的诗自西汉至元代，共150人，绝大部分是陕西人的作品，或少数非陕西籍者，但也是曾一度寓居长安诗人的作品，如李白、杜甫等。是研究陕西古代诗歌的重要书籍。此书有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清渭草堂刻本，4册，每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下镌“清渭草堂”。今藏西北大学图书馆。另有甘肃交何王任贤刻本。

李应奇《崆峒山志》3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应奇，字鹤崖，明代平凉人。官延州、庆州知州，开封教授。

《崆峒山志》3卷，是书成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凡分七门，曰《分野》《建革》《疆域》《形胜》《田赋》《仙迹》《题咏》。然一山之志，即不应及分野、建革，而中间兼记及瓦亭关、会盟坛之类，又殊似府志之体例，殊丛杂无限断也。

吕颢《世谱增定》2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吕颢，字梦宾，宁州人。嘉靖进士，官至应天府尹。

《世谱增定》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是编因陈璘所刊《世谱》一书，益以司马光《历年图》、梁氏《总论》，而以黄继善《提要》割属历代之下。以上古至东晋为前卷，刘宋至元为后卷，盖乡塾课蒙之本也。

龙正《八阵合变图说》被《四库全书》收录。龙正，字严从，明武都人。

《八阵合变图说》是一本兵书，正德中，蓝章巡抚四川，驻兵汉中，遣人至鱼复江，图八阵垒石。龙正当时正在蓝章幕中，遂推演为图说，刊于蜀中。该书以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八阵图”结合《易经》思想所著。

沈云翔《楚辞评林》8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沈云翔，字千仞，明代庆城人。

《楚辞评林》明崇祯年刊，沈云翔辑评，明崇祯十年刊刻的沈云翔《楚辞集注评林》一书，亦号称“八十四家评楚辞”，但它实际是在明天启六年蒋之翘评校本《楚辞集注》七十二家评点的基础上，略加增益、改动而成。《四库全书总目》点出其“射利”的实际居心：“是书成于崇祯丁丑，因朱子《集注》，杂采诸家之说，标识简端，冗碎殊甚，盖坊贾射利之本也。”但也是明代研究《楚辞》很有代表性的古籍之一。

李学孔《皇王史订》4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清渭州人李学孔撰《皇王史订》4卷是“编以刘恕《外纪》义类未确，端绪难明，因订正其文。上自盘古氏，下迄周幽王。东迁而后，春秋既作，则不复录

焉。大抵摭拾罗泌《路史》之说，加以臆断耳。”

张晋《张康侯诗草》11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清朝张晋字康侯，陇西狄道人。顺治壬辰进士，官丹徒县知县。其诗颇学李白，兼及李贺之体。

《张康侯诗草》11卷第一卷为《黍谷吟》，第二卷为《秋舫一啸》，第三卷为《蓟门篇》，第四卷为《劳劳篇》，第五卷为《石芝山房草》，第六卷、七卷为《雍草》，第八卷为《税云草》，而以诗馀附焉；第九卷为《律陶》，集陶诗为五言律也；第十卷为《集杜》；第十一卷为《集唐》，亦皆五言律。据《后跋》云：尚有七律集句，未经编入。

巩建丰《朱围山人集》12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巩建丰(公元1673年-公元1748年)，清前期教育家，巩昌府伏羌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云南学政、侍读学士。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告老还乡，以讲学著书为务，以灌园吟咏为乐。学生数百人，人称“关西师表”。著有《朱围山人集》《伏羌县志》等。

按照《四库全书》著录书作者的分类，甘肃籍作者涉及政治、哲学、宗教、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从著录书和存目书综合情况来看，甘肃籍人在清朝以前被《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具有陇右文化的鲜明特色，这些人是清朝以前甘肃文化界的典型代表，更是古今甘肃人民的骄傲。

(作者：甘肃省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车安宁当选为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研究会 常务理事

2016年10月24日至26日，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在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研究会常务理事。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秘书处陈乐一供稿)

甘肃地方志研究综述

陈郑云

摘要：甘肃地方志的纂修源远流长，从魏晋南北朝的地记、隋唐的图经、至宋元以降定型的方志，无不备存。文章主要研究的“甘肃方志”是指甘肃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内从魏晋到民国官方及私人编纂的地方志资料，从宏观性综合研究、微观性个案研究、甘肃古旧方志的整理等三个方面展开回顾与总结，以期梳理出甘肃地区地方志研究的现状，旨在让甘肃地区地方志的研究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甘肃地区、地方志、研究综述

甘肃地方志的纂修源远流长，从魏晋南北朝的地记，隋唐的图经，至宋元以降体例完备的方志，无不备存。据不完全统计，从魏晋至民国年间，甘肃纂修方志见于各类文献记载的约有349种，保存至今的约有208种。^①甘肃方志数量多，但因具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历来受学界重视。本文主要研究的“甘肃方志”是指甘肃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内从魏晋到民国官方及私人编纂的地方志资料，这些志书成为史地学领域研究者倚重的参考资料。但目前学界对其本身的研究却多集中在对志书目录整理、作者考辨、成书背景、方志发展史等问题上，较全面地对甘肃方志作专门纵深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

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对甘肃方志研究的关注度仍不够，对于甘肃方志既有研究和今后发展趋势仍缺乏必要的总结和思考，这一状况显然与甘肃方志的历史价值及地位不太相称。有鉴于此，笔者拟进一步总结、评述国内学界对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成就与最新动态，以就教于诸方家学者。综观目前学术界对甘肃地方志的研究，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甘肃地方志的宏观性综合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甘肃地方志的宏观综合研究，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地方志目录的整理与研究

张维《陇右方志录》、《陇右方志录补》（1934版）是西北地区第一部总结性的方志目录。凡当时所见的西北方志，均收录无遗，二书合计收录方志329部，其中现存西北方志共10部。该书分类明确，考证精审，评价得当。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甘肃省》，第172~18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一书，共收录自秦汉至元代的方志2200多种，凡元代以前旧志存遗文一条以上者皆加以辑考，逐条记录佚文所在之书名、篇卷，其中涉及甘肃佚志二十余种。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收录甘肃较为重要的古旧地方志181部，但存在着许多不足与错误。王继光《陇右方志录补正》（《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对张维《陇右方志录》补正126种。张令瑄《三陇方志见知录》（连载于《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1995年第1期）、《明代庆阳府各志考述——三陇方志见知录补稿》（《图书与情报》1995年第3期）整理、辑补、笺注张维先生遗稿数十种。易雪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甘肃方志著录校读记》（《图书与情报》1995年1期）一文，分纂修与刻版年代有误、卷数有误、书名与纂修者有误等三种类型详细分析考订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收录的181种甘肃古旧方志著录中的舛误、疏漏之处约三十余

处,同时,将该联合目录未收录的八部地志书做了提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金恩辉、胡述达:《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甘肃》,第26-1-3,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中的甘肃省部分主要由邵国秀和易雪梅纂修,在《甘肃省地方志述评》中所述主要据邵国秀《甘肃省地方志考略》(《图书与情报》1994年第1~2期)一文而成。易雪梅、刘瑛《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统计现存甘肃地方志222种。王立明在《新中国建立后大陆影印出版的甘肃旧方志》(《甘肃史志》2012年第4期)一文中,系统梳理了建国后大陆影印出版的甘肃旧方志目录。马新建在《甘肃历代方志目录整理情况研究》(《甘肃史志》2015年第1期)一文中,总结了甘肃历次方志目录整理情况,分析了方志目录整理的特点与不足。

(二) 关于方志发展史的研究

牟实库《甘肃地方志述略》(《图书与情报》1982年第1期)一文,主要探讨甘肃方志修撰的历史背景和源流,对甘肃省图书馆所存方志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周丕显编著《甘肃方志述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年版),该书是有关甘肃地方志的第一部论文集专著,收录有周丕显《甘肃方志略谈》、牟实库《甘肃方志简介》、张令瑄《三陇方志见知录》、赵世英和张季容《临洮地方志简介》、牟实库《陇西地方志浅议》等12篇论文。王丽娜《甘肃地方志源流述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主要对甘肃地方志的修撰源流进行简要叙述。王迎喜《例谈甘肃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91年1期)以水利开发、矿藏开采、旅游业的发展、对外交往以及总结自然灾害的规律等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几个方面,以实际事例谈甘肃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邵国秀《甘肃省地方志考略》(《图书与情报》1994年第1、2期),先后对甘肃地方志发展史作一简单梳理,主要对两汉至南北朝的地记及唐代地记与图经的存佚、作者、著录及时代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易雪梅、李淑芬《西北地区地方志概述》(《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主要对西北地方志的发展源流进行梳理,涉及对甘肃地方志的简要叙述。郝玉屏主编、高子贵、金钰铭副主编《甘肃方志通览》(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一部介绍甘肃方志资料最丰富的专业书籍,内容上追溯至两汉,下止于2005年年底,全书上编为甘肃方志编修史略,按时序记述历代方志编修的情况以及成果和特点,下编为甘肃古今方志编修系年录,以1949年为界,分两章载录旧志编修和新编地方志工作要事。车安宁在《甘肃历史上的方志编修》(《甘肃日报》2013年6月24日)一文中,系统梳理了从汉魏至民国末甘肃历史上编修方志的概况。

(三) 地方志的收藏与整理研究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1990版)重刊《秦安志》、《安定县志》、《通渭县志》、《平凉府志》、《甘镇志》、《朔方新志》等六部地方志。易雪梅《甘肃省图书馆藏古籍述略》(《图书与情报》2002年第2期),对现存甘肃地区流传较少、文献价值较高的稀见方志做了介绍。屈直敏在《近百年来甘肃汉唐方志整理研究综述》(《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7期)中,总结分析了近百年国内外有关甘肃汉唐散佚方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存目稽考、佚志辑校、综合研究等方面。王立明在《台湾整理出版的甘肃旧方志简介》(《甘肃史志》2012年第2期)一文中,介绍了台湾现存的甘肃旧方志及其整理出版情况。王立明、魏霁虹在《日本馆藏甘肃史志知多少》(《甘肃史志》2010年第3期)一文中,介绍了日本藏存的甘肃古旧地方志75种。高启安在《谈谈地方志的整理和研究——以〈肃镇华夷志〉为中心》(《甘肃史志》2013年第4期)一文中,以《肃镇华夷志》为中心论述了地方志的作用和价值,分析了目前地方志整理中的一些问题。

二、对甘肃地方志进行的微观性个案研究

目前学界甘肃地方志进行的微观性个案研究,主

要成果有:

(一) 方志名家的研究

一是对张澍的研究。张澍，凉州府武威县(今武威市)人，清代方志学家，有《续黔书》、《蜀典》、《十三州志》等数十种著作传世。关于张澍及其方志学成就的研究主要有：崔云胜《试论张澍〈续敦煌实录〉的特点与价值》(《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一文，认为《续敦煌实录》从体例上讲，具有章学诚所说“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特点，从内容上看，搜罗广泛、征引博洽，十分丰富。崔云胜《论张澍〈凉州府志备考〉的特点与价值》(《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9期)一文，认为《凉州府志备考》在编纂上具有内容丰富全面、引征广博、考证谨严等特点，对我们今天研究武威地区的历史、进行方志编纂以及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和贡献。漆子扬《清代方志学家张澍五种方志著述论略》(《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2期)一文，对张澍著述的《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凉州府志备考》五种方志做了论述，认为张澍方志著作长于考证，门类简明；注重掌故，引用材料必注出原书；收录人物注重行谊，标榜人师；反对滥收风花雪月之作，以侈卷篇的编纂方法；提倡严谨的治学态度。刘应禄《论张澍及其西北史地学成就》(《鸡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张澍在辑佚学、姓氏学、方志学、金石学、西夏学、敦煌学等领域的研究，重点论述了在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杜志强《古代陇人的史著与史学》(《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一文，对古代陇人独著、编撰、参撰的史学著作做了系统梳理，其中涉及张澍的方志著作及思想。张蕾蕾《张澍及其西南方志编纂考察》(《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一文，对张澍编撰的《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等三部地方志做了评述，认为这些志书保存了川黔地区大量稀见史料，同时也为后世西南地区的方志编修树立了典范。

二是对胡纘宗的研究。胡纘宗，秦州秦安(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人，明代方志学家，有《安庆府志》、《苏州府志》、《秦州志》等14部著作传世。关于胡纘宗及其方志学成就的研究主要有：刘雁翔《明代陇右学者胡纘宗生平事迹及方志著述考》(《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5期)一文，对甘肃秦安籍方志学家胡纘宗的生平、著述、方志理论等综合研究。胡喜成《胡纘宗学术思想概论》(《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一文，对胡纘宗从学术思想、诗文艺术、方志与书法等方面全面论述，论及其方志学思想与成就。汪祚民《胡纘宗〈安庆府志〉卷数理惑》(《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一文，对胡纘宗编纂《安庆府志》的卷数做了分析。

三关于张维的研究。张维，甘肃临洮人，近当代方志学家，有《陇右方志录》、《仇池国志》、《甘肃青海土司志》等。关于张维及其方志学成就的研究主要有：王鐸《张维与〈陇右方志录〉》(《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一文，概述了张维的生平事迹，对《陇右方志录》做了简要评介。王希隆《张维先生学术述略——〈还读我书楼文存〉序》(《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一文，其中分析了张维的史学造诣及其成就，重点论述了张维史识及对史料的重视。陈尚敏《张维〈陇右方志录〉学术思想分析》(《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9期)一文，对张维方志学术思想做系统论述。

(二) 对甘肃下辖各地区方志研究

一是对酒泉地区旧志的研究。田建良、尚骅、谢继忠《敦煌地方志简介》(《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94年第2期)一文，主要对敦煌地区的14种方志进行介绍。吴浩军《酒泉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一文，主要对酒泉地区自东晋十六国时期至民国时期所编修的地方志及其他带有方志性质的文书约有30余种的存佚及研究整理情况进行概述。

二是对张掖地区旧志的研究。田建良、尚华《张

掖地方志浅议》(《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88年第1期)一文,评述了对张掖方志自明代创修以来现存的四种方志,从编纂体例、体制紫简、内容等。吴浩军《张掖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6期)一文,主要对张掖地区自隋唐至民国时期编修的地方志及其他带有方志性质的史地杂志约有32种的存佚及研究整理情况进行简要概述。

三是对武威地区旧志的研究。李万禄《南京大学图书馆藏〈镇番县志〉小考》(《图书与情报》1983年第1期)一文,对南京大学图书馆藏《镇番县》相关问题做了考辨。李玉寿《镇番县志考略》(《图书与情报》1983年第04期)一文,对镇番县(今民勤县)现存的四种方志做了述评。栾晓丽《简评道光〈镇番县志〉》(《知识经济》2009年第12期)一文,简要评述了《镇番县志》的体例内容。田建良、尚华《武威地方志简介》(《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89年第1期)一文,主要对武威地区的11种地方志进行简要介绍。吴浩军《武威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主要对武威地区自隋唐至民国所编修的地方志及其他带有方志性质的史地杂志40余种就其存佚及研究整理情况进行考查并作概述。

四是对兰州地区旧志的研究。王干一《张国常和他的〈重修皋兰县志〉》(《兰州学刊》1983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张国常的生平事迹及其《重修皋兰县志》的编修情况。

五是对平凉地区旧志的研究。张令瑄《平凉三志综述》(《图书与情报》1986年4期、1987年1期),先后对明赵时春《嘉靖平凉府志》、清嘉庆《平凉府志》及近人郑浚《平凉县志》三部志书做了概括介绍。

七是对庆阳地区旧志的研究。穆长青《〈庆阳府志〉〈宁州志〉〈正宁县志〉》(《图书与情报》1984年Z1期)一文,对庆阳地区的《庆阳府志》等三部方

志清代所修的方志做了介绍。刘治立《明清时期的几种〈庆阳府志〉》(《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嘉靖、顺治、乾隆等版本《庆阳府志》的性质、内容和写作特征。王立明《现存三种清乾隆〈新修庆阳府志〉版本考辨》(《甘肃史志》2013年第2期)一文,对现存乾隆年间编修的三种《新修庆阳府志》的版本进行考辨。

八是对定西地区旧志的研究。牟实库《陇西地方志浅议》(《图书与情报》1985年第1期)一文,系统梳理了陇西历史上历代编修方志情况,对重要方志做了概述。赵世英《临洮县地方志略说》(《图书与情报》1982年4期)一文,系统介绍了自明代到民国时期临洮县地方志的编修情况。赵世英、张令瑄《万历本〈临洮府志〉》(《图书与情报》1984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万历本《临洮府志》的编纂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九是对天水地区旧志的研究。刘雁翔《天水稀见方志考录》(天水师院学报(综合版)2000年第3期)一文,对未被《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8部天水地区地方志书的作者、卷目、编修过程、体例优劣、史料价值等都做了详细的考述。

十是对陇南地区旧志的研究。赵逢夫《〈徽郡志〉序》(《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认为明代《徽郡志》有现成材料可资利用者叙述较详,新增部分较为简略。崔阶《从民国版〈新纂康县县志·叙〉看修志者的史志观念》(《甘肃高师学报》2008年第3期)一文,通过对民国版《新纂康县县志》共有六篇叙(序)分析,认为其内容反映了当时修志者的史志观念是坚持为“为政者”服务,忠于历史事实、重视方志的认识作用,修志事关重大、既要集思广益、又要分工协作,坚持严谨的修志态度、讲求科学的修志方法。陈启生、冯晓燕《地方志记述的甘肃白龙江下游地区地质灾害》(《甘肃史志》2011年第3期)一文,以陇南地区的《阶州直隶州续志》、《文县志》等志书为中心,分析了白龙江下游地

区的地质灾害。

十一是对临夏地区旧志的研究。张思温《临夏地方志提要》(《图书与情报》1982年第2期)一文,对临夏地区的现存古旧方志做了提要性介绍。

十二对其他旧志的研究。安维翰《安维峻及其总纂之〈甘肃新通志〉》(《图书与情报》1985年第21期),对安维峻及其总纂的《甘肃新通志》做了述评,认为该志编修态度严谨、秉笔庄重。吴振清《四种久佚史籍简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2期)一文,对(东晋)喻归《西河记》、(汉)侯瑾《汉皇德传》、(南朝梁)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和(刘宋)武敏之《三十国春秋》四种史籍进行简要介绍。

(三) 对方志个案的研究

一是对《河州志》的研究。杨聪聪《〈河州志〉所见明代藏事辑考》(中央民族大学硕士,2007年)一文,以明吴祯《河州志》和清王全臣《河州志》为主,分析了明代河州与藏事相关的政治沿革、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番族风物等诸多历史事项,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明朝对藏区的治理措施。武沐、杨燕霞《嘉靖〈河州志〉考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一文,认为嘉靖《河州志》的特点在于难能可贵的原创性、不可或缺的边镇特色、其中包括对于屯田的关注,对于河州卫所规模、里甲、体制等特殊性的记载;鲜活的移民文化;不无遗憾的简约。李淮东《嘉靖〈河州志〉相关问题考述》(《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9期)一文,对嘉靖《河州志》撰修的历史背景、撰修过程以及修志者的治史意识等方面的问题加以初步的探讨。李淮东《嘉靖〈河州志〉所见明代河州社会》(《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期)一文,以《河州志》为中心,研究明代河州社会是一个以儒学教化为基础的,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地方社会,该社会由多民族构成,经济以农业为主,辅以畜牧业、手工业等,是西北地区典型的移民社会、多元文化和经济多样化社会的融合体。

二是关于《凉州异物志》的研究。王晶波《凉州

异物志佚文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异物志的编纂及其种类》(《社科纵横》1993年第4期)、《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北京师大学报进修教师访问学者专刊》(2000年))三篇论文对《凉州异物志》的佚文、相关《异物志》的编纂、种类、辑佚等进行较为全面的考证。

三是关于刘昉《敦煌实录》的研究。刘隆有《实录究竟起源于何时?》(《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汪受宽《五凉史家刘昉与实录史体》(《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及《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岳纯之《说〈敦煌实录〉》(《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四篇论文则从实录体裁的角度对刘昉《敦煌实录》进行不同的探讨。此外,阎廷亮《五凉敦煌学者刘昉述论》(《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92年第2期)及《敦煌学者刘昉述论》(《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伏俊琏《刘昉的生平和著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三篇论文对刘昉《敦煌实录》也略有述及。

四是关于《沙州记》的研究。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段国〈沙州记〉集注》(《游牧社会史探》第10册,1961年版)一文,主要以张澍所辑《沙州记》20条为蓝本,考证其佚文编排顺序,详注佚文的出处,对张氏辑文的讹误脱漏及混乱,佚文中的地名、水道等的今地今名进行校注,并指出张氏所辑佚文的第二条后半部分文字、第六条、第八条、第二十一条为误辑。屈直敏《南朝刘宋段国〈沙州记〉考略》(《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4期)一文,认为段国《沙州记》之沙州并非今甘肃敦煌之沙州,而是今青海贵南之沙州,两晋南北朝之际属吐谷浑疆域。

五是关于《阶州志》的研究。王干一《略论〈阶州直隶州续志〉》(《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对光绪年间编修的《阶州直隶州续志》做了简要评论。

(四) 地方志著作的述评

吴浩军《评〈肃镇华夷志校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一文，对《肃镇华夷志校注》一书进行评介，认为该书考辨了其名称和版本、校勘、笺注900余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王阳、王杰《〈肃镇华夷志校注〉述评》（《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一文，认为《肃镇华夷志校注》有慧眼识珠、价值再现，珍贵史料面世、研究有据可依，校勘精慎、注释详赡三个特点。来新夏《〈阶州志集校笺注〉序》（《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7期）一文，对《阶州志集校笺注》成书的缘起、校注特点、主要成就做了简要介绍。吴浩军《文献可徵 瑰宝重光——〈肃州新志校注〉的文献价值和校注成就》（《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认为《肃州新志校注》校勘精审，注释详尽，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雍际春《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评〈明清秦安旧志集注〉》（《甘肃日报》2012年11月14日）一文，认为《明清秦安旧志集注》态度严谨，方法科学；考镜源流，校注翔实；视野开阔，学术性强，作为秦安明清旧志不可替代的这种价值和功用，会愈益明显地凸现出来。何茂活《古志校注 危乎难哉——〈甘州府志校注〉得失谏论》（《新疆地方志》2012年第3期）一文，认为《甘州府志校注》是校注者倾力结撰而成的心血之作，具有校点精审、注解详明、释义确当、资料丰赡等特点。

三、甘肃古旧地方志的整理

古旧方志是地域文化未曾间断的历史见证，发挥了积累、传播知识，嬗递文化传统，保存精神财富的巨大作用。古旧方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古籍的整理利用，有利于推进文化建设。甘肃古旧志整理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旧志整理校点、校注出版及重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旧志整理出版

一是正式出版整理校点的旧志。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叶恩沛修、吕震南纂，曾礼、樊执敬校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这是甘肃省

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旧志整理校点本，并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目录。《拉卜楞寺志》，藏文，阿芒班智达著，毛兰木嘉措校订，甘肃民族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乾隆《甘州府志》，钟赓起纂、张志纯等校点，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顺治《重刊甘镇志》，杨春茂纂、张志纯等校点，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康熙《静宁州志》，黄廷钰修；乾隆《静宁州志》，王垣修，魏柏树校点，合为一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嘉靖、乾隆《庆阳府志》，傅学礼、杨凤藻撰，张耀民校点，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民国《创修临泽县志》，高季良总纂，张志纯等校点，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高台县志辑校》，张志纯等校点，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清《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民国徐家瑞《新纂高台县志》、民国冯周人《高台县要览》三志合一，张志纯等校点，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二是内部印行整理校点的旧志。民国《庆阳县志稿》，张精义编纂，庆阳县志编委会校点，1984年印行。光绪《文县志》，长赞纂，政协文县委员会、文县县志编委会标点，1984年铅印。道光《凉州府志备考》，张澍纂，杨常青等校点，武威地方志办公室1986年分上中下三册铅印。乾隆《清水县志》，朱超纂，崔岫、蒲维章校点，清水县志办公室1986年眷印。嘉靖《秦安志》，胡缙宗纂，刘绳祖等校点，秦安县志办公室1987年3月眷印。民国《临潭县志稿》，马志清修、陈考三纂，李宗宪校点，甘南州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5月油印。民国《甘肃人物志》，张维纂，赵茨、牛得权校点，1988年6月《西北师范大学学报》以增刊名义内部铅印。《麦积山石窟志》，冯国瑞著，1941年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印，张鹏举校点，由作者亲属、天水市政协委员周贞吉1989年自费铅印。同治《崆峒山志》，张伯魁纂，嘉庆《柳湖书院志》，朱愉悔纂，仇非整理标点，平凉地方志办公室1993年7月内部铅印。道光《山丹县续志》，党行

义纂、黄玉霞续纂，山丹县地方志办公室校点，1993年铅印。顺治《灵台县志》，黄居中纂辑，郑行健校点，政协灵台县委员会1997年9月内部准印。清《伏羌县志》，巩建丰编纂，牛勃、狄宝正等校点，内部铅印。清《庄浪县志略》，邵陆编，庄浪县志办整理，2000年内部准印。

（二）旧志校注

古旧方志保护与利用是一项具有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工作，近年来甘肃在旧志校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是对单本志书的校注出版和对区域性类似志书的集校出版。

一是单本校注出版。《五凉全志校注》，张克复等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肃镇华夷志校注》，李应魁撰，高启安、邵惠莉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肃州新志校注》，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中华书局出版2006年12月出版。《重修肃州新志校注》黄文炜、沈青崖纂，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中华书局出版2008年12月出版。《甘州府志校注》，钟赓起纂，张志纯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2008年6月出版。《皋兰县红水分县采访事略校注》，2008年，由高启安校注，附载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景泰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一书。《中华民国安西县志》，李春斌校注，内部批准发行。

二是集校合订出版。《岷州志校注》，将康熙《岷州卫志》、康熙《岷州志》、光绪《岷州续志采访录》三志合一，王兆祥、梁凤德等校注，岷县志编委会办公室1988年铅印。《靖远会宁红水县志集校》，李金财、白天星总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东乐县志》、《创修民乐县志》校注合订本，刘汶、张志纯等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出版。《明清秦安旧志集注》，将明清三部秦安旧志集中校注，杨维俊为总纂、张德友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阶州志集校笺注》，将明万历《阶州志》、清康熙《阶州志》、乾隆《直隶阶州志》、嘉庆《武阶备志》和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五部阶州志结

集校注，曾礼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三）旧志重印

民国《金塔县志》，金塔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油印。民国《鼎新县志草编》，金塔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油印。康熙《河州志》，临夏县图书馆油印。民国《新修张掖县志》，张掖县革委会1957年油印。乾隆《新修庆阳府志》，华池县志编写组1979年复印。乾隆《永昌县志》、嘉庆《永昌县志》、民国《续修永昌县志》，永昌县政府1983年合为一册铅印。乾隆《泾川志》，泾川县文化馆1981年影印。宣统《甘肃新通志》，兰州古籍书店1986年复印。民国《甘肃人物志》，兰州古籍书店1986年复印。康熙《巩昌府志》，兰州古籍书店1985年复印。乾隆《狄道州志》、宣统《狄道州续志》，临洮县志办公室1986年重印。乾隆《皋兰县志》、道光《皋兰县续志》、民国《兰州古今注》，兰州古籍书店1985年复印。道光《敦煌县志》，甘肃中医学院1985年复印。另外，1990年10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收录影印旧志47种（部），兰州古籍书店内部出版（学苑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重要者有：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升允、长庚修，丁喜翰、安维峻纂；民国《甘肃通志稿》，刘郁芬修，杨思、张维等纂；民国《甘肃省乡土志稿》，朱允明撰；民国《甘肃省志》，白眉著；明《安定县志》，恽应翼修，张嘉孚纂；明《通渭县志》，刘世纶修，自我心纂；清《皋兰县续志》，黄璟、秦维、岳原纂，陆芝田，张廷选续纂；民国《古浪县志》，李培清修，唐海云纂；民国《重修漳县志》，韩世英修；民国《鼎新县志》，张应麒，蔡廷孝纂；光绪《打拉池县丞志》，廖丙文修，陈希魁等纂，[民国]张维补辑；清《金县新志》，耿喻修、郭殿邦纂；清《靖远县志》，李一鹏等纂；清《宁远县志》，冯同宪修、李樟纂；清《宁远县志续略》，于缙周撰；清《正宁县志》，折遇兰修；清《文县志》，江景瑞纂修；清《玉门县志》，佚名；光绪《肃州新志

稿》，吴人寿、何衍庆纂；光绪《洮州厅志》，包永昌纂；嘉庆《河州志》，吴桢纂；民国《和政县志》，马凯祥修。

结 语：

古旧地方志存在着诸多缺点，但总的来说，仍不失其史料价值。因为凡研究地方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物古迹、民族史、军事史等，无不重视或取材于地方志。地方志资料，不仅可补正史之不足，其资料价值也是其他历史文献不可替代的。纵观甘肃地方志研究现状，硕果累累，但其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应重视甘肃地方志的辑佚、校勘和考订，为科学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是甘肃地区方志研究的数量有限。与全国其他省份比较，学术界对该地区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在旧志研究方面，现有论文对方志文本的研究和解读也不如对其他文献的研究和解读广泛深入，成果数量相对较少。专著类成果则要么是对古旧方志进行校注汇编、或综合概览、或以方志为工具进行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研究。第二，利用方志史料跨学科研究不足。甘肃方志，既有信息资源丰富，又未经系统整序，如把甘肃方志看作一个整体，可以说其内容是无序的。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对旧志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几部志书的著者、成书时间、相互关系之间的考证，或是对其内容的简单介绍，缺乏运用方志史料的结合社

会史、经济史、农业史等多学科交叉口、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第三，地方志资料数字化建设的速度相对较慢。方志数字化建设是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将丰富的地方志资料实现数字化、网络化，使潜在的资源变成活的信息，也是地方志发挥自身资料优势，不断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信息时代，要对修志理念进行重新整合和优化，加快地方志数字化建设。第四，方志学理论总结研究不足。很多论文在选题时没有充分参考学术史，内容无太多新见；论文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学术分量不够。若以方志为对象进行研究，可以对之前的旧志和现阶段正在从事的新志编纂从更深层次挖掘其特点和价值，形成整体上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利于甘肃古旧方志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也有利于积累经验、开拓创新，指导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因此，要加强方志系统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的联系，切实推动甘肃方志领域的研究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 [1]张维. 陇右方志录[M].北平大北印书局,1934.
- [2]郝玉屏主编 高子贵、金钰铭副主编.甘肃方志通览[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
- [3]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作者：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甘肃省志·财政志（1986—2010）》通过复审

2016年10月9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召开《甘肃省志·财政志（1986—2010）》复审会议。经过评审，会议认为，《甘肃省志·财政志（1986—2010）》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记述了1986年至2010年甘肃省财政事业的发展历程，全志内容丰富，资料取舍得当，语言流畅，篇目设置合理，归属得当，体例完备，符合新编志书的要求和质量标准，一致同意通过复审。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余德艳供稿）

张维方志思想研究

陈尚敏

提要：地方志不仅有着特定的记述内容，还有着约定俗成的体例。方志体例是其内容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则规范，是方志区别于其他著述的独特标志。张维在《陇右方志录》中涉及有关方志体例的论述，主要表现在方志的分类归属、记述范围、体裁运用三个方面。

关键词：张维、陇右方志录、分类归属、记述范围、体裁运用

地方志不仅有着特定的记述内容，还有着约定俗成的体例。“方志体例是一地政区范围内古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习俗、人物、奇闻轶事等情况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则规范，是方志区别于其他著述的独特标志。”^①张维在《陇右方志录》中涉及有关方志体例的论述，主要表现在方志的分类归属、记述范围、体裁运用三个方面。

一 分类归属

地方志记述一地政区范围内古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习俗、人物、奇闻轶事等情况，如何安排如此广泛的内容，这就牵涉到地方志的结构体式问题。“志体横看”是对此的形象说法，也是地方志区别于其他著述的重要标志之一。具体言之，地方志在记述事物时，要依其性质分门别类，然后将其并行排列。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类”是一种概念，代表着一组在性质上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分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对事物性质把握不准确自

然是分类不合理、归属不恰当的首要原因。像康熙《金县志》：“以药蕈为物产，以麦、豆、鸡、羊为食货，亦不知其分别何在。”^②康熙《安定县志》：“类目时有失当。官职而归之建置，乡约而列之学校，灾变、杂记而归之风土”，“至于官师、选举、名宦、乡贤概归人物，武卞、武科独入武备”，“以牙酒畜税列为赋役之市廛，以兵事议论列为武略。非读本文，竟难索解”^③。康熙《礼县志》：“流寓三人：诸葛亮、杜甫、吴玠。子美支离风尘，仇池偶羈，以为流寓，犹可说也。孔明以臣相出师，唐卿以专阃建节，是亦谓之流寓乎？谬戾甚矣！”^④道光《靖远县志》：“边隘即形胜之属，营堡即城池之属，一事而两门分见。列祥异于輿地，系职官于武备，其说皆不可通。”^⑤

地方志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结构体式，即纲目体和平目体^⑥。作为形式，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因为形式终究要为内容服务。随文起例，例由义起，应是其选择的原则。“夫古人著书，未尝先有例，要皆随文起例，所谓例由义起者也。”^⑦如果记载的内容不多，采用平目体，效果可能

①黄苇：《方志学》第300页； ②张维：《陇右方志录》，第43页；

③张维：《陇右方志录》第47页； ④张维：《陇右方志录》，第63页；

⑤张维：《陇右方志录》第42页；

⑥所谓“纪传体”、“三宝体”等，其实都属于纲目体。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第342—346页，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⑦吴宗慈：《修志丛论·论体例》，朱士嘉编：《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第14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

会更好。一事一目，无所统属，读者可从所列门目，一下子了解到该部分记载的内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方志记述的内容相应也会增多，创设新目势成必然。这时依旧采用平目体，就容易出现志书因设目过多而造成结构松散的问题。像道光《平罗县志》就采用平目体，“析目至九十九，稍邻细碎。”^①乾隆《甘肃通志》采用平目体，宣统《甘肃新通志》采用纲目体。前者分类三十六，后者分纲目十，子目六十，以纲统目，后者较前者为整严^②。作为通志，内容的宏富广博自不待言，采用纲目体，显然会收到纲举目张、层次分明之效。但同时采用纲目体，问题也会随之而来。纲目体需要二度分类，即在一级类目之下，又设置了二级类目或多级类目。伴随着类目层级的增多，势必会给分类及其归属带来困难。像万历《朔方新志》“纲目凌乱”，“帝幸、藩封而谓之内治，乡献、流寓而谓之文学，已失义类。而忠孝、节义、方伎又不入之乡献。坛祠、寺观、陵墓、古迹亦不入之地理。轻重失衡，是亦可谓之不知类也。”^③乾隆《通渭县志》，“此志编次以纲统目，而一目之中，复析数子目，如星野既分分野、躔度、占验三目，复附以气候、节序；官政、典礼二目，分类尤近琐碎，且纲目亦多牵混。”^④类目之间本就存在着逻辑关联，每一类目对其上位具有独立的具体内涵，对其同位又相互区别，对其下位又具有包容性。

清初，清廷将河南巡抚贾汉复所纂《河南通志》的平目体取为定式，诏谕各地遵行。但从《陇右方志录》所著录的近200种存世的清修省、府、县志来看，绝大多数采用纲目体。也就是说，即使有朝廷的倡导也未能改变修志者对方志结构形式的选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方志记载内容增多，

纲目体就显示出其优越性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纲目体在“嘉靖中叶以后成为志书主要体式”^⑤。

另外，对记述对象的社会价值存在认识上的偏颇，也是造成分类不合理、归属不恰当的原因之一。像道光《敦煌县志》，“《杂类》一志，命名已觉难解，而分立《风俗》、《古迹》、《景致》、《物产》、《外境》五目，此皆有类可归。自《景致》外，皆县事之大者，以此为杂，则县志所载，孰有不为杂者。”^⑥民国《朔方道志》：“《志余》四目：一《历史》、二《蒙古世系》、三《轶事》、四《著作》。惟《轶事》可入《志余》耳。《著作》宜入《艺文》，《蒙古世系》可入《藩制》。《历史》所载皆古今大事，谓之志余，无乃不类。”^⑦

二 记述范围

方志为一方之志，地域性是其首要特性，严守区域界限为其遵循的基本原则。造成越境而书的原因，有些是疏于方志常识，这种错误容易识别，也容易改正。像康熙《宁远县志》：“《仙释》所列尹喜诸人，俱非县产，而列入县志，亦属未当。”^⑧乾隆《正宁县志》：“《艺文》多载古人嘉言，亦非县志所应有。”^⑨民国《崇信县志》：“于薛笃弼（引者注：薛笃弼于1925年任甘肃省省长）文告公牍多所登载，此虽为一省政治掌故，而于一县殊少关联，去之可也。”^⑩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地沿革、辖境多有变化损益，如若对此考证不严，所载人事便张冠李戴，自然在客观上造成越境而书的情况。如嘉靖《平凉府志》：“唐之末季，平凉始为渭州，今载官师，而北魏渭州刺史于翼、于寔、长孙俭豆、卢勣，皆俱录入，

①张维：《陇右方志录》，第100页； ②张维：《陇右方志录》，第3页；
③张维：《陇右方志录》，第15页； ④张维：《陇右方志录》，第65页；
⑤黄苇：《方志学》，第313页； ⑥张维：《陇右方志录》，第113页；
⑦张维：《陇右方志录》，第17页； ⑧张维：《陇右方志录》，第67页；
⑨张维：《陇右方志录》，第85页； ⑩张维：《陇右方志录》，第89页；

是以陇西官师移平凉也。平凉为宋渭州，而宋知渭州诸人，俱载静宁，是以平凉官师移静宁也。宋时原州为镇戎军，而知原州诸人，仍入固原，是以镇远官师移固原也。”^①顺治《庆阳府志》：“《官师》所列，晋之李毅、李秀、王逊、姚岳，梁之徐文盛，皆今云南之宁州刺史，非庆阳之宁州刺史也。”^②乾隆《陇西志》：“凡史籍著有陇西字，事实多刺取入志，而实于今陇西无关。”^③乾隆《成县新志》：“成州所属之天水，自南宋始置，以前天水俱非成地。且姜维为天水冀人，明著史册，奚据而入之成志乎。廉范虽曾为武都太守，《五经之歌》实在蜀地，删节入武都下，此大误也。”^④

清乾隆时期，戴震就说：“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⑤民国方志学家吴宗慈也说：“夫撰一方之志，若疆域建置沿革，不能考证详明，则必有甲省之事，误入乙省，乙省之事，误入丙省者矣。”^⑥洵非虚语。由《陇右方志录》著录看，对地理沿革考证不够谨严是旧志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里，试再举几例予以说明。康熙《岷州卫志》：“沿革以岷州为宋之西和，其说殊误。宋既南迁，以岷州移长道，后金讳改为和州，因淮南有和州，故加西以别之，即今西和县地，非岷州也。”^⑦乾隆《陇西志》：“沿革所载，秦置陇西郡于天水，汉分陇西于狄道，置天水郡于襄武，皆无证于史志。”^⑧乾隆《重修肃州新志》，黄文炜修、沈青崖著。“青崖曾修《陕西通志》，以史地学者名，故此志沿革、总叙，视旧志为厘整。然亦数有疏误，如

云：‘汉凉州刺史，本治陇西。’而《汉志》刺史治陇，非陇西也。又云：‘魏太延中置西凉，州以乐平王丕守之。’而《魏书》丕守凉州，非西凉州，至西魏始置西凉州，后改甘州也。又云：‘汉之灵武，唐为灵州，乃今之宁夏。继迁窃据，又号兴州。’实则汉灵武在河西，唐灵州在河东，继迁之兴州，即今宁夏，为汉灵武地，非唐灵州也。又云：‘酒泉古郡，张轨、李暠、沮渠蒙逊并都之。’而都酒泉者，实只李暠，轨与蒙逊均不都此也。”^⑨道光《秦安县志》：“谓汉成纪县在今静宁西北之治平川，后周始迁于显亲川，殊为无据。成纪之县，自汉迄周，未闻迁移。《汉书》注谓在今陇城西北，此自指陇城西北，安得据以谓在治平川乎？”^⑩

悉心于地理沿革，向被清代方志地理派所重视，他们编修方志时，在方法上注重考证，其所体现出的严谨学风，颇为后人所称道。此派代表人物都是当时学界巨擘，没有深厚的学养，显然难胜其任。张维自述云：“宣统己酉年，我考中了拔贡，到北京学部任职三年。接触到许多新旧学者，他们都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可以随时请益，而学部又有个大图书馆，使我得到很大的收获。辛亥革命后，我在北京作国会议员，先后十年。除认真研究议案而外，特别注意于法制制度。而主要时间还是读书，直到年老，每天必需要读一百页至一百五十页书，这已成习惯。平生阅读，约有七万卷。”^⑪张维不仅好学，而且还勤于著述。数十年间，笔耕不辍，仅史学著作就有三十九种之多^⑫。试想，若无博览群书之功，焉能指出上述错误。

①张维：《陇右方志录》，第7-8页；

②张维：《陇右方志录》，第12页；

③张维：《陇右方志录》，第48页；

④张维：《陇右方志录》，第77页；

⑤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884页；

⑥吴宗慈：《修志丛论·论沿革建置考》，朱士嘉编：《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第168页；

⑦张维：《陇右方志录》，第51页；

⑧张维：《陇右方志录》，第48页；

⑨张维：《陇右方志录》，第77页；

⑩张维：《陇右方志录》，第57页；

⑪张维：《我的青年时代》，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48页；

⑫参见张令琦《致顾颉刚信中所列张维先生部分遗书目录》，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415-417页；

三 体裁运用

方志体裁系指方志的表述方式，像图、纪、志、表、传等，每种体裁都有它特定的功能。诸体并用在方法上要求各种体裁相互配合补充，最终实现对内容地充分表达。方志体裁的多样化，是方志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其成熟的标志。

(一) 纪

所谓纪者，是指按年次编写的大事记。方志中最早采用这一体裁的是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曹叔远编修的《永嘉谱》。嘉定七年（1214年）高似孙编修的《剡录》，首列“县记年”。元代张铉编修至正《金陵新志》设有“通记”一目，功能类近大事记。明代使用纪体的志书渐渐增多。清人章学诚开始对方志纪体运用进行理论总结，认为编修方志“首曰《编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记事，非编年弗为纲”^①。张维也认为：“方志首纪，要须以编年法部勒县事，为一县之纲领。”^②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明确规定：“各省志书，除将建置沿革，另列入沿革志外，并须特列大事记一门。”^③方志设立纪体，旨在弥补其因横排门类而造成的纵述不足的缺陷。但传统旧志，于纪体不甚重视，直接影响了志书的质量。“《纪事》一目，诸志或从阙如，或附于《杂纪》、《志余》之末。吾人读志，已竟而不能知其地之历代大事者，盖常有之。”^④从《陇右方志录》著录来看，只有乾隆《甘州府志》和乾隆《西宁府志》两志设立了严格意义上的纪体。前者“用诸史例，以《世纪》置卷首，纲举目张，甚得条理”^⑤；后者“创为《纲领》一志，依编年泐志大事，卓见也”^⑥。

(二) 图

“图”通常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形象的、直接的信息传递工具。图和方志关系密切。方志是一种综合体，在其源起、发展、定型过程中，大致有两条并行的线索，一条是由舆图发展出图经、图志；另一条是由古方国史演化为郡书、地记。地记与图经最后结合，就成为定型的方志。因此，图就成为方志的基本体裁之一，甚至还有“无图不成志”之说。

在西方现代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方志制图，为了达到其科学性，多采用“开方计里”法，也就是按面积缩制以确定比例尺，并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特点，描摹精致工细；不过宋代以后，志图的方位指向，多是上北下南，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地图绘制方法一致。

《陇右方志录》有两处提到旧志“图”的运用。其一为宣统《狄道州续志》，该志可谓旧志绘图缺失的集中体现：“图说两册，方向错乱。总图北上南下，每方一十三里；东乡图南上北下，不注比例；窑店、庆平图东上西下；野人关、黄石坪、新营镇图北上南下，每方六十丈、三十丈不等；南乡前、后半川图西上东下，不注比例；抹邦河至分水岭图，西上东下，翻页忽转为南上北下，逾二页又为西上东下，隔页再转为南上北下，每方一里；罗家磨图南上北下，每方四十丈；官堡图北上南下，不注比例；锁林峡图西上东下，每方二十丈；宝石口图，南上北下；西乡三岔河、刘川图，北上南下”，“使吾非狄道人者，阅之兼句不能明了此图”^⑦。其二为乾隆《甘州府志》：“舆图颇为精致。陇中诸志，只甘州、西宁图摩绘工细，惜俱为南上北下”^⑧。

(三) 表

志表是由史表发展演变而来。司马迁的《史记》

①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第1051页；

②张维：《陇右方志录》，第92页；

③辽宁省档案馆选编：《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第85页；

④张维：《陇右方志录》，第22页；

⑤张维：《陇右方志录》，第22页；

⑥张维：《陇右方志录》，第18页；

⑦张维：《陇右方志录》，第39页；

有十表，分为大事年表和人物年表，真正确立了表体格式。志书使用表体，宋以前很难考知，宋以后便得到确实运用，而且有了类的区分。嘉定《镇江志》卷首为“郡县表”；宝庆《四明志》于叙郡、叙赋、叙兵等门目下分立“沿革表”；景定《建康志》卷六至卷十四为表，包括“建康志总序”、“建康表”。明清志书使用表体不仅较为普遍，而且在分量上还有加重的趋势。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对志表有了明确规定：“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如土地、户口、物产、实业、地质、气候、交通、赋税、教育、卫生，以及人民生活、社会经济状况，均应分年精确调查，制成统计比较表编入。”^①

表的功能在于概括简明，方便阅读。刘知几在评价《史记》运用表体时就说：“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②章学诚也说：“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③乾隆《甘州府志》，“《食货》诸表，尤有史表遗意。章实斋修《湖北通志》，以田赋三十余册约为五卷，简而能详，惟能制表也。”^④宣统《固原州志》，“全志未撰一表，故《建置》、《官师》、《选举》皆繁杂难稽。”^⑤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表明，表体之于方志的重要。

旧志运用表体的疏误，其一为表传不分。道光《秦安县志》：“《官师》、《选举》表附列行实，表传不分，正为章实斋氏之所讥笑者。”^⑥乾隆《涇州

志》：“《官师》既析《职官》、《名宦》两目，则《职官》宜为表，《名宦》宜为传。”^⑦康熙《宁州志》：“《职员》、《人物》，表传不分，又各以诗文附之，盖淆乱不可读。”^⑧入志人物若有事功当入传，否则，入表仅存其名。表体功能本在于以简驭繁，让览者一目了然，如若在表中左标右注，便使表体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其二为表体设计不合理，影响表体功能的发挥。像光绪《礼县志》，“《科目表》不以时代科名经纬成文，唐之进士与明之举人，直列一行，恩、拔、副贡又与岁贡上下分书，殊无义例。”^⑨乾隆《中卫县志》：“所谓表者，亦连行题名，无复表式。与官师相同一表一考，胡所分析，此虽小节而多自歧纷，甚无谓也。”^⑩

（四）传

一志半人物。地方志重人物记述，主要缘于传统社会以德治国，这在实践上就需要树立典范以确立社会行为准则。方志记人，仿国史“盖棺论定”原则，不为生人立传。但旧志中为生人立传者，并不鲜见。像民国《华平县志》，“惟《职官》中多为生人作传，殊违志法。”^⑪顺治《崇信县志》，知县武全文著。“武全文虽为良吏，而修志时以生人入传，亦违志法。然当时尚有自作佳传入志者，又何责焉。”^⑫为生人立传有两种情况，应区别对待。一种是疏于修志常识，其出发点并无私心杂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些地方官借修志机会，自作佳传，旨在让自己青史留名。康熙《岷州卫志》，胡可桢修。“是时可桢为掌印守备，于

①张维：《陇右方志录》，第22页；

②辽宁省档案馆选编：《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第85页；

③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六，杂说上第七，第4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第879—880页；

④张维：《陇右方志录》，第22页；

⑤张维：《陇右方志录》，第95页；

⑥张维：《陇右方志录》，第57页；

⑦张维：《陇右方志录》，第88页；

⑧张维：《陇右方志录》，第84页；

⑨张维：《陇右方志录》，第64页；

⑩张维：《陇右方志录》，第101页；

⑪张维：《陇右方志录补》，第11页；

⑫张维：《陇右方志录》，第89页；

《官师》自诩政绩。”^①康熙《安定县志》，知县张尔介修。“尔介修志，《名宦》末即有尔介传。或者文非己出，然自修志，而自附佳传，大不可也。”^②康熙《秦州志》，知州赵世德著。“世德自以佳传附入《官师》，殊违志法。”^③康熙《清水县志》，知县刘俊声著。“《宦迹》俊声名后，自诩学纯经术，政符循良；又作佳传，附入《艺文》。”^④“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⑤

四 结语

张维在新的时代对方志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方志观点的确立除了继承之外，还受到当时新的学术思潮的启发。和他同时代的优秀方志学者相比，虽说不是新见迭出，但绝不落伍，更多的是和他们保持着共识。这对于一个出生和长期生活在边远的、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学人来说，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正是由于有像张维这样一批在方志领域的探索者，才使得民国时期所修方志呈现出新的面貌。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新的时代为他提供了一定的机缘。他十三岁童试中式，成为兰州府儒学的一名生员，旋入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博物班学习。甘肃优级师范学堂是在清末新政时期由甘肃省级兰山书院改制的一所新式学堂，在当时，该学堂的教育条件较为优越。能够接受新学教育不是他同时代人共有的经历。宣统年间在学部任书记官以及辛亥革命后在北京任国会议员期间，接触到一些著名学者，这大大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

方志是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综合性著述，有一地“百科全书”之称。方志需要记载的内容广博宏富，而且其体例又常常处在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实属不易。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还有些人为因素值得重视，如旧志纂修多为应时而作，它不像学者个人的其他著述，往往是沉潜多年的结果。志书纂修又多由官府主持，位置冗员的情况屡见不鲜，所修方志的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张维于方志学，可谓兢兢业业，殚竭思虑，不仅有实践之功，亦有理论建树。他对方志的执著是与其社会责任感密不可分的，这一点似尤应注意。

王希隆先生说：“近三百年以来，陇上学人在国内为学界所知者为数不多，这一方面是由于甘肃地处西北，经济落后于中原，文化教育普及不够广泛；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对有造诣有成就的陇上学人了解不多，宣传不多。”^⑥就笔者所寓目的方志学著述，真正从张维方志学思想着笔的并不多见，固然与其方志理论著作的散佚有关，也与我们对其理论的发掘不够密不可分。张维在方志学上的成就，时至今日，还远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原因就在这里。

（作者：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①张维：《陇右方志录》，第51页；

②张维：《陇右方志录》，第47页；

③张维：《陇右方志录》，第56页；

④张维：《陇右方志录》，第58页；

⑤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第841页；

⑥王希隆：《张维先生的生平与学术（代序）》，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

甘肃定西 新莽权衡的出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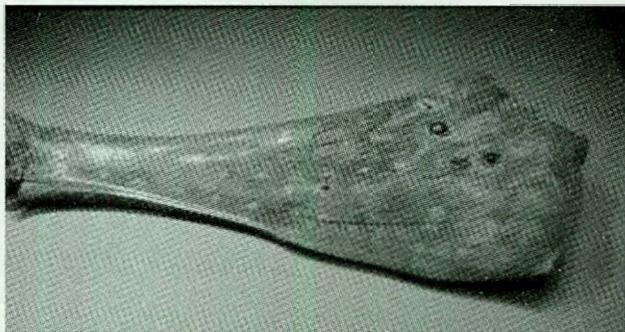
张 慧

公元9年，西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废汉自立，建都长安，国号曰“新”，年号“始建国”。公元14年改元“天凤”，公元20年又改元“地皇”。公元23年，赤眉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覆亡。继而刘秀灭亡绿林军称帝，是为东汉。

由于王莽的新朝过于短暂，后起的王朝对新朝的制度以及建设很快荡为平地，因此基本没有留下见证这个朝代存在的实物资料。笔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参观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别注意是否有证明这个朝代存在的实物藏品。几经寻觅，很幸运地见到了孤零零摆放在那里的几件沾满锈迹的铜器——新莽权衡，不由生发一丝特别的亲切。因为它的出土地就在离我的老家村庄仅仅八里之遥的甘肃省定西县巉口镇，它的发现者当时还在巉口的农田中抚弄属于自己的责任田，而我早在中学时期就已知晓新莽权衡出土的准确位置，还曾在挖到这些器物的悬崖边几度逡巡。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所见证实了之前流传于家乡的关于新莽权衡发现的传说，也引发了我对于家乡故土的一分骄傲和自豪。

在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所谓新莽权衡铜器共3件。2件是“权”，圆形似环中空，大小不一；1件是“衡”，方形长条，中间为纽。称重的时候，衡之一端悬权，一端挂物，类似今天的天平。展览标签上写的是：新莽权衡，1925年出土于甘肃省定西县称钩驿乡。此处所谓出土地“定西县称钩驿乡”不确，应为“定西县巉口乡（现为镇）”，民国时期巉口属“平西乡”。展柜里还附有数张图片，显示当时出土共为8件铜器，除此3件外，另有5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它们的发现者，当地农民秦恭老汉。

1985年，秦恭尚健在，时年七十一二岁，笔者随



定西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林如采访了秦恭。在他家的院子里，秦恭讲述了发现新莽权衡的经过。

秦恭说，记不清是民国的哪一年了，反正是民国十八年大旱挨饿前的哪一年，我十一二岁的样子，我和我哥秦让还有跟我差不多大的黄泰三人到“吊地沟”放牲口，忽然看见沟边悬崖上有黑色的东西，太阳照上去有反射的光。吊地沟现在的地形变了，南面修了铁路桥，北面修了水渠，夹在铁路桥和水渠的中间，一道长满碱蓬草的碱沟，解放后很长时间丢卫生院的死娃娃，没人敢去。第二天，我和我哥拿了铁锹去挖，一挖共挖出八件东西，黑颜色，以为是铁。两个是条条（衡、丈），一个钩搭（钩），五个圈圈（权）。两个条条长短不一，其中一个折成两截子，折开的茬子对起来恰好能合上。五个圈圈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碗口大，最大的盛面的筐箩大。这些东西上都有字，让教书的先生吴（瑜）大师认，吴大师说是篆字，但不认得是什么字。我和我哥拿了一根椽，把圈圈穿上抬回了家。因为重，我的大伯、父亲、三爸和堂哥都帮了忙。拿回家后，谁也不认得是什么东西，称了一下，记得最大的九十斤，一直搭在草棚里。后来遇上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6月里父亲饿死了，我们弟兄分了家。这些古董闲放在家里，没有用处，加上家里不利祥，迷信是不是它们惹的祸，就

有了卖掉换点粮食度荒的想法。我哥秦让就雇了冯家岔的张油客（张登高）搭帮，用两辆手推车儿推到兰州，当做废铜烂铁卖掉。我哥回来，告诉我和我母亲，卖了60块银元，一半给了张油客作了雇工的开销，自己落了另一半30块银元。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解放以后听说是很值钱的宝贝，前年还来人做过调查，给我照了相，不知道做啥。

张林如问秦恭：“你哥到底卖了多少钱，你知道吗？”秦恭一笑说：“嘿，我哥的阔（方言：谎话）多得很，把我和我妈经常哄的转哩，究竟卖了多少钱，谁晓得哩！来时反正拿下（读ha）30块钱。”

收购秦让“废铜烂铁”的古董商人叫马实斋，他其实也是个不识货的外行。过了几天，有一个叫张寿亭的古玩商人来到古董店，看见这些古物试探着问马实斋：“你这些东西卖多少钱？”马实斋张口要了240元。张寿亭二话没说，抖出240个银元，全部要下了8件铜器。到了张寿亭手里，逐渐被兰州古玩商识破此为稀世珍宝，一时间身价大涨。同年秋天，北京古玩商朱柏华听到消息，从北京赶来兰州，以140块银元将一只铜衡和9斤铜权买去，回北京后又以5100块银元转手卖给北京琉璃厂“尊古斋”古玩铺。其余6件，由当时省建设厅长杨慕时用800块银元收购，欲占为己有。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知道了这件事，有过询问，杨慕时便忍痛拿出交存兰州民众教育馆。不料事有意外，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7月的一个雨夜，教育馆保存的6件文物，除一件最重的大权（石权，读danquan）外，其余5件全部被盗贼盗走。

盗案发生后，时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将军，立即向国民政府报案，并电请国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务必设法访缉，并予以保护。民国二十二年（1933）七月，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负责人马衡，在天津市英租界“源丰



永”珠宝店发现了被盗的5件文物。马衡与珠宝店主翟捷三交涉，翟拒不交出，狮子大张口要价30万大洋赎出。马衡以文物保管委员会名义通知天津市警察局，警局以盗卖国宝罪逮捕了翟捷三和盗窃犯高灿章，才将宝物追回并保存于北京团城。不久，先前被“尊古斋”古玩铺所购得的两件也由故宫博物院按原价赎回。于此，8件古物终于完璧，算是有惊无险。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中国学术协会在团城举办了“西北文物展览”，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首次公之于世，引起学界强烈反响。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部分精华文物装箱向内地转移，其中包括新莽权衡器。1949年春，国民党败退台湾，将其中5件（三权一钩一丈）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1959年，原留在兰州民众教育馆的一件石权，送往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现在国家博物馆共藏3件（一衡二权），即为笔者参观所见。至今令我不解的是，当年故宫博物院已经收藏了7件新莽权衡器（一件石权尚在兰州民众教育馆），团城举办“西北文物展览”时应为一体展出，抗战时期转移内地时也不应分割。但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为什么将一件衡器和九斤权留了下来，令人匪夷所思。

在中国文物收藏史上，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具有绝无仅有的地位，是研究新朝历史的重要实物依据。同时，这一组新莽权衡，在我国度量衡制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价值连城，弥足珍贵，属国宝级文物。傅振伦先生《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指出：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不仅是研究我国度量衡器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而且在史学、考古学、金石学、冶金史等方面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据傅振伦先生考证：出土的8件新莽权衡器中，“权”“衡”“钩”均为衡器，其中“权”形似圆环，

相当于后世磅秤的砝码，自3斤、6斤、9斤、60斤至120斤不等；“衡”状如同横梁，中部有纽，一端悬“权”，一端挂“钩”，用于称物。权、衡、钩三者合一，与现代天平相似；而“丈”是测量长短的计量器。

这8件古器，一一分述：

(1)三斤权：外径6.50厘米，铭文仅“三斤”二字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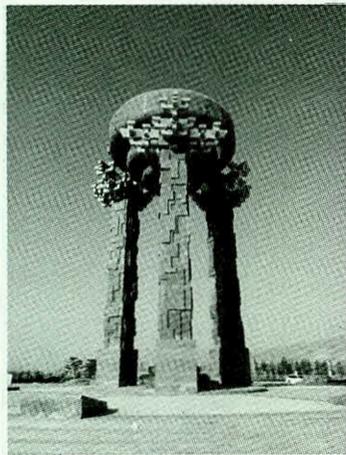
(2)六斤权：外径7.10厘米，铭文“律六斤”三字隐约可见。

(3)九斤权：外径10.35厘米，铭文为“律九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4)二钧权：60斤，外径30.40厘米，铭文为“律二钧，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5)石权：120斤，外径28.05厘米，较厚，铭文为“律权石，重四钧”等字，以及新莽统一度量衡诏书81字，曰“黄帝初祖，德币(z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这段铭文与《汉书·王莽传》所载王莽“托古改制”所颁制书(诏书)基本相同。内容是说，新朝建立是顺应“天德”之必然，是符合“天意”的，诏令全国各地，从兹而始使用以此为标准的统一度量器，以至“享传亿年”。

(6)衡：即秤杆。状如横梁，左悬已失，右悬尚存。长64.74厘米，宽1.60厘米，高3.30厘米。上悬



高3.00厘米，宽2.30厘米；下悬长1.40厘米，宽0.50厘米。正面中部刻有新莽统一度量衡诏书81字铭文，与石权铭文同。

(7)钩：即秤钩，上端有孔，形如小环，可悬于衡之下。钩孔直径4.50厘米，钩宽1.70

厘米，外缘长26.00厘米，内缘长22.5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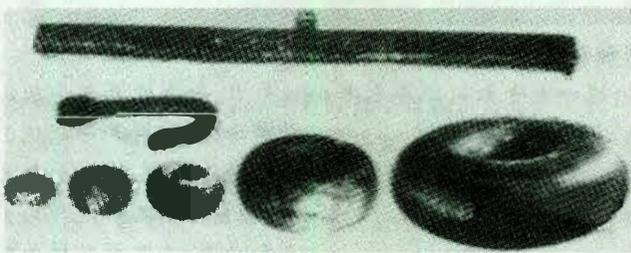
(8)丈：系新莽之标准丈，出土时断为两截。全长229.20厘米，宽4.70厘米，厚2.40厘米，与《汉书·律历志》所记载“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相符。

为什么新莽权衡会在甘肃省定西县的岷口镇出现？

据当地历史研究者考证，岷口在汉代是天水郡属国都尉治所，时名“满福”，在新朝仍保留了汉代的设置，改名“纪德”。其地有范围数里的汉代村落遗址和规模庞大的岷口汉墓群遗址。近年来，在遗址上陆续出土了“阴颖丞印泥封”“星占卜骨”“玉含蝉”等一批珍贵的汉代文物，俱有相当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文物。“泥封”是古代封合简牍公文及书信的干结胶泥，在胶泥上打有玺印，作为信验，以防私拆。“星占卜骨”是用来根据天象占卜吉凶的卜具。“玉含蝉”是古代生人的佩饰，也可以是死者的葬品。据考证，阴颖在今河南省境内，阴颖丞印泥封流落到岷口，耐人寻味，说明此地有较重要的官方机构。同时，当地出土的大型板瓦、筒瓦、瓦当，应为官署的建筑构件。也可推断，岷口作为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在当时不仅有繁荣的商贸，而且有发达的文化，也不排除有重要政府机构的可能，这就不难理解新莽权衡为什么会遗散在这里。傅振伦先生甚至认为，岷口可能是新莽时期安置管颁标准器的处所。果如此，岷口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更不可小觑了。

我们庆幸，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虽历经波折，却得以完好地保存，而遗憾的是至今分割于一道海峡的两岸。我们期待它们再次聚合的那一天的到来。

(作者：甘肃省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统战部副部长)



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的两件清代乾隆档案 看廓尔喀对西藏的侵略与清朝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

魏泽民

摘要：西和县馆藏清代档案中，有关涉藏问题的档案共有两件。这两件档案是清军在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第二次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时由地方政府发出的牌文和飭令。这宗档案内容详明，是清军在西藏反击廓尔喀入侵，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历史凭证，也证明早在康雍乾时期，中国中央政府就对西藏地方事务实行有效的管理，而在打败了廓尔喀对西藏的两次入侵后，乾隆皇帝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宗教和政治的管理，正式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对西藏政治和宗教事务的有效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西和县馆藏档案、牌文飭令、廓尔喀侵入西藏、清军反侵略

西和县档案馆在创建国家一级综合档案馆的过程中搞了馆藏档案编研工作，笔者有幸受邀忝列其中，看到了大量珍贵的馆藏档案，觉得非常震撼，但令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涉藏档案中有关清军对廓尔喀（今尼泊尔）发起的反侵略战争以及这次战争后正式确立的金瓶掣签制度和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事务的有效管理。西和县馆藏清代档案中，有关涉藏问题的档案共有两件。这两件档案是清军在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第二次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时由地方政府发出的牌文和飭令。这宗档案内容详明，是清军在西藏反击廓尔喀入侵，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历史凭证，也证明早在康雍乾时期，中国中央政府就对西藏地方事务实行有效的管理，而在打败了廓尔喀对西藏的两次入侵后，乾隆皇帝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宗教和政治的管理，正式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对西藏政治和宗教事务的有效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明以来，西藏事务全部是由西藏宗教上层和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公以及西藏大贵族操持。皇帝对西藏重大事务偶尔也派钦差进藏督办。但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方事

务的直接控制。康熙、雍正、乾隆皇帝考虑到对边远蒙古部族的约束，都对西藏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体系采取优抚政策。达赖和班禅也都对清朝的优抚政策感恩戴德。

一、反对廓尔喀人对西藏的武装入侵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罗布藏巴勒垫伊西就请章嘉胡图克图代奏，于庚子年（乾隆四十五年）前来京师敬祝大皇帝七十万寿。乾隆帝对此非常高兴，允其所请，并谒示隆重接待。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进京为乾隆帝祝寿，乾隆皇帝特遣皇六子质郡王永瑨和吏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永贵赶赴岱汉迎接，陪同前来热河，命向导处大臣编定从岱汉经察哈尔、多伦诺尔、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赛因达巴罕等处到热河的行程经住宿地点；召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入京陛见，面谕妥办接待班禅的食宿等事。漠南蒙古哲里木盟长奏称帮马二千匹、驼二百头，喀尔喀四部蒙古王公也愿帮助马驼，供班禅使用。乾隆帝特令在热河为班禅建须弥福寿之庙，供班禅来时居住。沿途各省官员遵乾隆帝谕旨，认真安排，迎送接待十分周到。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

清旷殿召见六世班禅，赐座慰问赐茶；二十四日，又在万树园大幄次，赐班禅及扈从王公大臣与蒙古回部王公等赴宴，赏赉冠服金银缎匹。班禅率众胡图克图为乾隆帝诵经祝寿。九月二日到达京师后，乾隆帝又多次赏赐。但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六世班禅出痘（身患天花），并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在京师圆寂。乾隆帝闻讯后十分悲痛，对护送灵柩回藏等事做了妥善安排，还把详情谕示达赖喇嘛，又命在北京四黄寺内为六世班禅修建了藏经卷和衣履的石塔，名曰“清净化城塔”。

当时担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仲巴呼图克图，趁此机会将乾隆皇帝以及在京的满、蒙、汉各族王公大臣向六世班禅生前馈赠的礼品和圆寂后所送的赙仪等总计约值数十万两白银的金银财宝据为己有，并以教派不同为借口独吞了那笔巨额财富，给自己的弟弟确朱嘉措没有分任何东西。确朱嘉措是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在西藏是有很强影响力的活佛之一。确朱嘉措对时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兄长仲巴呼图克图独吞财富的贪心之举，愤愤不平，记恨在心。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皇帝发布命令，授权第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负责管理西藏地方事务。

第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1758—1804年）出生于后藏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与第六世达赖喇嘛有亲戚关系，他的家族被清朝政府封为公爵，成为西藏的大贵族之一。1761年他5岁时，被确认为第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762年被迎入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典礼，成为第八世达赖喇嘛。

在这期间，西藏各教派纷争十分激烈。游牧于青海的蒙古汗王和西藏的地方势力，用各种办法控制西藏的大活佛，以便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巩固所获得的特权。

当时，蒙藏地区大活佛圆寂之后，转世灵童主要是由最有名望的跳神巫师“吹冲”来认定。雍正五年，清政府正式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成为首任驻藏大臣。驻藏大臣不仅直接掌管西藏政务，还直接督察西藏宗教重大事务。

对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除了“吹冲”降神以外，还需报驻藏大臣，并由驻藏大臣上奏北京大皇帝恩准。“吹冲”在各种贿赂下，在跳神中，假借神谕，指定的活佛转世灵童大多出自蒙古王公或西藏的大贵族之家，有的甚至还“吹冲”家族中人。这种大活佛几都出自一家的现象，引起了蒙藏僧俗群众的不满，也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他决心革除西藏活佛转世制度的流弊。

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5年），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因为教派纷争和对自己的哥哥、时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仲巴呼图克图独吞钱财的不满，外逃廓尔喀国（今尼泊尔），伺机报复仲巴呼图克图，而当时南亚次大陆区域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势力深入了南亚次大陆，在此复杂背景下，英国人在廓尔喀就扮演了极为活跃的角色，在确朱嘉措活佛和英国人的挑唆支持下，廓尔喀国王决定乘此机会发兵入侵西藏，企图从战争中捞取最大好处。

廓尔喀是尼泊尔王国的一个民族，18世纪中叶，其首领统治尼泊尔后不断向外扩张。尼泊尔毗邻中国西藏地区，与后藏交界，贸易关系向来密切，常年以谷物与西藏食盐进行贸易。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西藏与廓尔喀之间发生了贸易纠纷，此时，适逢六世班禅的弟弟、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与其兄仲巴呼图克图发生内争，外逃廓尔喀投敌叛国，在英国人的怂恿下，乘机勾引廓尔喀兵入侵西藏。廓尔喀人以“银钱贸易冲突”、“西藏官员妄增税课”、“食盐掺土”等为借口乘机发动了对西藏的入侵。

廓尔喀第一次派兵2000余人入侵西藏，占领了聂拉木、宗喀、济咙等地。当时，已移居拉萨的八世达赖、七世班禅与驻藏大臣等官员，联名向清朝政府上奏告急，请求朝廷速派大军入藏抵御外侮。清廷为安定边疆，派理藩院侍郎巴忠、成都将军鄂辉带兵进藏援助。

因藏军不敌廓尔喀3000多人的进攻，后藏摄政、时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背着驻藏大臣，擅自以班禅的名义向英属印度总督康华利

(LordCornwallis)致函求援。康华利进退两难：如果不经过清廷的同意，英国及其英属印度政府擅自出兵援藏，势必会招致清廷的猜忌与反对，进而影响英国在华的全局利益，尤其英国在广东的贸易；如果英国及其英属印度政府坐视不管，很可能失掉扩大其在西藏的影响以及向中国内陆进一步渗透的良机。权衡利弊，康华利总督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名义上维持“中立”，暗地里则非常关注战争的进程，同双方都保持着联系。

后藏摄政仲巴呼图克图、噶布伦班第达、驻藏大臣庆麟、驻藏大臣雅满泰等，瞒着乾隆朝廷，主张与廓尔喀统帅素尔巴尔达布议和，而这一议和行为又得到理藩院侍郎巴忠和驻藏大臣成德、四川总督鄂辉等的赞同。八世达赖喇嘛反对，但巴忠不理。巴忠害怕进一步扩大战争，遂密令西藏堪布私自与廓尔喀议和，许岁币银5万两，让廓尔喀退兵，这样，西藏地方政府就与廓尔喀私下议和，“许银赎地”。这一举动也使英属印度政府企图从战争中渔利的如意算盘落空。

当年冬季，清军集结于拉萨，廓尔喀见清朝大兵集结，遂请求和解。巴忠等人贪功邀赏，不顾达赖、噶厦等的反对，私自许诺每年给元宝一千锭作为赔偿，为期三年，以换取廓尔喀退兵。乾隆五十四年初，西藏与廓尔喀签定了屈辱的议和协议，作为廓尔喀退兵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三地的赎金和条件，由西藏噶布伦每年向廓尔喀交纳元宝1000锭。

这次战役，由于清军前期作战不利，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接受屈辱条件而议和，招致廓尔喀兵再次入侵。对这一屈辱的议和协定，巴忠、雅满泰等隐瞒实情，没有向朝廷上报。三月，廓尔喀兵先已陆续撤回时，鄂辉等率清军乘机“收复”失地。因故未遇任何抵抗。六月，清廷调整西藏防务，加强扎什伦布等地防兵，于宗喀宗、聂拉木、济咙宗等要地修砌卡碉，并调整与廓尔喀的贸易政策。清军此次出兵，虽未交战，但已耗费军饷百余万两白银。巴忠以有功之臣离藏回京^[1]。

廓尔喀人第一次侵藏，获利不多。但巴忠之举助

长了廓尔喀人抢掠扎什伦布寺的野心。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六月，廓尔喀人因索取“赎地”之银不成，以大清国西藏地方政府未按约付足银元为借口，声称出兵千余人，再次进攻西藏，夺占聂拉木、济咙等地，并将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人裹挟到了廓尔喀。他们把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的兄长、时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仲巴呼图克图作为首选攻击目标，派遣主力3000兵力偷袭日喀则，准备洗劫扎什伦布寺。此时乾隆帝才明白究竟，遂愤然命清军入藏反击，驱逐廓尔喀侵略者。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清军奉命反击，命驻藏大臣雅满泰率驻藏绿营兵及驻达木厄鲁特蒙古兵前往扎什伦布（今西藏日喀则）慰问班禅，并与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部署沿边防御；命驻藏大臣庆麟主持前藏地区之防御；命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抽调满、汉、藏兵4000余人，由成德统领，驰赴后藏；命尚在热河的成都将军鄂辉速返成都，前往西藏统兵。

八月初，廓尔喀兵分两路兵向西藏发动进攻：一路由济咙进入，围攻宗喀宗，遭遇教习汉兵陈谟、潘占魁率领的400名藏兵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后又退回济咙；另一路由乌咙入侵，滋扰定结。此时入侵聂拉木的廓尔喀兵逐渐增至千余人。原来，廓尔喀人在入侵扎什伦布的过程中，仲巴呼图克图见势不妙，在敌兵未到之前，即将细软、物件搬至东喀尔藏匿。孜仲与四名堪布喇嘛，则在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称占得不可与贼打仗。结果，扎什伦布僧俗人心惑乱，没有进行什么抵御，就大部散去。八月二十一日，廓尔喀兵侵据后藏首府扎什伦布，毫无顾忌，肆行抢掠，扎什伦布寺被洗掠一空。后又，廓尔喀兵攻打日喀则宗城堡，又掠去后藏藏民大量牲畜。第巴济仲喇嘛噶冲带领藏兵退守协噶尔。廓尔喀兵占领聂拉木后，往攻协噶尔（今西藏定日），被当地军民击退后，在聂拉木修筑了碉寨，并于聂拉木以北30里之拍甲岭设寨防守。廓尔喀兵此后又攻下了济咙宗（今西藏吉隆东南）、宗喀宗（今吉隆）等地，围攻并抢占了协噶尔宗

(今西藏定日)。

在廓尔喀兵的强势进逼下，七世班禅丹贝尼玛退居拉萨，全藏大震。达赖、班禅飞奏朝廷，向乾隆皇帝告急。当时巴忠护驾承德避暑山庄，闻变后畏罪自杀。鄂辉、成德等将罪责全部推给已经畏罪自杀的巴忠一人，骗得清政府信任后，又率领川军4000人由打箭炉前往西藏，抗御入侵者。

九月十二日，廓尔喀兵3000余人由兴萨开进，夺占定结。十月十二日，都司严廷良率藏兵、汉军及达木兵700余名，连打三仗，于十一月初一收复了定结。当时，雅满泰先后协商征调内地官兵7000余人，但行进速度缓慢，迟滞途中。十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命黑龙江将军都尔嘉，从索伦、达呼尔(今达斡尔)兵丁中挑选了1000精干士兵赶赴京师。

十一月初二，清廷授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统兵经青海入藏作战。随后又免去鄂辉、成德职，以惠龄为四川总督，奎林为成都将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福安康率大军入藏反击廓尔喀入侵时，达赖自愿捐出白银三万两用来购置军马，只因西藏地方荒僻，马匹无多，需要到西宁一带去购马。但是，从拉萨到西宁路途遥远，运送银两很不方便，遂咨会甘肃藩司，于西宁库内就近暂借三万两银子，交给喇嘛承领置办，并为此发给牌文，饬沿途州县文武员弁一准放行。西宁库内所借银两，待后从拨给西藏的军饷中如数扣除，而四川总督则承供往来一切盘费。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福康安受命驰抵后藏，立即整兵进行反击，在擦木、邦杏等地连获胜仗，随后又收复济咙，歼敌千余人。济咙以外，高山耸峙，道路崎岖，行走艰难。福康安把清军分成两路，他自率一路由济咙直夺界隘热索桥，成德等则率另一路由聂拉木直奔关隘铁索桥。

十二月初一日，由成都将军降职为行走参赞大臣的成德抵达札什伦布(今日喀则)，随即率领清军1000人，由拉孜、协噶尔前往聂拉木。二十七日，清军抵拍甲岭。成德命清军兵分两路：游击张占魁等带兵

270人，由西北往进；都司张志林带兵260人，由西南往进。另命协领九鼎驻守附近要地。二十八日，清军抵达拍甲岭前河岸，河上桥板已被廓尔喀兵抽去。成德命总兵穆克登阿指挥西南路清军，自己亲率西北路清军，急速架桥渡河。黎明时分，两路清军会合于拍甲岭敌寨前，随即发起进攻，毙伤敌200人，俘7人。清军乘胜扑向聂拉木。聂拉木官寨墙高堡大，廓尔喀兵恃寨固守。清军屡攻不下，损失较大。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成德令西北路清军于正面佯攻，西南路清军则暗将柴草堆积于寨门外焚烧，并抛掷火弹，将官寨外墙烧毁。廓军退入内墙。初二日，两路清军同时向聂拉木官寨发起进攻，将寨内火药仓库烧毁。初八日，成德密遣士卒挖掘地道，烧毁官寨西南角之粮仓。初九日，由四川总督降为副都统之鄂辉率一部清军赶到。清军挖掘地道，企图炸毁城墙，但被墙根大石所阻。成德等遂改变战法，决定先烧开官寨东门。十一日，清军在东门外挖壕沟，运柴薪，因大雪迟滞数日，至十六日烧开东门。这时，廓尔喀兵退由官寨内层石碉，用自来火枪射击。清军伤亡较大，暂时退出战斗。二十日，都司什格蒲益章率所部于寨西挖掘地道；张占魁率所部则于东、南两面佯攻。二十四日，清军由地道送药，炸毁石碉西墙，乘势扑上碉寨，消灭寨内100名廓兵。至此，清军经一个月围攻，收复聂拉木城。战后，成德、鄂于木萨桥、拍甲岭等处分兵防守，未乘势收复他处^①。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乾隆皇帝决定派嘉勇公福康安率领清军入藏作战。2月，清政府调集大量兵力和物资，派出以福康安为主帅的1.7万大军进藏。三四月间，游击将军关联升、总兵袁国璜等率部3000人先后抵达前线。而廓尔喀则在济咙、绒辖尔(今定结南，中国境内)等处砌卡筑碉，添兵据守。闰四月二十五日，福康安、海兰察率清军6000人，由日喀则一路南下，经拉子(今西藏拉孜)开赴绒辖尔、聂拉木等处，五月初七，福康安所部攻下擦木要隘；十日，收复济咙，十二日，成德、岱森保等部收复了聂拉木以南要隘木萨桥。至此，清军扫清擦木至济咙段

边境，清军将廓尔喀人所占领的西藏地方收复，将侵入西藏的廓尔喀人全部驱逐出境，解除了西藏人民的灾难，巩固了祖国西南边陲。十三日，福康安率军由济咙热索桥进入廓尔喀境内，打算直捣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廓尔喀迫于压力，向清政府请求议和，但乾隆帝决心出境作战，一举灭掉廓尔喀，所以拒绝和谈，并于三月十五日任命福康安为大将军，统领精兵攻入廓尔喀国。此后，清军一鼓作气，一路浩浩荡荡开进。十八日，清军抵达旺噶尔，已深入廓尔喀境内达170里之遥，未遭遇大的阻击。而廓尔喀兵已收缩至阳布以北地区，严密布防，严防死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清军几路突破横河防线。六月初九日，清军又突破东觉防线。乾隆五十七年六月，福康安领兵抵达廓尔喀关津热索桥。这里两边是悬崖峭壁，前面又有河流阻挡，敌人设碉卡防守，难以攻取。福康安便派兵潜从上游捆木渡河，分兵三股，奇袭敌军。廓尔喀兵败退，清军占卡焚栅，夺桥前进。成德率另一路清军也攻碉夺卡，占据山梁，强夺铁索桥。福康安和成德分别领军夺渡热索桥和铁索桥后，便翻越高山，攻占要道，深入廓尔喀境内数百里，很快逼近了廓尔喀都城阳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期间，孙士毅、和琳、鄂辉、惠龄在前后藏、东西路也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火药等物资运到军前。迫于清朝大军压境，廓尔喀国王感到势穷力竭，于七月初八再次遣使与清军议和，表示愿送还所掠扎什伦布财宝、金塔顶、金册印，并呈献沙玛尔巴骨殖，认罪乞降。而清军孤军深入，以图捣穴擒首，但由于清军深入廓尔喀境内但并无充分条件，加之不服水土，粮饷不济，阳布（加德满都）以北又有崇山峻岭，大河阻塞，不熟廓尔喀的地理环境，敌军又防范森严，结果，清军在雍雅山一带进军受阻，陷入重围，前后受敌，损失惨重，鉴于此，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二十二日奉旨与廓尔喀国王拉纳·巴哈都尔议定和约：宣布巴忠私订的协议书作废；廓尔喀归还还在西藏掠夺的财宝，包括金塔顶、金册印等，以及俘虏的人丁；并交出了畏罪自杀的确朱嘉措（即挑起

事端的沙玛尔巴）的尸体、妻小及他们掠去的扎什伦布寺部分财物一并送至福康安军前，表示永不敢犯边界，还许诺向大清国五年一朝贡。清军退出廓尔喀领土，战争结束。

在两次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战役中，为保证作战军队粮草供应，乾隆皇帝下诏暂拨达赖、班禅库存，并于藏内买粮。乾隆帝还派遣御前侍卫巴忠为钦差大臣，赴藏主持军事。当时西藏驻有清军500人，藏兵1600人，台站兵1300人。驻藏大臣庆麟在接到朝廷谕旨之前，就调拨藏内500绿营兵及察木多、达木等兵700人，分路堵御廓尔喀侵略军。四川总督李世杰亦在成都抽调满兵500名，绿营兵1300人，屯练降番兵1200人，全部交由提督成德、总兵穆克登阿率领，经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巴塘、里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驰赴后藏。

这次清军出兵廓尔喀在国外作战，乾隆帝决心坚定，福康安指挥果断，清军连续作战，大败廓尔喀军，保卫了大清国领土。但在后期的作战中，由于以故孤军深入，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劳师损兵。

九月初四日，清军由廓尔喀境内全部撤出，退回济咙。不久，因反击廓尔喀功，福康安受赏一等轻车都尉，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和琳补工部尚书等。乾隆帝还下令把沙玛尔巴的尸骨，分别的在前藏布达拉（即拉萨）、后藏扎什伦布（即日喀则）以及察木多一带通衢大站地方悬挂，还将起衅犯事原因及过程布告示众，以为儆戒。九月十六日，清政府定廓尔喀五年一贡。十月初三日，廓尔喀国王拉纳·巴哈都尔派使到北京入觐^[3]。

乾隆五十七年（1792）闰四月二十九日，乾隆帝下诏治仲巴呼图克图、孜仲呼图克图等罪，以为西藏众喇嘛鉴戒。在治仲巴呼图克图罪的同时，乾隆帝还命鄂辉、和琳亲到布达拉传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前后藏的呼图克图、喇嘛等，告以清兵进剿廓尔喀贼匪，完全是为了保护黄教。

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二月二十七日，乾隆帝下诏将鄂辉等人永远枷号于前藏，作为对不肯用心办

事、以致藏地不靖的大臣的惩戒。

鄂辉是满洲正白旗人，由前锋逐渐升任守备、总兵、将军，在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的过程中，他亲手擒获了林爽文，因战功卓著被图形紫光阁。在第一次廓尔喀侵扰后藏时，鄂辉在四川与提督成德率师赴援。当时，鄂辉自作主张，擅自与廓尔喀议和，指示巴忠示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让他们贿赂廓尔喀，使其交出所侵占之地，疏陈善后之事。不久，鄂辉被授予四川总督之职。在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时，乾隆帝因鄂辉误用巴忠议政滋事，削夺其官职，授副都统衔驻藏，为福康安督运粮饷。廓尔喀投降后，藏地事平，鄂辉便被枷号于前藏。不久又释还京师。

福康安班师西藏后，按乾隆皇帝旨意对西藏事务进行了整饬。严惩了确朱嘉措的叛国行为，废除了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转世，查抄了该系的寺庙和财产，并强令其所属百余名红帽喇嘛改奉黄教。从此，噶玛噶举红帽系在西藏销声匿迹，不复存在。

福康安在凯旋后经过札什伦布寺，又与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共同订立了著名的《钦定二十九条章程》，并在拉萨大昭寺前立下征廓尔喀纪功碑，以纪念驱逐廓尔喀入侵西藏战争的胜利，碑文由内阁侍读学士杨揆撰文。纪功碑既是战胜廓尔喀人入侵的明证，也是清王朝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记录。

西藏发生的两次廓尔喀入侵事件，都先后被清政府协同西藏地方政府打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祖国领土完整，加深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政权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体现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合作的良好精神，扩大了中央政府在西藏僧俗群众和各阶层的影响。在此期间，八世达赖喇嘛亲自率领各界人物迎接政府军队，征集粮草和军马，慰问参战将士，体现了与中央政府合作的良好精神。也正是在这一期间，乾隆皇帝对西藏宗教制度做出了重大改革，制订了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从而对西藏宗教制度做出了重大改革，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宗教和政治事务的管理。

为据禀札飭遵照事：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世袭一等轻车都尉署理四川总督印税孙：据总局司

道英善和总理林道的禀报，由陕甘部堂转飭藩司给拨银两三万交给喇嘛承领，以备在西宁一带购买军马之用，雇佣驮运脚户价钱和来回沿途盘费已由四川省支付，并责成沿途各州县驿站对护送银两的官员多派兵护送，一体遵行，不得迟滞，仍将接替护送日期报查。此牌到日，即报呈陕甘督部堂查销，毋违。

巩昌府尊奉甘肃藩司转飭大将军福康安、总督部堂惠临和驻藏大臣之命，给所辖州县下发的飭令。责令所过沿途州县，当解送银两的官员到境后，多派兵护送。两件档案中都提及在反对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斗争中，第八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僧俗积极支持清军反侵略斗争的情况，达赖喇嘛甚至自筹资金白银三万两用作赶赴西宁一带购置军马的费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爱藏情怀，而乾隆爷接受了达赖喇嘛的请求，但因为运输不便，诏令在西宁库存中暂借银三万两用作购马费，以后在解往西藏的军饷内如数扣除，运输费用可由甘肃藩库解决，并转飭沿途州县驿站和文武员弁准此放行。

二、金瓶掣签制度的形成及其意义

按历史定制，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唯独噶玛噶举派的活佛噶玛巴例外，其转世灵童主要是由上一世噶玛巴的遗嘱来认定，但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同时，为使西藏长治久安，对外不受外人侵扰，对内治理有法可依，乾隆皇帝派人与达赖、班禅的僧俗要员商议，共同制订出《钦定二十九条章程》（即《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该章程使清王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更加完善，得到西藏上层由衷地拥护。意义深远的金瓶掣签制度就源于此。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的制度。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二十六日，乾隆帝第一次提出以金奔巴瓶抽签法方式，确定达赖、班禅等大喇嘛的化身呼毕勒罕。

金瓶又称为“金奔巴”或“金本巴”（“奔巴”为藏语“瓶”）。金瓶掣签制度特别设立了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供蒙古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掣

签用。另一个置放在拉萨大昭寺，专门供西藏、青海等地掣签定大活佛转世灵童。凡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经金瓶掣签认定。《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条就立下了金瓶掣签制度：

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灵童的问题。依照藏人旧例，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如此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之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十一月十七日，正式颁布金奔巴瓶制。达赖、班禅系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两弟子，因黄教禁止娶妻，故宗喀巴遗嘱达赖、班禅俱称呼毕勒罕（活佛），圆寂后，新出数名呼毕勒罕孩童时，由拉穆主持，吹忠降神，以确定呼毕勒罕所在。但是，在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嘱托，假借神言，徇情妄指，以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与蒙古世职无异，甚至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以至众心不服。仲巴与沙玛尔巴均是呼图克图，同为前辈班禅弟兄，仲巴系扎什伦布商卓特巴，坐享丰厚，沙玛尔巴居住廓尔喀，未能分享，遂唆使廓尔喀兵抢掠，这些都是呼毕勒罕不真及族属相袭的流弊。乾隆帝清楚地认识了这些情况，便创金奔巴瓶制，以定达赖、班禅等大喇嘛的呼毕勒罕。金奔巴瓶制的具体做法是，设金奔巴瓶一于拉萨大昭寺，

内装象牙签数枚，遇有呼毕勒罕出世互报差异时，将报出孩童名的出生年月日及名姓，各写一签，放入瓶内，焚香诵经七日，由驻藏大臣会同大喇嘛等在众人面前抽签决定。蒙古地方，各旗部落供奉的呼图克图很多，大小不等，则在京城雍和宫内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某旗某部落出有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其有关小孩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达赖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由理藩院大臣公同掣签。金奔巴瓶制度的颁定，不仅达赖、班禅和西藏的呼图克图，就是青海、蒙古的呼图克图，其择定呼毕勒罕之权，实际上都已归属清政府。这对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对蒙藏地区的管辖，起了重大的作用^[4]。

当然，这个《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中关于禁绝藏人与边外诸部主要是廓尔喀互通贸易问题，虽然有点因噎废食之嫌，但这是当时的环境使然。

《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经乾隆帝批准实施，于五十八年正式颁行。八世达赖极为高兴，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与驻藏大臣商议后，决定减免或豁免百姓交纳的赋税，对穷苦百姓优加抚恤。清嘉庆九年（1804）年第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因病在布达拉宫去世，享年46岁。

确定达赖、班禅转世呼毕勒罕的金瓶掣签的程序和仪注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

（1）在清朝皇帝任命的摄政活佛或总管扎什伦布寺事务的扎萨克喇嘛主持寻访灵童后，由摄政召集僧俗官员会议，确定3名（或2名、4名）呼毕勒罕候选人，将详细情形向驻藏大臣禀报，请求转奏皇帝批准举行金瓶掣签。

（2）在皇帝御批同意后，将确定的呼毕勒罕候选人及其亲属和师傅等接到拉萨，并经驻藏大臣和摄政、各大呼图克图看验，认为确有灵异后，方能举行掣签。

（3）在掣签前将金本巴瓶从大昭寺迎到布达拉宫供奉有乾隆皇帝的僧装画像（圣容）和皇帝万岁牌位的萨松南杰殿，由大呼图克图率三大寺及布达拉宫南杰

扎仓僧众（确定班禅转世呼毕勒罕时还有扎什伦布寺僧人）诵经祈祷7天或9天。

(4) 掣签之日，驻藏大臣和各大呼图克图、僧俗官员集会，用满文和藏文书写名签，核对无误后，由一名驻藏大臣封签（用黄纸包裹），放入金瓶中。

(5) 由在场的呼图克图及高僧等诵咒祈祷，由另一名驻藏大臣摇动金瓶，然后掣出一签，当众宣读掣中者名字，并交给在场藏汉官员传阅，然后还要取出未掣中的名签传阅，以示书写及掣出的名签真实无欺。掣签后即派人去呼毕勒罕住处报信祝贺。

(6) 掣签的情形和结果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得到皇帝批准后，向呼毕勒罕宣读圣旨，才算完成金瓶掣签的全部程序。

(7) 经皇帝批准并派大员主持，举行坐床典礼（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班禅额尔德尼在扎什伦布寺），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继位事务才最后结束。

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金瓶掣签制度，对当时的西藏、蒙古地区社会和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意义深远。

首先，在政治上，金瓶掣签是对活佛转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制定颁布法律文书和采取一系列措施，将活佛转世呼毕勒罕由吹忠降神来指定，改变为由金瓶掣签来决定。究其实质是清朝中央政府以此维护和保持对认定大喇嘛转世呼毕勒罕的权力，这就进一步体现并强调了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问题上中央的权威。此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圆寂后，从转世灵童寻认、掣签乃至坐床都是遵照国家法定制度按部就班进行的，由驻藏大臣亲自照料，按照程序逐一报经皇帝批准，这就履行了法律和行政手续。

其次，从宗教上看，由于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完全按照藏传佛教仪轨来进行，在宗教上符合藏传佛教的基苯教义，这就确定了金瓶掣签在宗教上的合法性，顺利地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延续问题。因此被佛教界、上层贵族世家和信教群众所接受。

第三，实施金瓶掣签，把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大呼图克图、大活佛等转世呼毕勒罕的权力，从西藏地方集中到清朝中央，以防止蒙藏上层贵族夺取宗教权力，造成地方势力的膨胀，避免了历史上教派内部、教派与世俗贵族势力之间争夺转世呼毕勒罕的矛盾斗争乃至战乱的发生，有利于蒙藏社会的长期相对稳定。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整饬、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管理大活佛的一项关键措施。它既符合政治手续、法律手续，也符合宗教手续；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体现了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历史事实；有利于维护和稳定蒙藏地区的社会局势，安定边疆，团结宗教上层人物和广大僧俗群众。金瓶掣签制度的设置和实施，它的立法思想是正确的，具体操作是可行的。经过百余年的实践证明，它是一个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给后人以启迪^⑤。

金瓶掣签制度建立后，第一个启用金瓶掣签并得到认定的达赖是九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即十世达赖楚臣嘉措；第一个用金瓶掣签认定的班禅是七世班禅转世灵童，即八世班禅丹白旺修。

自清王朝至民国的200多年间，仅西藏一地，就有格鲁、噶举、宁玛三派的39个活佛转世系统70余名活佛通过金瓶掣签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用金瓶掣签认定的大活佛是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即十一世班禅确吉杰布。

[参考资料]

[1]张曦.试析清廷对廓尔喀首次入侵西藏原因认识的过程[J].西藏研究2015年1期

[2][3]清军反击廓尔喀侵略西藏[OL].铁血网.bbs.tiexue.net/post2_3.

[4]金瓶掣签制度的由来[OL]新华网 news.xinhua-net.com/zil.

[5]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DB/OL].zhidao.baidu.com/link?

（作者：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一中教师）

赵时春研究概述

张怀宁

摘要：赵时春是明朝一位著名学者，他的作品传世较多，文370余篇，诗1550余首，词40余篇，《平凉府志》13卷等，著作先后有十几种版本，其中明清时的几个版本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是古籍善本、珍贵文献。

关键词：赵时春、传世著作、文献

赵时春（1509—1567），字景仁，号浚谷，甘肃平凉人，他十四岁获陕西诗魁、乡试第三（解元），十八岁得礼部会试第一（会元），科举应试春风得意，被誉为“嘉靖八才子”之一。历任兵部主事、翰林院编修、右金都御史等，但他仕途坎坷，是直言上疏的忠臣、“三翰林”之一，官场三起三落，政治、军事方面“时春功虽不就，天下皆壮其气”。他著有《浚谷集》《平凉府志》《稽古绪论》等。现代人评价赵时春为明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或称为著名才子、文人、学者、著名作家、著名诗人、散文家、政论家、方志学家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几年，研究赵时春的新人新作不断出现，对于继承、发展、繁荣祖国大西北的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研究赵时春的文獻

1. 明代的史料

赵时春的自传见于明嘉靖《平凉府志》卷二进士目。赵时春的著作在明代有赵守岩的1569年初刻本《赵浚谷集》十六卷，周鉴于1580年的增刻本和《赵浚谷集》十七卷本三种。

门生周鉴写《明御史中丞浚谷赵公行实》见《赵浚谷集》附录。

状元康海写《赵公（玉）墓志铭》见《封山集》卷六。

首辅徐阶写《赵母许氏墓志铭》《浚谷赵公墓志

铭》见《世经堂集》卷十八、《国朝献征录》六十三，又写《浚谷赵先生集》序（1580年）。其中纵向联系，将赵时春比为汉之贾谊，从士风、国是的高度给以肯定评价。

王崇古的《浚谷赵公墓表》见《赵浚谷集》附录。李开先的《赵浚谷诗文集》序（1565年）评赵时春“诗有秦声，文有汉骨；朴厚而近古，慷慨而尚义”。

胡松的《浚谷集》序（1562年）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称赵时春诗文“秦人而为秦声”。“豪如太白而不淫，雄如子美而多变，疏畅跌宕如司马子长、班叔皮”。李贽的《金都御史赵公》见于《续藏书》卷二十六记载：“当是时，海内伺其有所制作，争传诵之”，“一时文学气节政事之声振动天下”。

胡直写《赵浚谷先生文》序。何乔远作《赵时春传》见《名山藏》卷七十六。钱谦益有《赵金都时春》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谈迁的《国榷》编年中有赵时春的记录。明代著述目录《千顷堂书目》有赵时春著作的著录。以上是研究赵时春的权威资料。

2. 清代的著录与评论

清朝所编的《明史》卷二百，在“边将列传”中立《赵时春传》，评他“读书善强记，文章豪肆，时与唐顺之、王慎中齐名”。他的代表作《上崇治本疏》《御寇论》主体被收录。“凡引据古人事实，先以正史为凭，再及别史、杂史”（《辘轩语》）。唐顺之认为

“宋有欧苏、明有王赵”，把赵时春与欧阳修、苏轼相提并论。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肯定了这一看法。

清代平凉司理叶正蓁 1659 年的补刻本《赵浚谷集》十六卷，书前有明清时代的五人序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赵浚谷集，诗文多慷慨自喜，不可拘以格律。胡松序所谓“秦人而为秦声”，亦其风气然也。然则史所谓“文章豪肆”者，长短俱在是矣。平凉府通志十三卷，明赵时春嘉靖三十九年（1560）撰成。是书以平凉为西北要地，旧未有志，因创修之，分十七门，曰建革，曰山川，曰户口，曰田赋，曰物产，曰坛祠，曰藩封，曰官师，曰兵制，曰学校，曰人物，曰孝节，曰风俗，曰河渠，曰寇戎，曰寺观，曰祥异。其考证叙述具有史法，在关中诸志之内最为有名。

《平凉府志》是平凉历史上第一部现存地方志，29 万多字，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献史料价值。专家学者研究明代韩藩王、马政、赋税官银、边境战争、明代文学史等问题多引用赵时春的论著。

《大一统志》《甘肃通志》《山西通志》《山东通志》中有赵时春的相关记载，《皇朝经世文编》《明文海》《御选明诗》《历代赋汇》等都选有赵时春的诗文。

3. 民国时抄本回家乡

民国十三年（1924）甘肃庄浪人李植斋编印《浚谷文钞》。甘肃省图书馆藏有石印的《浚谷文钞》两卷，《赵浚谷集》十卷，《诗集》六卷。

张维的《甘肃人物志·臣工传》中有赵时春传，《陇右方志录》中收录对赵时春的《平凉府志》评述。张维存有《浚谷集》全帙嘉靖时精刻大本，他对《平凉府志》的传世有特殊贡献，在该志前言中说：“浚谷先生《平凉府志》，陇中久失传本。《四库提要》称其在关中诸志中最为有名，漫漶磨灭不可缮写，故仅列之存目。民国二十三年（1934）余于北平图书馆见之，盖即四库存目本，漫灭虽多，大体尚可缮录。归过平凉，因告范朴斋专员，函平抄录一本。三十三年（1944）春余复抄此。”

二、研究赵时春的现状

1. 甘肃平凉对赵时春的宣传研究

企予的《赵时春的散文及其文学活动》（甘肃《社会科学》1990.4）认为散文家赵时春“以论政而闻名”。壬木、正一的《赵时春的生平及其“事功”思想》（《社科纵横》1992.3.），王学礼、王琪《赵时春籍贯考》（《社科纵横》2000.6.）介绍他的生平事迹。赵时春的岳父家在甘肃华亭县，他在平凉与华亭之间来往较多，晚年因家族矛盾，赵也移居华亭砚峡，协助修惠民渠、改进陇上窑烧瓷技术、开煤矿、搞创作，对地方开发建设有贡献。

《平凉市志》与《平凉地区志》^①的“人物篇”中，对赵时春的业绩、著作重点介绍，评价极高。

荆爱民、杨维周的《赵时春传》（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是“第一部赵时春传记”。张砚田整理的《赵时春诗集》2000年6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崆峒区政协印精装本《赵时春文集选编》。平凉市政协编印《赵时春诗集》（2006年）是“第一次整理印行的赵时春诗歌作品”。

魏柏树校点赵时春的《平凉府志》（1999年）是“第一次整理的赵时春方志著作”。

荆爱民的《赵时春有关史料辨考》，针对赵时春卒年的1566、1567、1568年三种说法，根据他的墓志、墓表、作品等考证出：1566年12月27日是农历，1567年1月15是阳历，准确可信。张连举的《三起三落的赵时春》，魏柏树的《赵时春诗文赏读》，李春茂的《明代才子赵时春》等文章介绍他在政界、文坛的成就，受到广泛关注。

2. 高校学者对赵时春的研究

刘景荣在兰州大学所编《赵时春年谱》（2010年），对他的生平事迹、史传资料、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西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郝润华教授主编陇右文献丛书，其中杜志强整理出版了《赵时春文集校笺》^②。赵逵夫教授主编诗赋研究丛书，杜志强校刊出

版了《赵时春诗词校注》^⑨，杜志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赵时春》（《甘肃理论学刊》2011.6.）；《秦人而为秦风——论赵时春的诗歌创作》（《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5.）等。认为赵时春是明代一位有影响的人文人，其思想中经世与理学色彩十分浓重，为人正直，交往以嘉靖年间的进士群为主，多交兵部官员和陕籍人士，一生仕途坎坷，除客观因素外，他自身缺乏封建官场的耐受力、应变力和前线作战的经验是主要原因。赵时春文学创作的“秦风”特色十分明显，文学思想接近“唐宋派”，对于戏剧、小说等新兴体裁，他不置一词，他是一个偏于保守的文人。他的诗学思想、诗歌写作以现实主义兼浪漫主义为特色，七言歌行能代表他的诗词成就，对陇东山水进行集中、典型的描写，具有积极的人文意义。《明史》本传中对诗人的评价“诗伉浪自喜，类其为人”我们不认同。杜志强的论著，从仕途、思想、个性、交游、作品、评论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代表了专家学者研究赵时春的新水平、新成就。

西北大学师海军事博士论文《明中期关陇作家群研究》（2010年）涉及赵时春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横向联系，比较研究的方法十分突出。

王慧在西北民族大学的论文《明代西北方志研究——事功与民本：赵时春平凉府志体现的方志思想》（2011年），认为赵时春以征实为要旨，反对空论，痛陈徭租及宗藩欺民，是一位方志学家。

王文元《赵时春：身负奇才难补天》见（《兰州晨报》2009.11.6），调研他在甘肃华亭的遗迹。

三、研究趋向

赵时春著作是珍贵的古籍文献《明史·艺文志》与《四库全书》别集存目著录《赵浚谷集》十六卷（诗六卷文十卷），又十七卷本（诗二卷赋文十五卷），另有十五卷本（诗六卷文九卷）。史部地理类存目著录《平凉府志》十三卷。西北师大的漆子扬教授说：《四库全书》中的甘肃学人，荣誉最高的是会元赵时

春。伏俊琰教授说：《四库全书》收录赵时春著作四十六卷，希望学者进一步研究。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一《浚谷文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990年影印《浚谷集》十卷《浚谷文钞》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中有赵时春的《稽古绪论》。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赵浚谷集》十六、十七卷本。《中国善本书提要》有《赵浚谷文集》十卷专条。

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明清时期4）其中06065《稽古绪论》（不分卷）《洗心亭诗余》一卷 明赵时春撰明隆庆四年（1570）赵守岩刻本 存大连图书馆。06066《浚谷先生文萃》五卷 明赵时春撰 明胡直辑 明隆庆五年（1571）刻本 存福建省图书馆。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之赵时春《平凉府志》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本 北京图书馆出版（2003年）第十九册。

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⑩中列有《赵浚谷文集》十卷，存国家社科院，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刻本。”书前有1562年胡松写的序言。

杜志强的论文《赵时春著作的三个明刊孤本》（《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3.）中考察提出：《浚谷先生集》十七卷本，《洗心亭诗余》，《稽古绪论》有三个明刊孤本，分别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均作善本保存，希望学者关注和保护。

四、结语

从明朝中期至今约五百多年，赵时春的著作传世较多，文有370余篇，诗1550余首，词40余篇，著作先后出版了十几种，按时间顺序可排列为：1560年《平凉府志》十三卷，1565年《赵浚谷集》十五卷，1569年《赵浚谷文集》十六卷，1570年《稽古绪论》《洗心亭诗余》一卷，1571年《浚谷先生文粹》五卷，1580年《赵浚谷集》十六卷，十多年后，《别本浚谷集》十七卷。1659年《赵浚谷集》十六卷。1924年石

印本《浚谷文钞》二卷。2006年《赵时春文集选编》《赵时春诗集》。2010年《赵时春全集校释》，2012年《赵时春文集校笺》《赵时春诗词校注》。其中明清时（乾隆以前）的版本多为善本，专家称之为“十六卷本胜在全，十七卷本胜在精。”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国家图书馆、社科院、多家省图书馆、大学图书馆都有保存，私人及国外也有收藏，这说明他的著作有传世价值。古今学者研究、宣传赵时春的论著、文章为数不少，他并不冷落。真正的学术研究冷静点好！现代研究赵时春的学者多集中在甘肃高校及平凉地方，有地域优势，地近则易核；但也存在着局限性，称赵时春为政治家、军事家有点拔

高；而评他为著名文学家、作家、散文家、诗人、才子、文人、学者、方志学家等都是名副其实的，头衔过多了，主次难分，就简称为明朝著名学者吧！

注 释：

- ①《平凉地区志》[M].中华书局出版2012.
- ②杜志强《赵时春文集校笺》[M].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 ③杜志强《赵时春诗词校注》[M].巴蜀书社出版2012.
- ④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作者：甘肃平凉师范学校高级讲师）

全省地方志系统部分市县“三项重点工作”

安 排 部 署 会

2016年10月28日，全省地方志系统部分市县三项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会在兰州召开，会议对全省地方史志“十三五”规划制订实施、二轮志书编纂、年鉴编辑三项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副主任车安宁、李振宇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意见。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张军利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就做好当前史志工作及三项重点工作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一要进一步认识做好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地方史志事业是党和政府社会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在存史、资政、育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编史修志是我国独有的文化传统，史志工作者担负着存续历史、揭示经验、总结教训的历史重任。依法治志是做好修志工作的根本保证。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是每位史志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正视差距，奋起直追，务必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二要紧盯目标，强化保障，抓主抓重，集中突破，至2020年前全面完成二轮志书编纂发行、实现年鉴全覆盖的“两全目标”。全国地方史志事业“十三五”规划意义重大，只有做好了规划也就做到了“一纳入、八到位”。三要树立严实作风，加大指导力度，为全面完成工作提供过硬的保障。加强作风建设，加强指导考核，创新思路方法，把史志工作做实做活。

省地方志办公室有关处室及相关市（州）、县（区、市）共68人参加了会议。

（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李佳璐供稿）

平凉古今医药人物概览

赵志飞



伏羲 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人物，相传伏羲人首蛇身，与女娲成婚，生儿育女，成为中华始祖，一作宓羲、庖羲、庖牺、包牺、伏戏等，又称羲皇、戏皇、牺皇、皇羲、伏牺、太昊等，生于成纪（今静宁县南），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中记述的三皇首列伏羲，言伏羲功业：“继天而王”、“作八卦”、“造书契”、“制九针”、“作瑟三十六弦”、“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供庖厨”等。伏羲的主要功绩一是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制八卦，即以八种简单却寓意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二是教民作网用于渔猎，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同时教民驯养野兽，这就是家畜的由来；三是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四是始造书契，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落后形式；五是尝百草，制九针，以为医药，为中国医药鼻祖；六是发明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七是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而且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为后代治理社会提供借鉴；八是创制古代历法。

女娲 又称女娲氏，娲皇，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氏族首领，生于成纪（今静宁县南），是伏羲的妻子，和伏羲同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相传她抟土造人、炼石补天、教人医药、发明笙簧、建立婚姻制度。

不窋 不窋(bù zhú)，姬姓，中国汉族人，后稷之子、夏朝孔甲时期周部族首领、周朝先祖，他袭父职，继任农官，时夏孔甲帝“好鬼神，事淫乱，夏

后氏德衰，诸侯叛之”，致使朝纲大乱，他遂失官，率部族奔戎狄之地，今平凉、庆阳、固原、天水之间，开始了先周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活动，他教民改地穴式居住为窑洞，重农耕，种庄稼，教民采摘药物，提倡养猪、养牛、养鹅，植树种花，为平凉早期的农业经济和药品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黄帝 生于公元前2697年，卒于公元前2599年，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即传说中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曾登临崆峒山向广成子问道，取得治国理政经验和养生至道，还邀请平凉名医岐伯讨论医药之事，被后人整理成《黄帝内经》流传于世，于是始有医药方法。

广成子 广成子为道教“十二金仙”之一，古代传说中的神仙。传为黄帝时人，居崆峒山的石室中，自称养生得以道法，年一千二百岁而未成衰老。为道家创始人，位居道教“十二金仙”之首。传说广成子活了1200岁后升天，在崆峒山留下了两个升天时的大脚印。《神仙传》称其为轩辕时人，居住在崆峒山的石室之中，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我国道教中名声赫赫，据说也确有其人，他的番天印极为厉害。《庄子·在宥》记载：黄帝“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

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哉？’”于是黄帝闲居三月，不问政事，然后再见广成子，问以修身之道。广成子告以“至道”，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年矣，吾形未常衰。”接着，广成子对“至道”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将去汝，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黄帝拜访广成子后，广成子授黄帝《道戒经》七十卷，《自然之经》一卷，《阴阳经》一卷。崆峒山一带，汉代辟为皇家猎场“广成苑”，修筑重要军事重镇“广成关”，均为纪念广成子而命名的。广成子不仅开辟了平凉制药业之先河，而且其炼丹事迹在中国药品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今崆峒山上广成洞、浴丹泉、广成炼丹处等遗迹犹存。

岐伯 平凉人，一说庆阳人，上古时代伟大的学者，中医学理论的奠基者，生而神灵，长而博识，精通医术医药，曾与黄帝说医，讨论人体生理、医药诊治之道，三年中，回答了黄帝提出的1080个医药学问题，黄帝尊他为天师，岐黄总结出的医学道理众口相传，战国时期医药学家整理著成《黄帝内经》流行于世，成为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后世称中医学为“岐黄之术”。

赤松子 传说中之仙人，神农时之雨师，居崆

峒山修仙养道，讲炼丹制药之术，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尝至昆仑山上，常至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相传炎帝之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至秦，于圮桥授张良以《阴符经》之黄石公，即此仙也。

容成公 传为黄帝之师，尝栖太姥山炼药，后居崆峒山炼药，年二百岁，善补导之术，守生养元，发白复黑，齿堕更生，《神仙传》作“字子黄，道东人”，《列仙传》“亦云老子师”，有《容成子》、《容成道》、《容成经》等，均托名之作，早佚。

韦震 号玉子，南郡人，传说中仙人。少好学众经，周幽王徵之不出，叹曰：“人生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去死转近，而但贪富贵，不知养性，命尽气绝则死。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异于灰土乎？独有神仙度日可以无穷耳”。师长桑子（拜道学家桑子为师），具受众术，乃别造一家之法，著道书百余篇。其术以务魁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后入崆峒山炼丹，白日飞升而去。相传他能兴风掀毁房屋折断树木，能兴雷播雨散布云雾，能把木头瓦石作成活生生的龙、虎和牛、马、羊、狗、猪、鸡，能把自己分成千百个人，能在江海上行走，嘴里含着水喷出去就能变成珍珠，珍珠绝不会再变成水珠；有时他一运气，可以不呼不吸，这时就举不起他推不动他，不能使他身子弯屈，弯屈后又不能使他伸直，可以一次闭气几十天至一百多天纹丝不动；有时他和弟子们出行，就把泥团成马，让弟子们闭上眼睛，泥马立刻变成高头大马，而且骑上就能日行千里；能口吐五色云气，云气有几丈高；在深潭里扔进一道神符就能把鱼鳖之类召上岸来；他能让弟子们抬眼看见千里之外的东西，但看的时间不太长。每当他进行藏神养气的修炼时，就用器皿盛上水，放在两肘之间，一吹气，水上立刻发出红色的光，光芒能升起一丈多高，用这施过法术的水治病，内脏的病喝它，外在的病用这水洗，都能马上治好。

王符 字节信，号潜夫，安定郡临泾人，生于公元85年，卒于167年，享年在82岁，东汉著名的政

论家、思想家，对医药学理论有较大贡献，曾隐居崆峒著书立说。范曄《后汉书》有王符传，但记述简略，除节录《潜夫论》三十六篇中五篇的部分内容外，有关王符生平事迹，只说了三件事：一是说王符的四位朋友。他们是马融、窦章、张衡、崔瑗。崔瑗是大医药学家，从与他友善的这四位朋友看，我们不难想象，王符出生于与匈奴、羌人邻近的边地，假如不是游学到了东都洛阳，结交上了这些全国第一流的经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文学大家，并受其影响的话，他就不大可能具有写出《潜夫论》这样一部批判当世的名著的勇气。甚为遗憾的是史文缺漏，他们怎样进行学术交流的，他们的友谊怎样开始并长期坚持的，我们后世已难于考稽了。二是说王符“无外家”。这在古代，母系来路不清，是要遭人贱视的一个话题。汉代，嫡庶十分严明，庶出无权继承，其外家不被承认。王符既是庶出，就说他“无外家”。宋代黄庭坚曾为此抱不平，他有诗云：“能著潜夫论，何妨无外家？”三是说度辽大将军皇甫规对他很尊重。皇甫规是他的同乡，皇甫规告老回乡，二千石长吏来见他，他都很怠慢，可是王符到门，皇甫规却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同坐极欢。这个情景，看来是皇甫规的晚年，也是王符的晚年了，而乡人传话说王符是个“缝掖”。“缝掖”是一种剪裁得很不称身的衣服，足见王符晚年，也还是这么一副穷书生的模样。王符一生精粹，全部贯注在他的《潜夫论》里，这部书不显于当世，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列入了目录。从《潜夫论》中反映出王符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构成，其主流是孔、孟的儒家思想，掺杂了一些道家 and 法家思想。就是说先秦思想对他影响极深，也很难摆脱西汉传统的影响。譬如《盐铁论》中的“重本抑末”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但王符终究是东汉人，他面对的现实与西汉的贤良文学以及董仲舒的讲法比较起来，就又有不少的发展和变化。他在《本训篇》里讲，宇宙之初，“元气窃冥”，后来化为清浊，化为阴阳，后来又化生万物，最后和气生人。他很强调这个“和”字，所以又说

“人道中和”。在这一点上，他和王充的峻急观点有所区别。他又说，“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这个“为”是孔、孟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本训》通篇中，他反复讲“气运感动”，这种讲法，比董仲舒多了一些唯物的素质，少了一些神学神秘的色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向前推进。他在《务本》篇中，讲了“重本抑末”。他的讲法跟《盐铁论》中的讲法又不一样了。《盐铁论》的讲法是，本就是本，末就是末，一对一。这是西汉社会古典经济起初的反映。东汉不同了，古典经济复杂化，并且已经露出趋向衰败的迹象。王符面对这个现实，他把“本”一分为二，以农为本，以游为末；把“工”也一分为二，致用为本，巧饰为末；把“商”也一分为二，通货为本，鬻（读yu，四声，卖之意）奇为末。这样，他把西汉的一对一变为三对三，支持的面扩大了，打击的面缩小了。这样一种观点，假如形成政策，那么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带有策略性的。一个书生，一个“潜夫”，假如不是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深沉的思考的话，是不会想出这些“点子”来的。王符还在他的《潜夫论》中，使用不少篇幅，展开对社会迷信的批判，并且把迷信行为跟当时权贵们侈靡的生活结合起来加以声讨。从他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东汉社会存在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劳动的人少，游手好闲的人多，其比例几乎是一比一百。社会上诱骗行为十分普遍。人们害了病不找医生，而是找巫婆神汉。妇女本是管蚕桑和织绢工作的，现在受社会风气影响，把蚕桑丢下不管，去当巫婆。当时人们深信，生病是神鬼作祟的结果。这样，反迷信、批鬼神，就成了思想家的任务。王充说，鬼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它是患病之人精神状态失常后的一种虚幻。王符的观点没有这么明朗，他以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说法，在《巫例》篇里说，一个人的吉凶，一半靠人自己的行为。他说的天命和天意，我们可以解释说是自然机遇；但其中无可讳言地还包括着董仲舒的神学遗存。他说的人自己的行为，主要指修养和道行。他主张“邪不伐

正”。你自己正了，妖邪就侵袭不到你身上来。这种办法，在纠正社会不良风气方面，其作用自然是迂缓的。但王符在这方面的功劳，主要在于揭发。在王符著文论政并抨击社会黑暗风气的举动下，接踵出现了不少政论家，最卓越的有王符的好友涿郡崔瑗的儿子崔寔，著作题名就是《论政》；还有兖州仲长统，著作题名《昌言》。但这两部书都没有留传下来，只在隋唐类书中保存着片断的佚文。王符不仅思想深邃，还继承了汉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有着高深精湛的文学修养。因为他终生生活在民间，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验，见闻广博，观察敏锐，有丰富的生活创作源泉。他的文章非常优美，不但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笔力浑厚，语言质朴，而且善于运用确切生动的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有时也采用韵文，使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清代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他在东汉散文中自成一家。

皇甫谧 生于公元215年，卒于公元282年，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人（今灵台县），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医学诸方面都很有建树。皇甫谧出身于东汉名门世族，皇甫谧生后遂丧生母，家道衰落，过继给叔父，十五岁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涇池），在战乱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自幼贪玩不习上进，跟村童编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嬉游习兵。年二十（公元234年）。仍游荡无度，犹不好学，人以为痴。一次，谧将所得瓜果进献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从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与我何有。”（《晋书·皇甫谧传》）因对之流涕，谧甚感痛，遂拜乡人席坦受书。四十岁（公元254年），叔父有子既冠，丧后母，遂还故乡；四十二岁（即公元256年）前后得风痹症，悉心攻读医药学，开始撰集《针灸甲乙

经》；四十六岁（公元260年）时已为名声鹤起的著名学者，魏相司马昭下诏征聘做官，不仕，作《释劝论》，仍耽玩典籍，忘其寝食，时人谓之书淫；五十一岁时（公元267年）晋武帝续诏不仕，相传曾到陕西陇县龙门洞、平凉崆峒山避诏，曾隐居崆峒山中多年，采药著述，研习针灸，撰著《针灸甲乙经》；五十三岁时（公元269年），武帝频下诏敦逼，上疏自称草莽臣，乃不仕；五十四岁时（公元270年），又举贤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书，武帝送书一车；六十一岁时（公元277年），帝又诏封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皆不应，著惊世骇俗的《笃终论》；六十八岁时（公元282年），《皇帝针灸甲乙经》刊发经世，皇甫谧去世后，其子童灵、方回，尊父笃终遗训，择不毛之地，将其俭礼薄葬于塬边，世人称之为“皇甫冢子”。十二卷的《皇帝针灸甲乙经》在总结、吸收《黄帝内经》、《素问》、《针经》、《明堂纪穴针灸治要》等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对针灸穴位进行了科学的归类整理，在医学领域矗起丰碑。该书共收录穴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出了18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统一了穴位名称，区分了正名与别名，介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上百种病症用药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津液运行、病有标本、虚实补泻、天人相应、脏腑阴阳配合、望色察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奠定了针灸学科理论基础，对针灸学以至整个医药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的针灸医学不但在国内得到飞速发展，并且已经风靡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批准，把针灸列为治疗专项，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正因为如此，皇甫谧不仅是平凉医药史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与孔子齐名于世界文化史的历史名人。

葛洪 生于283年，卒于363年，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出身江南士族，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少时，家境清贫，他无

钱购买书籍笔墨，只好向人家借书阅读，用木炭练习写字；长大了当过官吏，后来辞职回家，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葛洪从小喜欢读有关医药、保健和炼制丹药的书，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还很留心民间流行的一些简便的治病方法。曾到过崆峒山寻访仙迹，据《庄浪县志》记载，曾居住紫金山著书讲学，他把在广大的农村里搜集到的验方，结合自己学到的医药知识，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叫《肘后备急方》。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一生著作宏富，著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西京杂记》、《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金匱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另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等，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其中丹书《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仁智禅师 隋唐时人，唐初于崆峒山创建丛林，称明慧禅院，唐太宗李世民御书赐田地。主持开凿中台至马鬃山蹬道378级（后称上天梯），建殿修寺，宣扬佛教，盛极一时，为后世佛们弟子所效法。修道之余，采药问诊，施药治病，为人称道。

王全真 名道成，河南人，明成化间，居崆峒山问道宫，静修40年，研习医药，深知黄白术，年在百岁以上，貌若五六十者，能咽巨豚，饮酒至石不醉，行走如飞，乡人悉宗之。弘治时建修三清殿，正德七年又起玉皇阁。总制张泰以师事之，号为王全真。

张好问 字希敬，生卒年不详。从医活动时间

在明代弘治初年（1488年）至嘉靖十四年（1535年），祖籍高邮，其祖父张仁为韩王侍医，遂定居平凉。好问承祖业医药术，悉心钻研，医术药理精湛，不拘泥于古方，着重探求病因，辩证施治用药。有人夏病伤寒，状似虐疾，医生多以清暑之剂治疗，无效。好问往诊时指出：“南方湿热，应以清解为是，平凉地气寒凉而干燥，经过一冬，

人常有积寒潜伏于体内，一遇夏季便发作。”投以附子理中汤，病即愈。有总兵赵文突然剧烈咯血兼鼻衄，好问以黄葵根为引，以犀角、地黄、大小蓟、藕根煎汤，服后立止。有一参将患牙疳，致使大腿青肿，众医束手。好问说：“此病乃青股牙疳。”施以芫青（菁）根，并用药敷，旬日而愈。嘉靖七年（1528年）冬，时为刑部主事的赵时春，从京城护送其父赵玉返平凉。到家后，时春病重畏寒。医者多主附子理中汤治之，并用艾灸。好问诊视后断为减服受寒，透汗可愈，无须投药。时春遵办即愈。好问博览医书，精研医理，结合临床经验，参录诸书精华，辨正舛错，分类集成《张氏医精》。另有《太素集》等专著，惜佚。好问蓄长髯，人称“髯张”，喜饮烈酒。韩昭王有疾，召好问诊视。时好问亦体力不支，王府家人以烧酒劝饮致醉，行至王府端礼门竟猝然过世。享年70多岁。

苗清阳 生年不详，卒于1722年，明末清初道人，是全真龙门邱祖派第10代传人，明嘉靖初年，崆峒山被列为全国道教十二大“十方常住”之一，朱元璋第二十子朱松后裔被封为韩王驻藩平凉，韩王妃崇尚道教，在崆峒山大规模修建了太和宫等道教宫观，聘全真龙门派第十代掌门苗清阳为全山主持，自此，道教在山上代代相传，兴盛时全山道教宫观达40多处，道士百余人，现已传至第三十代。道教全真教创始于1167年，是王嘉（zhe，字重阳）在山东宁海立全真庵，创立全真教。王重阳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以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因此，让门徒弟子们诵《孝经》、《心经》、《道德经》。全真

教对门徒要求比较严格，不娶妻室，不茹荤腥。出家人道士一般多住宫观内，以清修炼养为主要宗教生活内容。1674年，王辅臣在平凉响应吴三桂，发动了兵变，崆峒山遭到了劫难，道僧逃散，宫观寺宇残败坍塌。战乱过后，乡民李天禄、孙应龙、赵维新等10人，于676年发愿捐资整修崆峒山隍城，众人各处寻访，访得陕西陇县龙门洞苗清阳道德崇高，前往虔请，苗清阳坚辞不就。后来，平凉知府杨风起亲笔书信再三敦请，苗清阳顾念官、民之盛情，于是率领门徒范一圣、潘和真、范一祥、杨一光来到崆峒山，主持崆峒道观和法事活动。苗清阳与信徒们经过多方化募，又得到宁夏文武官员、士庶商民助资，做好了修建道观的准备工作。1677年春，正式动工整修隍城大殿，先后修复了药王殿、青龙白虎殿，创修钟、鼓二楼，整个工程于1681年竣工，使隍城各殿宇焕然一新。苗清阳之所以先修药王殿，不仅是他对药王的极大尊崇，也是他在修道之余研习医药，有得有悟，为乡民、为自己祈求长寿健康之举。在随后的40年中，经过苗清阳苦心经营，众弟子同心协力，崆峒道教盛极宇内，庙宇殿阁几遍全山。1722年（康熙61年），苗清阳羽化，遗骨由其弟子安葬在崆峒山（古称笄头山）北麓。

时诚法 崆峒山子孙宫住持，生卒年不详，喜读经典，研究医药学问。

映雪山人 名李信和，道号平坦子，世居秦安，少力学，弱冠应童子试未授，遂弃去。闻崆峒多逸人，负笈往游，师事子孙宫住持时诚法，潜心内典。光绪甲辰，云游关中诸名山道观。丙午归来，尝以精深之理为平易之词教人，从不闻有铅汞之说。山人喜读书，精医术，善书法。

王汝蕃 生卒年不详，字价人，庠生，清朝静宁州人。以孝友著，工诗文，善琴，尤精岐黄术，著《医治验略》，另著有《易经数》、《历代史览经略》、《立身说》、《闻见集》等卷册。

程履丰 生卒年不详，安徽婺源县优贡人，清朝曾任静宁州知事。精岐黄术，医民病，善诗工书。

于飞 生于1790年，卒于1860年，字汉州，清乾隆时人，军功出身，是静宁县城东关名医；其子于云霄（1812年-1878年），六品军功，清嘉庆时人，神通医道；孙于昶庆，生卒年不详，通医理，缅甸裘；曾孙于秀州（1847年-1930年），继承祖业；重孙于纯礼（1902年-1964年），亦从医，1949年后，纯礼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特效。于氏五代医家，家中有歌颂医德的木匾数面，其造福与地方人民者可见一斑。（注：为保持医药世家几代人完整性，记述时，按第一代生年排序不计其余，下同）

江震乙 字鹤甫，道光末年生，岁贡生出身，静宁县城新街人，终年77岁，地方儒医，名闻遐迩。

水洛刘氏 原居庄浪县水洛镇西关村，迁水洛乡二房李家村，五行行医，刘成家（1837年-1899年），居家行医，子刘国珍（1871年-1947年），开永春堂，孙刘笃庆（1902年-1978年）、刘笃信（1911年-1971年），曾孙刘天祥，乡村医生，玄孙刘宝平，庄浪县中医院医生。

阳川陈氏 世居庄浪县阳川乡陈家庙村，四代行医，陈怀荣（1854年-1924年），子陈锡范（1895年-1968年），孙陈孔修（1919年-1988年），曾孙陈宝仁。

良邑何氏 世居庄浪县良邑何川村，五行行医，何志仁（1865年-1954年），清光绪岁贡生，自开树德堂中药铺，子何肇，孙何若曾、何若亚，曾孙何经、何作，玄孙何红霞。

孙倬 生于1876年，卒于1933年，字莆田，庄浪县水洛镇孙家庄人，幼年家贫，弃书学医，为人沉毅敦厚，好学不倦，钻研岐黄20余年，谦不开诊。父亲患病，卧床不起，他调药奉伺，病愈，于是知名，远近争延。性敦厚慈善，人有延请，应声立往，无论晦明。临诊施治，细心切问，每多效应。1926年（民国15年），水洛痢疾流行，徐姓全家传染濒危，他配方投药，霍然回春，救治活人甚多。地方名人孙积善送对联“探五经源，作万化主；抱九仙姑，披一品衣”。1928年4月，饥民抢劫水洛城，多人被伤，他

上门一一施治。晚年，家道渐裕，命其子开设同春茂中药铺，遇贫困者免费，人益敬其德行。

王藤 生卒年不详，字桃山，静宁州人，清高宗乾隆54年（1789年）举人，“秉性严正，制行端方”，其文清真雅正，主讲本州书院，境内登科第者，多为藤的学生，当时誉称“文宗”，藤亦精医术，诊断准确，下药立效，尤其对精神病患者，诊视后，服药必愈。

戴清时 生于1853年，卒于1899年，字冰如，静宁威戎人，州学廪生，品学兼优，工书善医，对父及继母，极尽孝道，双亲偶尔不悦，即长跪不起，直至二老欢颜乃罢，乡人有患病者，延请立即往诊，不分贵贱，亦不受酬，病卒于家，埋葬之日，争挽柩者络绎不绝。

马镒 生于1856年，卒于1918年，子承父业，在华亭开办“永益源”药铺，较有名气。其二儿子马凤周，生于1886年，卒于1955年，从小随父学医，医术精湛，对患者态度诚恳，获当地群众好评。

周子著 清朝嘉庆时人，居住静宁县城东关，76岁时，邑人为其祝寿，送木刻寿联一对，木匾一面，文曰：“储药物以除脏症具有惊人妙术，续芝歌而缓眉寿菟然角里高风”，匾文云“妙手回春”；其子周祖康，亦善医，卒于1941年；其孙周振（1883年-1953年）里人称之为“大王爷”。周氏三代医家，名垂乡里。

屈四爷（名不详） 贡生出身，静宁县威戎屈家岔人，精通医学，疑难痼疾，诊治辄愈，远近闻名。

慕廷兰 屈四爷弟子，静宁威戎正街人，光绪年间生，行医于清末民国初，用清凉攻下法治伤寒晚期重症辄愈而闻名。

郭宗泰 生于1865年，卒于1933年，庄浪县水洛城郭家堡子人，当地群众尊称郭先生，相传为南宋抗金名将郭浩的后裔，他家祖上以农为业，世代清平，父亲是一位忠厚长者，为他的前程，曾有一番深谋远虑：要他勤学苦读，以求取功名，改换门庭。八

岁时父亲为他延请水洛北山名师柳荫棠来家教读，他少时天资明敏，数年间学业造诣出众。但他环顾乡里贫病交加者屡，面对现实，他立志潜心学医，用医术济世活人。于是，他精读了诸多医学经典著作，尤其对于《千金要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花大力气，深钻细研，默记背诵，彻底掌握了这本医书的精华要领。所以，他行医时能得心应手、药到病除。他为人开朗、务实，慈祥、和蔼，弟兄和睦相处，家无后顾之忧。每天身背药箱，走乡串户，送医上门，为乡亲们询诊治病，指导一些农民家中常备“苏合丸”、“千金散”、“六神丸”等适宜小儿病的中药。中年之后，他医道益精，对古人的医疗歌诀背诵如流，顺口而出，临症时细心体察，择善从之。如查看病儿面部的颜色和苗窍来了解发病的机制，预测未来的吉凶；通过病儿虎口三关的指纹，以诊断其属热属寒；闻听病儿的声音，是属于五音中的何音，以诊断其属于何脏所主之病；还对病儿的精神情态和饮食睡眠等情况向管护人详加询问，达到全面了解，才给以投方配药。有时他还取穴针灸，很有独到之处。

刘国珍 生于1871年，卒于1947年，字谨堂，世居庄浪县水洛城西街，在其祖父时移居水洛城南山二房李家。国珍为独子，自幼聪颖，赋性孝友。因亲老力单，奉养无人，遂绝功名之念，继承父业，博览医学名籍，钻研岐黄之术。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重视求实精神，取其精要抄录成册；见谬误之处，反复考证，必至去伪存真。并随父临症侍诊抄方，遂得其传，学业大进，深悟医理之妙，尤注重辨证施治。他认为人之疾病，外感居多，且多由外感诱发而加重，如不先治疗外感，其内伤病亦难以奏效。因此，他在治疗方法上重视表药之适当选择，其处方疑似外感，而实治内伤久病。他在医术上精益求精，虚怀热谷，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恪遵经旨，故在医疗中名声远扬，求医者比肩接踵而至。他对病人热情和蔼，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望、闻、问、切，诊断细致，辨证准确，用药谨慎，配伍灵活，疗效显著，故众口称赞他“妙手回春”。他在水洛城街上开

设“永春堂”号药铺，一方面方便穷人求医治病，一方面广收学徒就近施教，传授他数十年积累的医疗经验。解放后任职庄浪县医院名中医的郭秉彝，柳梁乡名中医牛仰峰是他培养的徒弟。儿子刘笃庆、刘笃信，孙子刘天祥在他的教导下攻读医学，解放后均参加了庄浪县中医联合会继续行医，可谓中医世家。他教导儿孙：“当医生恪遵医德，要有良好的医风，以活人济世、救死扶伤为天职，解除疾病痛苦是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为谋利当医生，则会误入歪门，庸医害人缺德不小。”他还给“永春堂”药铺订立了号规：贫富一样，童叟无欺；遇有穷苦，老弱妇孺，鳏寡孤独皆义诊舍药；赊欠药费两年不交者一律勾销。他的儿孙恪守家训，竭尽绵薄，为水洛附近病人效劳。1947年（民国36年）他去世时，众乡里给他悬挂“德高望重”匾额，给以高度评价。

赵建邦 生于1883年3月，卒于1961年11月，字银子，享年79岁，静宁县贾河乡山上湾村人，秀才出身，先在秦安县梨树梁集贸市场开百货商店，乐善好施，交友广泛，曾于一次大地震后，从废墟里救出一名外地来做皮毛生意的回民，深受乡人称道，人称“赵商户”，开始兼为兽医，凡经诊治，药到病除，后因其父赵禄（字自来，1849年咸丰9年6月生，1923年民国11年6月卒，享年74岁，秀才出身，捐官五品）脊背生有毒疮（俗语搭背疮）病逝，遂购买医药书籍，刻苦自学，并求教于秦安莲花城李医生，后于百货永兴商铺旁增开永兴堂药铺，多自采自制野生药物，亦曾到兰州、西安购买药材，终精通医理药理，尤擅长治疗毒疮，十里八乡名声显著，对中药材应用有较深研究。解放后，因地主成分不再从医。其生育三子二女，长子赵彦，字东喜，未上过学，育有一子四女（其孙赵文科毕业于平凉卫校，兼开诊所）；次子赵俊，字东仓，高小文化，曾在中华民国南京铁路局办公室任文秘、青海地质某队任文员，育有二子四女，二儿子赵志飞，即本书作者；三子赵玉仓，未上过学，育有二子二女。

李卓汉 字云山，生于1886年，卒于1964年，

静宁城关人，善治不孕症，其方药人称“娃娃籽”。

尚政治 生于1890年，卒于1951年，字子平，华亭县城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贡生。翌年，授陕西试用直隶州职官，在省候补。中华民国建立，自陕西归里，当选为华亭县议会副议长。民国4年（1915年）后，从事教育，历任华亭城关区区长、华亭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劝学所长、女校校长、陇东随营学校校长等职。后任甘肃督军公署参事、书记官，甘肃省警务处办事员，陇东镇守使署军务参事，陆军第十军军部参议等。民国初，匪患频仍。尚倡办民团并任总团长。带民团修补县城堞垛，进行防范。民国15年（1926年）夏，从陕西陇县窜来匪众数百人围攻县城。尚率民团守御，激战一日，土匪难以得逞，退往县城邓家塬。尚即派人报平凉镇守使，派兵三营连夜驱匪出境。县城安全无损，受到县民称赞。尚受父传授，精于医术。民国19年（1930年），在县城开设中药铺。民国21年（1932年）7、8月间，霍乱等时疫流行，尚配方治愈百人，并广传其方。晚年，仍行医治病，名重一方。著述有《华亭尚氏族谱》6篇，《陇耕杂集》1部，惜均未付印。现存有清宣统年间编纂的《华亭县志手稿》一本。

强恕 生于1896年，卒于1935年，庄浪县水洛镇人，庄浪县内第一位西医。民国初在平凉上中学，弃学入南京军医学校学西医，毕业后分配国民革命军31军，不数年任该军军医院院长。民国21年（1932年）秋，水洛霍乱流行，一月之内死亡百人，人人恐慌万状。强恕闻讯，带一支西医医疗队赶来，设诊所施治，疫情扑灭。此为西医进入庄浪县内之始。民国24年（1935年）英年早逝于军。

李干材 生于1897年，卒于1958年，字弼臣，庄浪县盘安乡岔李村人，仅读两年私塾，民国20年左右，投靠张川王师长，被委以营长，一年后回家，打破“人到三十不学艺”的观念，刻苦自学，成了远近闻名的好郎中，行医看病直至去世。他为人忠厚，没有架子，无论啥人请他看病他从不推辞。乡民李福祥痢疾脱水极为严重，家里人以为没救了，他去抢救治

疗，使其起死回生。他尤其对牙科病颇多临床经验，单身汉李风柱由于牙痛，下巴肿到胸膛上，人昏迷不醒，危及性命，其邻居李兴隆请他去诊治，他诊视后到自己药铺抓药煎熬，撬开病人牙齿灌上，没上一个钟头病人就清醒了，坐了起来，还要吃喝。他不只给本地人看病，龙山一带回民找上门来，他也从不推辞，当地人交口称赞。

温彦云 静宁威戎北关人，秀才出身，精通医理，诊断治疗准确，乡里共仰。

柳藏珍 静宁县城西关人，秀才出身，通医理，济世活人。

李文渊 字浦泉，是商会老夫子，静宁南关人，秀才出身，通医理，济世活人。

邓星五 静宁新街人，曾任法院书记官，秀才出身，通医理，济世活人。

戴敦礼 字和亭，小学教员，静宁城关人，通医理，兼事医药。

戴瑾瑜 静宁城关人，治扁桃体腺及脓肿，不论怎样危重，一针刺便愈，有口皆碑。

周廷元 生卒年不祥，字定轩，又字定宣，湖北人。民国6年至9年（1917年-1920年）任静宁县知事，勤恳务实，深得人心。在静宁数年，先在县城办起了第一所女子中学，后集资开办罐子峡煤矿。民国9年12月1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地震，廷元于“翌晨出粮于县仓，食无食之灾民，购衣于当商，衣无衣之灾民，取帐篷旗寝于县库，搭盖草屋居无居之灾民”。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派遣医生赴静宁救灾，医疗内伤骨折之灾民，故人心稍安。组织大批医药发放，或派人熬制汤药分发灾民。地震后，廷元升调去办理全省地震疏河工賑事宜。

李文瑶 泾川荔堡人，民国时期曾任荔堡区保卫团团团长、区长、县参议员，号称“李皇上”，土改时全家11口人占地1080亩，雇工耕种800亩，其余出租，他在西峰、荔堡、肖金、镇原有铺面95间，开设中药铺、白酒作坊、盐店各1处。他一贯勾结官宦，鱼肉人民。

孙华堂 灵台县人，经营中药材，总店设在平凉过店街，在固原、西安设有分店，出资设立华堂私立国医学校，培养30余名中医药人才。

还有华亭的马骏、马镒父子，静宁城关张伟、杨俊山，威戎吴天章（秀才出身）、柴子正、李盘、马登山，雷大程春华、王棣清，甘沟任南山、王万喜，双岷魏士英、四河雷乾山，李店王中庸等，皆是生于清光绪年间，行医于民国时期者，皆专业行医售药，均有名望。另有一些医药的人员，因在介绍药店、诊所、医院、药材行栈时已经介绍，故此处不再赘述。

戴嶽 生于1896年，卒于1980年，男，河北人，1922年保定医学院毕业后任军医，抗战时期在平凉公路卫生站任内科医师，抗战胜利后在平凉开设私人诊所，1951年参加工作，任平凉专区医院内科医师，1952年任院务委员兼医务组长，1953年任第二门诊部主任。从医40余年，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擅长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在平凉医药界有较高知名度，1966年退休，1980年病故，终年84岁。

王学廉 男，汉族，出生年月不详，宝鸡人，1931年在平凉开中药房，1938年行医，1943年至1949年任平凉县中医工会理事长，1953年参加工作，平凉专区医院中医师，是专院唯一最早的中药师，1954年专署批准专院成立中医科，出任代主任，王学廉中医理论精熟，临床经验丰富，是平凉知名老中医之一，1961年病故。

裴德福 男，汉族，出生年月不详，天水人，出身教会医院，抗战时期在平凉公路卫生站任内、妇科医师，抗战胜利后在平凉开设私人诊所，1952年参加工作，在平凉专区医院任内、妇科医师，1953年任专区医院内、儿科主任兼妇产科主任，1969年病故。裴得福行医30年，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擅长内科、妇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积极推行新法接生，尤其善于处理妇科难产，在平凉医界影响较大。

史文华 生于1901年，卒于1965年，字玉玺，又名翰臣，出生于平凉城区。10岁入私塾，18岁毕业于平凉县高等小学，后随其叔父秉池学习中医三年，

吃苦好学，勤于钻研。民国12年（1923年），在家挂牌行医。民国15至31年，先后受聘在平凉金盛通、长泰裕、庆春堂药铺及邻县药铺坐堂行医。此后两次入中医专修班精研针灸和中医理论。1953年，他力主联合行医，组织起平凉第一家联合诊所，并兼诊所主任之职。1956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被推荐为中华医学会兰州分会会员，9月受命组建平凉市中医院，任首届院长，带头捐钱捐物，筹资建院。1960年出任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仍坚持行医。他擅治内、儿、妇科，不拘古方，灵活化裁，辨证施治，从不滥用名贵价昂之药品。遇贫病无钱患者，他不但同样精心治疗，还施舍药物。常说“医德昭昭，救人是本，其术虽微，然可济世活人，功德无量。”他晚年欲总结医案，不幸患脑溢血去世，仅有几个验方入选《平凉中医验方集》和《甘肃省中医验方集锦》中。

传钦 生于1902年9月，卒于1973年5月，原名石传钦，男，汉族，19岁学医，25岁离家外出独自开业应诊，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平凉针灸名医，人称“传一针”。

朱店毛氏 世居庄浪县朱店镇毛柳村，三代行医，毛鸿翼（1902年-1972年），子毛岭鹤（1937年-1980年），孙毛小平。

曹云龙 生于1903年，卒于1969年，出生于山西省万荣县中医世家，中学毕业后跟其父学医，后赴陕西省西安市挂牌行医。民国22年（1933年）来平凉行医，定居市区。两年后开设广德堂药庄，治病兼做药材生意。1948年担任平凉华堂国医学校校长，1950年任平凉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1956年，当选为平凉市首届政协委员，加入中华医学会，为兰州分会会员。1957年成立平凉市中医联合医院任第一副院长。1958年，任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部中医科主治医师。其后多次给医院中医学徒班授课，讲解《内经》、《金匱要略》等。1960年前后，人们饥饿，体质差，多患伤寒感冒病症，他以杭芍、桂枝、麻黄、附子、生石膏、羌活、川芎、炙杏仁、防风、白芷、甘草、黄芩，对症施治，疗效显著。有同院西医李某之

子，高烧不退，施用多种西药无效，用当时药效较强的金霉素治疗也无济于事。李某找云龙说：“曹大夫，我把儿子交给你算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治了。”云龙用自创药方，仅服两剂即痊愈出院。此后经医院依此方配制成散剂，起名赛金散（取疗效赛过金霉素之意），给体弱患伤寒感冒病人服用，深受群众称赞。云龙用药独到，张某患瘰疬性瘫痪，在平凉、西安住院求治4年无效，后经中医科云龙婿李方收治，投以云龙治疗小儿麻痹药方，服药3月，张某上下肢可以收拢却萎弱无力，再投它药无效。李方无法，求告云龙，云龙审视病历后，说“你将病治好了一半，可用原方加五分海马。”李方依言投药，3月后张某痊愈出院。1968年秋，云龙患肺气肿，时值“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实行群众专政，云龙病情迅速恶化，于1969年去世。

李吉五 生于1906年，卒于1973年，字少泉，静宁县城南关人。民国12年（1923年），吉五高小毕业，在经商的同时随父学习中医，后在兰州、平凉、静宁等地经商行医，擅长妇科、内科，远近人慕名，大病久病调养有方。1953年获中央卫生部颁发的中医证书，同年与戴履中、江孟远等人组建了静宁县城关中医联合诊疗所，任所长。1954年参加了甘肃省第一届中医、西医培训班。1956年，在中医联合诊疗所的基础上，又组建了静宁县中医院，担任院长。1962年，中医院与县医院合并后，任中医科负责人。在1959至1961年之间，爬山涉水，深入农村巡回医疗，高尚的医德，赢得了群众的赞誉。1964年，城川公社中医联合诊疗所恢复后仍为负责人。1973年病逝。

张慕祥 生于1907年9月，卒于1979年9月，崇信县黄寨乡白家新庄人，民国18年（1929年）崇信县高级小学校毕业，得名师哈有儒指教，苦学3年，开始行医，擅长内科、妇科、儿科及伤寒等科，对脉经造诣较深，在崇信中医界颇有声望。

张成斋 华亭县人，开设诚斋诊所，民国时期为城关群众点花种痘。

李义祥 镇原县新城乡人，1908年出生。9岁入

私塾读书，12岁时因家境衰落而退学。后曾替人放羊，14岁在平凉正兴隆药铺拜师学医，三年后出师在镇原县新城办起药铺。1935年在华亭县上关一带以行医和给小孩点花（种牛痘）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为华亭县地下党创始人，预防接种始传入华亭。1936年5月，红军西征解放了曲子、环县和镇原、固原一些地方，派工作队到新城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李义祥怀着对国民党的仇恨，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不久任抗日救国会组织委员，成为群众运动的出色组织者。1937年初，红军援西军进驻镇原，一面营救西路军失散官兵，一面发动群众抗日，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李义祥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新城惠沟村党支部书记，后任庞家村阎家湾中心支部书记。由于他对抗日救国表现积极，被国民党镇原县保安队捕押，后经中共镇原中心县委救出，送边区党校学习，毕业后任曲子县委巡视员。李义祥在潘家湾、老爷山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秋，李义祥以镇原中心县委特派员身份到华亭县安口开展工作。他以行医为掩护，边为群众看病，边发展党的组织，很快建立了秘密华亭党支部。1940年（民国29年）2月15日，李义祥等人介绍来家湾农民张成甲参加中国共产党，10月，在平凉、崇信、华亭交界处关家垭壑与地下党员张成甲、邓吉成合股开办中药铺，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以看病、卖药做掩护进行地下活动，发展中共党员。1943年，他任平东工委委员。当时工委急需工作人员，他毅然把大儿子李世清送到工委机关，使之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时期他仍负责以华亭为中心的平凉、华亭、崇信、陇县一带党的工作。一次他在执行任务中被4名国民党乡丁追捕，搏斗中头部受重伤，左手食指被打成粉碎性骨折，幸得地下党员掩护才得以脱险。1945年夏他又被甘工委任命为特派员，回到镇原新城一带整顿和恢复党组织。1946年6月，李义祥任华平工委副书记。他与工委书记兼华平武装大队政委张可夫带领武装大队到华亭关山一带开展武装活动。一次，武装大队遭国民党军队伏击，损失严重，大队长被俘，

副政委牺牲。政委张可夫回边区汇报情况走后，干部战士思想波动很大，面对这种情况，李义祥立即召开会议，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稳定了大家的情绪。1946年10月，平东工委成立，义祥任副书记，在平凉以东，华亭、泾川、崇信、灵台和镇原西南、固原东南一带活动，建立秘密联络点，以车马站为掩护开展工作。1947年6月，华亭工委成立后，义祥任华亭工委书记，根据甘肃工委环县四合原会议精神，协助张可夫组建了平东游击队。为了壮大游击队，他派地下工作人员以经商为名，多次到宝鸡等地买回枪支弹药、布匹、药品。由于李义祥长期的积极有效的地下工作，平东一带，包括国民党地方武装中都有我党地下党员在活动，加之他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所以在敌占区活动如鱼得水，多次遇到险情都化险为夷。一天夜里，他去固原召开党组织会议，被驻城阳的马家军发现，城阳守备队长虎志渊受命前去抓捕。虎是我地下党员，他一面集命队伍，一面派另一地下党员给李义祥送信，使李和其他开会人员得以安全转移。1948年，李义祥派地下党员打入镇原麻子沟圈郭继永的土匪队伍搞策反工作，拉出了一批武装人员，参加了游击队。5月的一天，他带领5名游击队员在崇信罗寺湾收缴了国民党保安队31支枪，千余发子弹。在他和张可夫的共同努力下，游击队被扩编为一个连，进入平凉、镇原、固原三角地带开展活动。1949年2月，甘工委根据迅猛发展的形势需要，批示平东工委加快组建各地武装力量，为配合解放平凉做准备。李义祥与张可夫周密安排，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小组密切配合下，先后指挥成功收缴了平凉眉岷、崇信赤城、灵台梁原等地国民党乡镇公所枪支弹药，处决了与人民为敌、破坏地下党组织、残害地下工作人员的恶霸特务，为平凉地区的解放扫清了道路。1949年7月，平凉地区各县相继解放后，李义祥被任命为华亭县县长。他带领全县人民接收旧政权，组织战勤服务，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解放大西北的斗争。1950年起，他先后任甘肃省农会副主席、武都地区副专员、省卫生厅副厅长。1962年后季，李义祥因身体多病离

职回平凉休养。并与四十里铺大队协商，办起了医疗站，带病就诊，带徒授艺。1970年11月，李义祥病情恶化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医疗站。1976年10月，这位向党和人民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被广大人民群众亲切称为“我们的白求恩医生”的他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68岁。

秦敬修 生于1910年7月，名汝泽，崇信县柏树乡秦家庄人，19岁时考入甘肃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就读，潜心学业，1942年（民国31年）开始攻读医学经典，经过刻苦钻研，逐渐掌握了一些医学理论，明医理，通医术，尚医德，善治内外各科疾病，尤长针灸、按摩术，对瘰病、心痛、胸脾及各种炎症、皮肤科病患者治愈率及高。能自制红升丹、白降丹为患者治疗疮痍，多不收费。1948年（民国37年）任私立平凉华堂国医学校教员，教授《国医史略》、《中医诊断学》、《药理学》、《细菌学》等。1956年，在柏树乡保健站举办医疗培训班，亲自讲课，培训出秦嘉礼等乡村医生10余名。后任教于省中医学校。

孙存弘 生于1913年，卒于1972年，化名刘仲元，山西闻喜县人。在闻喜中学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积极投身革命斗争。1935年（民国2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8年10月，经平泾工委书记吴铁鸣派遣，到泾川县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先由镇原县中原区“抗战后援会”主任陈天昌介绍到党原镇柴春荣药铺结识柴春荣，民国29年经柴介绍与平凉索罗乡中医张昆山相识，拜他为师，开始学医。3月，孙存弘介绍张昆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化名刘仲元与张昆山一起行医为掩护，往来于平凉、泾川、崇信、镇原4县交界地带，开展秘密工作。民国31年经徐子清介绍到泾川县城樊述孔药铺行医，民国32年7月与杨致远在清平乡杨家庄开设中药铺，作为党的联络点继续活动，由于孙认真执行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抗战胜利时，党组织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党员人数已达到180余人，1949年（民国38年）3月，孙任泾北工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泾川县长、县委书记，1955年1月，调任平凉专署秘书室

主任、省中医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等职，1972年12月3日在兰州病逝。

章祖鼎 生于1913年，卒于1971年，男，汉族，安徽省来安县人，193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解放前先后在尚县、富平、平凉等卫生院任院长。1949年7月平凉解放后，平凉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管平凉县卫生院，组建专区人民医院，章出任院长。1953年改任外科主任，兼医务主任。张祖鼎是平凉地区医院最早的外科医生，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做阑尾切除、疝气修补、剖腹产、外伤急救等手术，堪称平凉地区医院外科奠基人之一。1966年响应“六·二六”指示到崇信县医院工作，1971年3月病故，终年58岁。

李世栋 生于1913年，卒于2001年，静宁城关镇南关村人，自幼酷爱读书，1943年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1944年任兰州第五空军医院外科医生，1948年任省高级助产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在省委医务所工作，1950年调省人民医院，历任外科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1985年任外科主任。1950年，在省人民医院尚无静脉注射盐水的情况下，为挽救烧伤病人，他自制蒸馏水，配制注射盐水，给病人及时输液，抢救了第一例大面积烧伤病人。1957年，他首创省内中西医结合保守治疗胆结石的先例。1960年有一胃溃疡大出血病人，血压、脉搏消失，全身水肿，其他医生放弃治疗时，他打破常规，在病人无麻醉（已无知觉）情况下，果断进行手术，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他灵活应用“四妙勇安汤”加减，治愈外壳难治的静脉管炎，避免患者截肢致残。李世栋从医数十载，对待病人，不管地位、身份之别，都能一视同仁。他多次被评为省级先进工作者。1985年，当选第五届省政协委员，担任中华外科学会名誉顾问，2001年病逝。

郭秉彝 生于1914年，卒于1986年，字景峰，庄浪县水洛乡郭堡村人，著名中医。父亲为名医，他幼受濡染，小学毕业后潜心学医，父亲逝世后，从师中医刘国珍。1953年，他联合10人，成立中医联合

诊所，当选为县卫生协会主席。次年，入甘肃中医学学校进修，回县后，在县医院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晋升为主治医师，省政府授予名老中医荣誉称号。1983年，出席平凉地区医疗卫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受到地委、行署嘉奖。先后当选县党代会、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他积数十年临床经验，对脾胃病和急腹症有独到见解。认为饮食不节，积劳过度，温寒不适，情绪失常，易使脾胃受伤，元气耗损，会引起多种病变；急腹症他认为六腑的病变；对阑尾炎后期的包块，认为是久病入络所致。对求医者，无论贫富、妇孺，均尽心诊治，从无倦色。县人民医院鉴于他年老体弱，安排半日上班，仍勉励坐班，随到随诊，直至不起。逝世后，闻者共悼。

任泽民 生于1915年，卒于1974年，又名靖滋，城关镇人，自幼敏而好学，苦爱书法。早年毕业于泾川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和县立师范讲习科，曾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三青团分团股长、干事长等职，1945年（民国34年）任国民党泾川县参议会秘书，后改任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解放后，曾经营西药店。1958年因历史问题被捕，1974年服刑期间病故。

郑立生 男，汉族，生于1916年，山东人，1949年前先后在惠东药房济南总店、惠东药房、成都、西安、兰州分店任司药。1950年参加工作，在庆阳县卫生院专修班学习3年，1957年8月，分配到平凉专区医院任外科医师，1960年晋升外科主治医师。1962年被省政府授予“甘肃省劳动模范”，1977年任门诊部主任，1981年任医务科科长，1986年退休。郑立生工作勤奋，业务熟练，是平凉地区医院有名望的外科医生。

戴履中 生于1917年，卒于1997年，静宁县威戎镇北关村人，幼承父教，习书学医。1953年3月，组建静宁城关中医联合诊所，1959年他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回家务农，1979年平反，1980年任县医院中医师，后任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省政府授予他“从事中医事业三十年以上，为发展中医药事业，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当选为

县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常委，他结合临床经验，撰写《活血祛瘀法在临床之应用》、《否定中药堕胎的探讨》等论文。

赵顺天 生于1918年，卒于1982年，平凉市人，1938年（民国27年）毕业于西安广仁高级护校，次年在静宁县城开设惠仁诊所，信仰基督教，曾任静宁教会执事。1950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任静宁县中医药联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次年任静宁县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7月任静宁县卫生科首任科长、兼任县人民医院院长。他对医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1953年5月，县人民医院一无设备，二无病床，为了解除患者的痛苦，他大胆成功地作了一例阑尾炎手术，为静宁县外科手术之始，同年，被选为静宁县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次年选为静宁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批斗，1968年初，调至三合公社卫生院，1972年11月调甘沟中心卫生院，1977年又调城川公社卫生院，他都能从大局出发，任劳任怨，每到一地，不辞劳苦，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深受群众爱戴。1980年8月抱病退休，并出诊到危重病患者的床头。群众称他是“人民的好医生”。

刘炳南 生于1919年2月，卒于1995年10月，原名心宽，男，汉族，中共党员，中医副主任医师，甘肃省平凉市柳湖乡人。少年时曾跟随伯父学医6年，先后拜师2人学医4年，24岁起行医至谢世计52年。为人豁达开朗，热情豪放，乐于助人，吃苦耐劳，医理医术日益成熟，成为当地名医。整理撰写《桃花四物汤加味对几种皮肤病的治疗》被收编在平凉地区《医药卫生资料选编》上，熟悉药品性能，对中草药能灵活应用自如。

石果 男，汉族，生卒不详，中共党员，平凉专员督察公署卫生科科长，解放后平凉药品管理第一人。

李益清 生于1921年，卒于2004年，静宁县城关镇南关村人，师从宋如璧学医，1949年8月参加工作，1954年入兰州市人民医院内科进修，1956加入中

共产党员，同年获省卫生厅“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12月任县医院副院长。1964年，在平凉地区医院儿科进修，取得医士职称。从1967年起，先后在威戎、甘沟中心卫生院、田堡公社卫生院工作，他常身背药箱，走村串户，行医足迹遍及庄浪、会宁、通渭等县，为群众解除病患。如遇夜半求医者，他总能热情接待，当时农村医院条件差，病床少，他常把自己的床铺让给患者，还数次为患者无偿献血。1979年，省政府授予他“先进工作者”称号。1980年因病离休后，9月，义务担任县第二中学校医，他常说：“我是共产党员，党培养了我，就应该为人民服务，不能光图挣钱，不能自己享受。”1983年平凉地委、平凉行政公署、省教育厅、卫生厅嘉奖表彰，1984年获省委、省政府离休老干部先进个人奖。1988年，获全省“老有所为精英奖”。2004年8月29日，逝世，县上四大班子及卫生系统的代表，前来吊唁，敬献了“做人行医堪敬仰，为民济世是楷模”、“杏林风范”的挽幛。

于九如 生于1922年，卒于2014年，享年92岁，解放前在平凉开设中药铺行医售药，1977年调任平凉卫校任中医学科副主任、主任，中医高级讲师，中药应用技术娴熟。

赵启芳 生于1923年，河南洛阳人，为河南洛阳李氏正骨术的嫡传人，后落户平凉，和丈夫李天套开设正骨门诊，所用揉散糊药膏均为祖传秘效方，正骨手术娴熟，使用小夹板固定骨折患处，疗效显著。

刘光金 生于1925年，卒于2000年，湖北武汉人，1949年毕业于上海国防医药科技大学（现第二军医大），卫生部第一届西中班学习后，留任北京中医研究院，1969年下放平凉，任平凉卫校中医科主任，自拟参麻益智汤治疗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疗效显著，后调任省老干部保健院。

赵剑溪 生于1925年，卒于1998年，湖南浏阳人，1948年南开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在国务院化工部工作，期间曾去苏联考察学习，1969年下放平凉，任平凉制药厂化验室技术指导，药学知识极为渊博，当时平凉人称“南化北药”的南化专门人才，（北药即

是逯德勋，事迹记述在后），懂英、俄、日三国语言，为人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在评审技术职称时，数辞申请表，临终无职称，带出数名药品骨干化验员。

佐生堂 男，生于1928年，曾于1956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出任华亭县医药公司经理，致力于引进和开发药材新品种，贝母就是其中之一。其二儿子佐国林，曾于1989年任华亭县医药公司副经理，后调平凉地区医药公司，企业改制后，不改初衷，仍从事药品经营工作。

金耀彩 生于1929年，甘肃兰州市榆中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兰州医学院，曾任平凉地区医院副院长、普外科主任医师、平凉地区医学会副理事长、甘肃胸外科学会委员、地区科协委员，甘肃省第4、5、6届政协委员，兰州医学院平凉教学班兼职教授，从事外科临床工作40多年，在普外、胸外、泌尿、骨科、神经外科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做过各种大、中型及高难度手术。1984年以来进行的“穿刺冲洗治疗肺脓肿”、“腹股沟疝修补术改进”获得成功。“用胎盘血管进行显微外科基本技术训练”、“施行早期扩清术和纤维板剥离术治疗小儿急性脓胸”、“大隐静脉套叠代瓣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获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其撰写的临床总结和论文有30多篇，其中《急性白血病误诊为骨关节病一例报告》及《自发性肠系膜血管破裂》刊登在《中华外科》杂志。

汪廷洪 生于1930年2月，卒于1995年3月，中共党员，中医副主任医师，甘肃省成县人，1954年于兰州卫校毕业后分配省中医医院，1958年保送北京中医学院学习，1964年毕业分配平凉地区医院，曾任地区医院中医科主任、省中医学会理事、平凉地区中医协会理事长、平凉地区科技学会委员。汪廷洪在中医学方面有较高造诣，是平凉地区名中医之一，擅长中医内外科杂病，尤其对胃溃疡、甲状腺肌瘤、骨结核等有独到见解和研究，他自创的“溃疡散”是治疗上消化道溃疡的良药，“五毒黑烧散”是治疗骨结核及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良药，均有很好的临床效果，由于他在中医学方面有较深的研究，1982年参加了在上海

举办的全国中医内科急诊经验交流会；1984年参加了在长沙举办的中医内科研讨会；1986年参加了在兰州举办的全国中医内科痹症经验交流会。他还通过培训、指导进修、师带徒等方式为平凉内外培养中医人才百余人，多已成为中医骨干。1984年，省政府授予汪廷洪“从事中医药事业三十年以上、为发展中医药事业、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做出了贡献”的荣誉证书。他撰写的《五毒黑烧散治疗骨结核疗效观察》、《廷寿丹加味治疗神经衰弱的体会》、《溃疡散治疗上消化道遗病27例小结》、《甲状腺机能亢进的临床探讨》等论文或发表或交流。其事迹编入《平凉科技志》。1995年，汪廷洪因脑溢血治疗无效病逝，终年65岁。

马万庆 生于1931年5月，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人，1955年于西安医学院皮肤性病系毕业后，分配黑龙江省人民医院工作。1962年调平凉地区医院。先后任地区医院皮肤科主任、皮肤科主任医师、兰州医学院平凉教学班兼职教授、省医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崆峒区政协特邀委员等职。他从事皮肤病40多年，在银屑病免疫方面颇有研究，用非特异性抗过敏治疗急性泛发性银屑病取得成果，著有《头癣防治与灰黄霉素合理应用》一书，有7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具有较高威望和知名度。

胡承孝 女，生于1931年11月，陕西西安市人，曾任平凉地区制药厂党支部书记、厂长，平凉地区药检所第一任所长。

尹大光 1932年生，河北省武安县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69年来到静宁县医院工作，1972年，县医院举办麻醉培训班，主讲麻醉术，麻醉药品使之广泛使用。

闵琪 生于1932年5月，卒于1997年5月，中共党员，副主任药师，甘肃兰州市人。1951年于甘肃省卫校药剂班毕业分配天祝藏族自治卫生院，先后在民勤、张掖卫生院、省妇幼保健院、引洮工程局医院从事药剂工作，1962年调平凉地区医院药剂科任副主任，曾任省卫生厅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省药学会

理事、地区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他从事药剂研究工作30多年，1964年在条件简陋、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在全省首次应用离子交换制水，以后又用此技术纯化ATP，分离中草药有效成份，1973年，研制出从兔肌提取ATP，经卫生部生物制品鉴定所药检合格，应用于临床。70年代，他和他的同事陆续研制出中草药丹参、灵芝、生脉、柴胡、川芎等针剂及用人工培养的灵芝草制成的针剂和膏剂，治疗冠心病有效率在80%以上，芫花引产针剂效果达100%，而且无副作用，吹鼻散治疗急慢性黄疸性肝炎有效率在90%以上。80年代，地区医院建起具有现代化手段生产的制药厂，他利用现有设备手段，带领同事对中草药成份进行提取，先后研制出生物碱、皂苷类及甘草次酸等，研制出黄连素、苦生硷、704、穿山龙、复方独活、柴胡等20多种注射液和脑功能恢复液541片、苦黄散、五味子糖浆、溃疡散等多种丸、丹、膏、散药剂，治疗心血管、呼吸、消化、泌尿生殖、神经系统疾病，均取得满意效果。他在中草药研制方面撰写的论文、资料多次刊登于国家、省、地医药杂志和资料汇编，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1978年出席了地区科学大会，作为甘肃省代表参加了全国中草药采种制用先进代表大会。1997年5月因患脑溢血医治无效逝世，终年65岁。

包藏珍 生于1932年，卒于1986年，男，汉族，定西人，1953年甘肃省卫校医师班毕业后分配东乡县医院任内科医生，后任院长。1954年调甘肃省人民医院任内科医师，1961年调平凉专区医院任内科医师，1979年晋升为内科主治医师，1981年任内科副主任，是地区医院心内科创建者之一，一生勤奋好学，精通业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心内科和急救，特别是在“柴胡注射液”的开发研究和临床应用上贡献突出，在地区名望颇高、影响较大。1986年因患食管癌病故。

朱桂林 生于1933年，卒于1995年，陕西省旬邑县人，1970年响应毛主席“6.26”指示精神，由兰州市人民医院来静宁县人民医院工作，并带来1台丹

麦产电测听仪、1套日本产验光镜片、2把检查椅，创建了五官科，自带干粮去兰州采购器械，1979年调回兰州工作，曾任兰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荆复礼 男，汉族，生于1933年，兰州卫校毕业，先后在兰州工人医院、华亭县第二人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策底卫生院任药士，1975年调地区药检所任中药室主任，1979年聘为药剂师，1981年聘为主管药师，1993年被评为地区优秀党员，聘为主任药师，1994年被卫生部授予“偶边远地区 医学科技工作者”称号。发表药品论文20余篇，获省、市科技奖3次。

逯德勋 生于1934年，吉林长春市人，1958年毕业于沈阳药学院，平凉地区制药厂首任西药技术员，工程师，曾任平凉地区制药厂厂长。

许才兴 男，江苏武进人，生于1935年10月，大学文化程度，地区药检所副主任药师，1988年11月被卫生部评为我国药品监督管理事业做出贡献的先进个人，1991年3月被甘肃省卫生厅评为贯彻实施《药品管理法》先进个人。

杨培青 男，汉族，生于1936年12月，甘肃平凉人，中专文化程度，1954年1月参加工作，195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荣获国家卫生部“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长期奋斗在医疗卫生战线，为党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青龙卫生所工作期间，八年如一日，扎根于环境艰苦，条件很差的青龙山区，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仅有“两间破屋、七种西药、两背斗中药和一张三条腿的破桌子”的条件下，办起了农村卫生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战胜了骗人的游医、巫神，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并能勇于接收群众的批评，改掉了“四怕”（怕吃亏、怕白跑路、怕吃苦、怕承担责任），变“四不看”（欠账不看、不先交出诊费不看、坏天夜天不看、危重病人不看）为“五不分”（出诊不分昼夜、不分山高路远、不分节日假日、不分地区界限、不分好坏天气），树立了热心负责，吃苦耐劳的医疗作风，坚持送医送药到田间病家，进行治病防病。几年来，他用中西医相结合的办

法，治疗、抢救过危急病、重病人40多例，其中治愈了两名大面积烧伤病人，其烧伤面积分别达到46.7%和23%，均以2度伤为主，还对小儿麻痹均以中医理论及治疗方法治愈，对上呼吸道传染病用中草药预防和治疗起到了很大效果。同时，他还不断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积极热心培养不脱产卫生员和接生员，使卫生工作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由于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以极端负责的革命精神对待工作，以极端热忱的态度对待病人，因而深受群众的赞扬和拥戴。

陈 韬 生于1939年2月，陕西长武人，共产党员，外科主任医师。1963年兰州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1966年成功地做了一例脑囊切除，1978年任副院长，1980年任甘肃省骨科协会委员，1993年6月后任平凉市第二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同年，研究的复方烧伤膏治疗烧伤获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杨耀忠 1940年出生，静宁县城关镇后街人。1963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在县医院、李店、雷大、威戎等乡镇卫生院工作期间，他探索出“母血疗法”挽救腺病毒肺炎小儿，用钢笔管暂时代替气管插管挽救喉炎、喉头梗阻患者。1976年，他率先在威戎中心卫生院开展A超诊断和心电图检查，1977年调县医院，1979年任副院长，1980年，他总结心肌梗塞诊治经验，制定出县医院抢救心肌梗塞病人的治疗常规，1984年任县医院院长，当选为省第七届、第九届人大代表，1999年获省人事厅、卫生厅“全省卫生系统优秀管理者”、“全省医德医风先进个人”称号。

陈思平 男，1940年3月生于甘肃省平凉市，1965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医疗系，1985年创办成立了医院、医学研究所、皇甫谧事业董事会，任平凉皇甫谧中心医院院长、皇甫谧医学研究所所长、皇甫谧医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陕西省老年医学会常务理事，对针灸医疗、中西急诊、糖尿病、冠心病、肺心病、肝胆病、肾病、癫痫、骨结核、骨髓炎、前列腺炎、痔疮、周围血管病及肿瘤等病有独到之处，曾获卫生部《中国当代高级医师荣誉证》、平凉地区科学

技术先进工作者、崆峒区《荣誉市民》，编有《针灸》、《骨伤》、《外科》、《眼科》等教材，主要的学术论文有《经络实质量子观》、《肾气的实质探讨及在保健长寿中的作用》、《伤寒三阳病热型实质的探讨》、《服玉泉、可延年》、《内经眼论》、《病机十九条》、《阴阳学说的规律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阿拉伯医学与阿维森纳医学》、《戒毒疗法的现状及其临床效验》等，与人合著《临床腧穴学》。

吴可生 生于1940年，卒于2013年，河北正定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后在灵台县任中医师，擅长中药生药的应用及炮制，后调任平凉卫校中药高级讲师。

张子俊 男，汉族，1942年5月出生，甘肃平凉市人，1962年进平凉市医院拜名老中医曹云龙为师，学徒4年，后又受名医汪廷洪、者仲仁亲授。1984年在甘肃省中医学院“中医经典著作学习班”进修深造，1985年参加北京中医学院“中医名方临床应用”提高班学习，一生勤奋好学，治学严谨，自学成才。从业4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13篇，获科技进步奖3项，1994年破格晋升为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曾任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平凉市中医院院长、党总支书记，崆峒区卫生系统工会主席，中华医学会甘肃分会会员，甘肃省中医学学会理事，平凉地区中医学学会常务理事，省定中医药专家，甘肃省第二、第三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学习班指导老师，甘肃省中医学院兼职副教授。他的名字和主要学术成就多次被收编在《中国医药荟萃丛书·全国专病专科名医选编》、《中华当代名人词典》、《中国当代中西名医大词典》。

张祥裕 生于1942，河南孟津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兰州医学院。平凉地区医院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兼任中华医学会甘肃分会常务理事、甘肃超声医学会常务理事、兰州教学医院教授。主编《医药资料汇编》。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张士卿 生于1944年，河北保定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于平凉卫校。1979年考入北

京中医研究院儿科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任儿科医师，后调任甘肃中医学院，任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

王采 生于1945年，平凉白水人，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青海军区、平凉地区制药厂工作，后调任平凉卫校教务主任，平凉医专副校长，策划组织设立了药学专业，曾任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员，平凉医学会副秘书长，省卫校通讯、中等医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副教授、高级研究员。

尹健飞 男，汉，甘肃灵台人，生于1955年10月，大学文化，1996年1月被甘肃省干部下农村帮扶办评为全省干部下农村帮扶工作先进队员，1997年12月被甘肃省卫生厅授予实现全省儿童计划免疫“第三个85%”目标先进个人，2001年任平凉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2008年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选为先进个人，药品监管多有建树。2013年8月调出。

曲乐英 女，天津静海人，生于1957年8月，大学文化程度，地区药检所副主任药师。1995年6月被甘肃省卫生厅评为全省卫生系统执行《药品管理法》先进工作者。

杨实奋 男，汉，甘肃静宁人，生于1958年4月，中专文化程度，平凉地区医院药剂科副主任，主管药师。1986年1月被共青团甘肃省授予“甘肃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张乔英 女，汉族，甘肃庄浪人，农工民主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妇女保健主任医师，生于1959年9月，1981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庄浪县妇幼保健站副站长、县妇联主任、平凉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院长、平凉市政协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委员等职。现任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凉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她从医三十年来，一是把“以人为本、救死扶伤”作为事业准则，心系患者，心系医院，视患者为亲人，以院为家，经常加班加点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先后诊治病人20多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5000多人次，带教和培训县、乡、村妇幼人员3万多

人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敬和称赞。二是想方设法争资金、挤资金，投入100多万元，完成了旧楼改造和扩建，新增业务用房1300平方米，大大缓解了妇幼保健院业务用房紧张局面；三是针对医疗设备陈旧匮乏的现象，投资近500万元，购置GE四维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乳腺钼靶机、500mAX光机等中高端医疗设备30多台（件），为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在新城区争取到建设用地41.67亩，于2009年5月开始修建建筑面积23885多平方米的十三层，总投资6309.66万元，设置床位300张的全框架医疗保健综合大楼，极大地改善患者就医环境，满足广大医疗保健对象的需求。五是领导医院开展了新生儿疾病筛查、产前筛查、宫颈癌力普刀环切等二十多项新业务，每年向国家级和省级知名杂志发表论文3-5篇，申报市级科技进步奖2-3项。六是在她的努力下，全市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由2006年的77.60%上升到2011年的98.97%，孕产妇死亡率由2007年的77.62/10万下降到2011年的15.86/10万，婴儿死亡率由2007年

的37%下降到2011年的8.8%。她1996年12月被卫生部授予全国妇幼卫生先进工作者。平凉市妇幼保健院也被省纪委、卫生厅、省妇儿工委授予“甘肃省十佳妇幼保健院”、全省医德医风示范单位、全省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还有如崆峒区白友梅、王学谦、靳光斗、王桂堂、周云峰、马道、李兰亭，华亭的王志谦、王汉臣、张鸿道、熊学愚、马福瑞、王周敏，崇信县李建善、梁晋升、梁贵方，静宁县城江孟远、李九安、闫玉珍，威戎马象天、王耀章（河北人，擅长中西医结合）、范士仁、王浩然（陕西人，擅长中医内科），古城岳升泰，曹务苏殿甲，原安张文远，仁大刘光祖（善用活血祛瘀法，治疗久病大病，卓有成效，远近闻名），四河匡志雄等人，个别人生于清末，其余皆生于民国初期，行医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有的毕业于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员，有的在民国时期当过公职人员，有的仕途未成，专心自学中医，均为医界名流。

（作者：平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员）

征稿启事

《甘肃史志》是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办的全省史志类学术内部刊物，主要栏目有特载、工作论坛、文件选编、续志研究、篇目选登、史地考证、历史回眸、陇原人物、旧志整理、乡情民俗、志鉴动态、成果展示、史志随笔等。

投稿作者需提供真实姓名、署名单位全称、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来稿注释请采用脚注，序号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参考文献条目编排在文尾，注明文献题目、刊名或出单位、编著者、起止页码等。

所有来稿请寄送纸质文本的同时以word格式发送电子邮件，邮箱：3498763120@qq.com。稿件一经采用，按国家有关规定酌付稿酬。

投稿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51号省统办一号楼9楼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

邮 编：730000

联系人：汪举红 孔令奇

联系电话：0931—7821931 7821927

《甘肃史志》2017年度拟选论文题目

1. 论成纪
2. 陇南礼县“秦源”考
3. 陇西李氏源流考
4. 李唐王室祖籍辨析
5. 论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
6. 黄帝与黄帝陵
7. 西王母活动地考
8. 古陇西与今陇西
9. 骊靬考兼论骊靬并非所谓“罗马战俘安置地”
10. 霍去病河西之役进军路线考
11. 秦榆中县治考
12. 张家川战国墓墓主族属研究
13. 李自成青城归隐说驳论
14. 皇甫谧考
15. 水车源流——兼论水车引进甘肃的轨迹
16. 秦始皇西巡路线考
17. 萧关考
18. 朝郡考
19. 宋代吐蕃地方政权
20. 凉州吐蕃六谷部述论
21. 令居考
22. 汉首阳县治考

GANSUSHIZHI

甘肃史志

2016年第4期（季刊）（总第28期）

编辑出版：《甘肃史志》编辑部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51号
省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7821931 7821927

电子邮箱：3498763120@qq.com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